

独立阅读

致力于公民社会的常识阅读

2010年01月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独立阅读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独立阅读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独立阅读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连续三期撰写阅读报告将列入观察员名单，连续三期没有撰写视为自动退出；一年内在“独立阅读”发表三篇及以上文章者列入特约撰稿人名单，否则视为自动退出。
- 5、独立阅读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独立阅读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独立阅读观察员、特约撰稿人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 shrbooks@gmail.com。
- 6、更多即时信息，可见：<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言一、汪伟

轮值编辑：言一

观察员：文学：朱白（广州）、朱航满（石家庄）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艺术：言一（香港）

特约撰稿人：戴新伟（广州）、羽良（北京）、严飞（美国·旧金山）、刘柠（北京）、汪伟（上海）、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凌越（广州）、孙骁骥（北京）、张无极（北京）、罗四鸽（上海）、杨小刚（德国·图宾根）、孙传钊（上海）

翻译：陈丹丹（英国）、吴万伟（武汉）、朱芳艺（美国·孟菲斯）

编者按：

1893年，郑观应出版了轰动一时的《盛世危言》，时为甲午战争前，自强运动业已进行30余年，大清王朝的北洋水师刚刚于1891年访问长崎，引发了日本国内的激烈反应，当时的晚清王朝不可谓是鸦片战争以来的“盛世”，郑观应此时发出“商战”之语，意在以“商”立国，富强救国论从此甚嚣尘上，影响至今。

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意在“富强”，不过他的商战论还有另外一个层次：“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可见在他眼里，“政治改革”是工商发达的前提。

反观今日之“盛世”，经济一枝独秀，政治稳定压倒一切，一片和谐盛世景象，引发了世界对“中国模式”特殊论的激辩。这般的“盛世”，将会何去何从？

勘误：

1. 上期译介一栏的译文《在德黑兰读韦伯》第一段末尾残缺，其完整译文应为：伊朗改革运动的著名战略家赛义德·哈贾里安（Saeed Hajjarian）在胁迫下写成的忏悔中解释说“人文科学的理论包含着意识形态武器，这些可以被转换成用来攻击国家官方意识形态的战略和策略”。
2. 上期随笔一栏的《德国学生运动观察》一文中图释错误。原本是“柏林学生”而被误注为“图宾根学生”。特此更正，并就我们的疏忽向文章作者和各位读者致歉！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经济: 苏小和
写作: 朱白 朱航满
思想: 成庆
文史: 王晓渔
影世: 言一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孙骁骥: 捕捉布莱尔的“影子”

聚焦·盛世

夏佑至: 恐惧出盛世
贾葭: 心甘情愿地委身巨灵
羽良: 盛世, 不自洽的和谐
圆: 理想主义的 Ecstasy: 盛世的宏大叙事与创伤后遗症
刘柠: 播撒龙种, 收获跳蚤
成庆: 盛世下的意义危机
王晓渔: 二十一世纪的“推背图”
灵子: 陈冠中专访——“盛世”不是预言, 我写的是今天

随笔

夏佑至: 年轻人为什么忧伤?
张秦峰: 为城市及自由正名

音乐

马慧元: 朱小玫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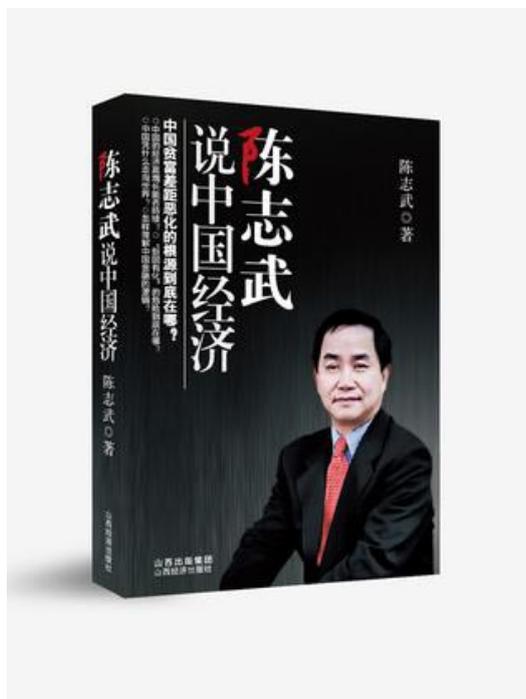
译介

H·艾伦·奥尔: 科学能否解释宗教?
约翰·拉赫兹: 哲学还能产生公共知识分子吗?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ECONOMICS&SOCETY 经济·社会

观察员 苏小和 (北京, susumartin@hotmail.com)



可能是又到了年关吧,最近我书没少看,但却无话可说。比如我看了陈志武最近的一本访谈结集,《陈志武说中国经济》(山西经济出版社,2009年12月),一方面发现,关于当下中国经济的种种追问,其实都已经说尽,只可惜这个国家依然一意孤行,让陈志武甚至有些失望地说,有些人,有些事,中国人总是不见棺材不流泪。我是能体会教授内心的隐痛感的,除非中国的经济能够超越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范式,除非中国人与历史的演进没有关系,否则眼下到处可见的对私人财产的剥夺,政府近似于亢奋的银行信贷刺激,国有企业匪夷所思地对自由竞争市场的蚕食,便找不到任何一点学理和实证意义上的理由。

中国人对规律的不认同,对历史的不尊重,其来有自。我最近又看到张五常把他的《卖桔者言》拿出来示人了,而且加了后来的一些新思考,更名为《新卖桔者言》(中信出版社,2010年1月)。年纪大的朋友相比知道,80年代影响一代年轻人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就有《卖桔者言》。前一阵子我和几位中年经济学家聊天,就有人提到当年秉烛夜读《卖桔者言》的情景,说的是虽然并未全懂,但隐隐约约看见了经济学世界的美景。我的意思是说,在80年代,一本好书真的能影响一个时代的思想风貌,但今天就不一样了,似乎越是垃圾书,越容易引起一

般读者的追捧,从郎咸平的那些毫无常识的叫喊,到摩罗《中国站起来》(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这种明显迎合大众盲动情绪的后文革文字,居然就闹得风生水起,以至于外省的某个多年不见的朋友给我电话,要我读读摩罗的新书,说真的写出了中国人民积压百年的声音。

一直以来,我自己都在不断提醒,不要单一维度地思考问题。比如全球化与反全球化、自由与反自由、市场与反市场,或者是这种种对抗之间的过渡地带,只有在一个开阔的阅读视野里,我们才不至于一叶障目。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休克主义:灾难资本主义的兴起》(娜奥米·克莱恩著,吴国卿、王柏鸿译,2010年1月),看上去就是一本反全球化、反自由企业的作品。但作者的思维路径并不是完全不能接受,比如她的批判重点是放在了私人财团和政治权力的结盟上,沿着这种路径,她的结论是,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并没有给这个世界带来民主和繁荣,而是加剧了分裂。

我当然不太认同她的结论,但这位70年代出生的反全球化作家却能带动我思考。至少她试图从另一个维度来捍卫民主的价值和生命的尊严,行文更是有调查,有模型,也有考据,完全不像中国的摩罗、王小东,还有什么宋鸿兵,一副赤膊上阵,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混混模样。

还是说一些读书的方法吧。几乎所有的读书人在初入门道之后,都热衷于彻夜构建自己的思考体系和学术体系。我经常收到一些看上去宏伟的思想表述,事关信仰、哲学、逻辑、历史,甚至还有数学或者物理学。有意思的是,这样一些志存高远的文章,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文献注释,不涉及任何一种前人的学术成果,仿佛一个梦想家醒来真的得到了一座城池,又仿佛一个建筑工程师,他没有一砖一瓦,也没有画出一张图纸,竟然就修好了摩天大楼。

如何看待这样的局面,我知道很多中国读书人可能热爱这种大胆假设的勇气,喜欢平地起高楼、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的豪迈作风。但胡适之早就说过,大胆假设之后,还得小心求证。多年前,我的一个学社会学的朋友去到耶鲁念博士,第一个学期,满脑子构想,天天都处在发现真理的亢奋之中,经常把自己琢磨出来的学术建构框架拿给导师评点,期望导师真正认识到,他的这个中国学生事实上是一个已经发现了真理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了不起的学者。开始,导师并没有多说什么,每次看到学生滔滔不绝的言说,只是轻松地笑一笑。但差不多一个学期都快过去了,当这名中国学生还在耽于幻想,导师终于脾气大发,他告诉我的朋友,如果再去好好查考资料,阅读经典,他将停止对他进行教学;在这样的私人警告过去

一个月之后，导师发现这名中国学生并没有引起重视，他竟然给学术委员会致函，表示这名中国学生没有从事学术研究的必要基础，因此建议学校将这名学生辞退。

很多中国读书人可能对此大惑不解！事实上，这里隐含着一种更大的学术敬畏，所谓太阳之下无新事，每个人都活在历史的河流之中，每个人都拥有某种近似的思考习惯。一名读书人最大的工作并不是搭建架构，而是要充分了解一个领域所有已经形成的学术成果。只有在此基础之上，所谓的创造，才有可能。

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他的口述自传《我的一生》里曾经回忆他起初的经济学发现：

在劳改队，我自己推导出“戈森第二定律”（每一块钱的边际效用相等）、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杨小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他的所有劳动几乎是一种重复性劳动，意味着在经济学演进的领域，他的思考没有传承意义，意味着在一个成型的学科之内，杨小凯试图靠一个人的能力构建一种学科的去、现在和未来。而这么做的结果，导致他必然成为一个没有历史传承的人。一个没有历史感的人，一个没有历史感的国家，怎么可能会有创新？怎么可能会有未来呢？事实上，杨小凯当年身处监狱，他自学了一些数学，想着用数学来重新阐释价值理论，想着把当时能够看到的一些马克思的经济学架构和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的理论数学化，然后慢慢终于就有了一些自己的发现。他说，由于当时自己不相信官方的政治经济学，也没有接受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严格训练，所以在那种与世隔绝的状态中出现的一些新思想，他真的以为自己发现了真理。

幸好，在监狱之外，还有一个无限宽广的世界。没有人能永远锁住我们自由的思想，没有人能永远遮蔽我们深邃的眼睛。我们要在历史里找到考据，我们要在当下找到细节，如此，我们的阅读才能够不断展开，我们的写作才不至于凌空虚蹈、不至于好高骛远。

现在我相信，当一名读书人拥有了一种学术传承的能力，他会知道自己站在哪里，他会愿意谨慎地写下每一个句子，他会前所未有地去热爱文献，热爱考据，前所未有地热爱田野调查，他所写的书会是一扇窗口，读者能够由此走进历史，走进更加宽阔的世界。

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是一种非虚构写作必须要坚守的技术。几年前，我曾经读过民国新闻人陶菊隐先生的《武夫当国》，他的写法就让我存疑。读《武夫当国》，常常被场面和故事吸引，140万字的著作，典型的全景式叙述，我们能看到军队之间的格杀场面，也能看到军阀们在密室里的阴谋。关于全景式叙述，显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写作方法。对于历史的叙述人而言，全景式显然是不可能的，必然要加入很多个人想象。这就是问题所在。这种由来已久的叙述技巧事实上是中国文人写作的传统手段，其不足之处是必须预设一双无所不在的眼睛。后现代的叙述家们发现了其中的弊端，因此才有新技术的引进。比如，大家熟悉的《史记》，就具有全景式写法的诸多特征，从人物对话，到人物心理，司马迁均无所不写，而后来索引一派的出现，应该是意识到了全景式的不可信，才把功夫放在考据之上。有意思的是，在部分史家们看来，司马迁才代表了历史写法的主臬。顾炎武在《日知录》“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篇章中，有“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之语，可见顾炎武对司马迁全景式写法的推崇。全景式历史生动有趣，而索引历史则忠实于所见史料，不能出现丝毫臆想，因此，索引派历史必然干瘪，缺少情绪，缺少文采。白寿彝先生有感于这种现象，提出了“史学界应该向司马迁学习，要改变我们的文风”等观点。



可能正是这种看上去有些模糊的方法论之争,也可能是为了迎合一般读者的阅读惰性,我看到很多作家似乎更愿意把历史写成传说,把人物传记写成故事会。这样的文本让真正的读书人沮丧。难道只有这种非常不严谨的,市井化的写作方法才能赢来读者吗?不见得!比如我最近读过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虽然充满了考据性文献和调查式索引,但丝毫不能影响这本书红遍世界;比如吴思的《潜规则》、《血酬定律》,也尽量做到了史料清晰,考据严谨,这是两本将考据和分析结合得比较得体的畅销书;比如林语堂先生的大作《苏东坡传》,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都是考据翔实、文字优美的大好著作。我还读过布鲁斯·考德威尔的《哈耶克评传》,我看到人类社会在19世纪后期和整个20世纪,计划经济和政府管制是怎样节节败退,而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又是怎样终于主宰了我们每个人的幸福生活。

我掩卷沉思,如此豪迈的历史画卷,几个可口的故事怎么能够承受?几个孤立的人物怎么能够表达?

图2为杨小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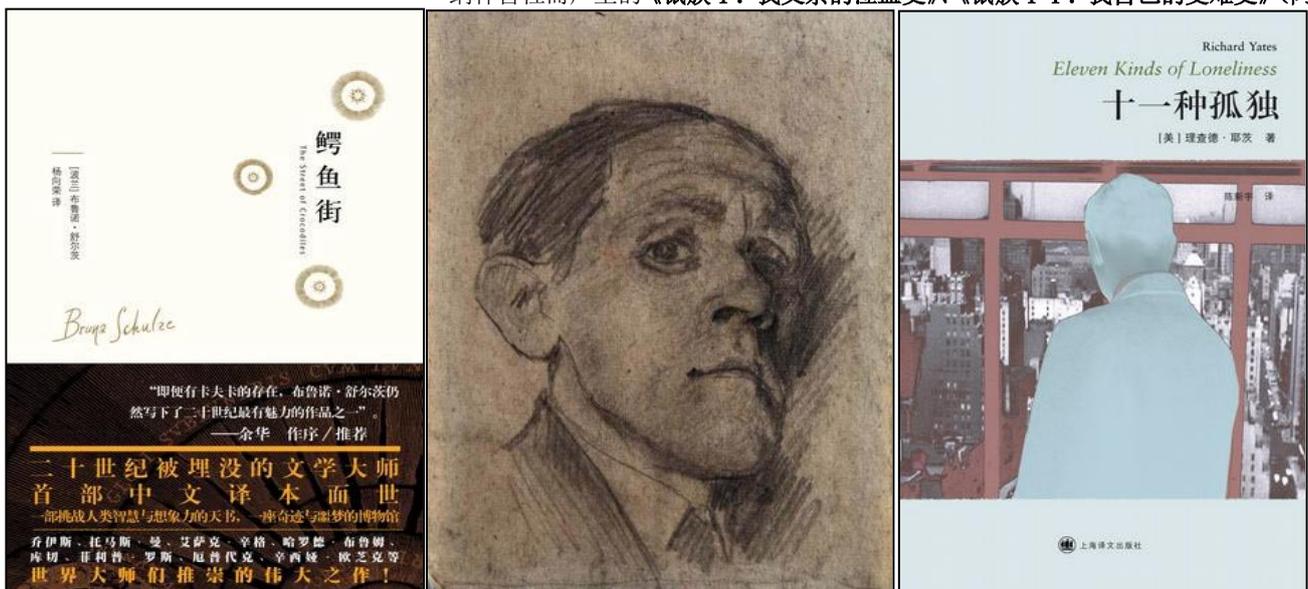
ESSAY&FICTION 散文与小说

观察员 朱白 (广州, zhubai@tom.com)

不知道是不是出版社有先知,对于侯麦和他的影迷来说,这本恰到好处的《绿光》(凡尔纳著,王琪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12月)再版,应该是一次不错的纪念。埃里克·侯麦(Eric Rohmer, 1920.4.4-2010.01.11)是上个世纪最伟大的导演之一,他那悠长的抒情调子,总是可以击中一些对生活准备不足的年轻人,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他一生的影片,我觉得用“寻找并质疑爱情”非常合适。“谁能看到绿光,谁就能找到幸福”,这是《绿光》中的一句话,侯麦从凡尔纳的这句话得到了灵感,借题发挥成一部寻爱的电影,当我们每个人对爱和幸福都保持着一副恭候多时的姿态时,是否真的可以得到,侯麦用热情展现了一次次无动于衷的表情,其实,他很悲观。

就像被挖掘、被发现的曹操墓地一样,出版界也有人在做着挖掘和发现的工作,比如翻译和出版一些被埋没的天才大师。只是我们被哄骗的太多,一些所谓的发现不是再次沦为“被埋没”的灰尘中,就是欺世盗名而被人唾弃。刚刚出版的这部《鳄鱼街》(布鲁诺·舒尔茨著,杨向荣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其实大名在小说读者中早已有之,不存在被哄骗一说。还没来得及及仔细看,我也不能在这多说,多说会露怯,只是提醒一下关注小说的读者吧,不要被腰封上印满了著名作家推荐吓坏了,它可能真的值得你看一看。

《鳄鱼街》的作者舒尔茨在死于纳粹枪杀前,画画和写小说,毫无疑问纳粹的兽性对其创作有了很大的影响。直接因为纳粹兽性而产生的《鼠族 I: 我父亲的泣血史》、《鼠族 II: 我自己的受难史》(阿



特·斯皮格曼绘,王之光等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12月版),是一部漫画作品,作者用图像作品同样表达了阴郁并让人不安的内心世界。作为一部历史上惟一获得过普利策奖的漫画作品,它逼真地再现了纳粹时期的黑暗,逼真的

逃亡故事来源于真实的经历。人都一样的，在历史的关头总要做出个人的选择，也许在宏大的历史面前这样的选择算不上什么，但它却是构成个人生活的最重要部分。漫画作者分别讲述了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遭遇，并且有着独立而完整的精神寄托，本书虽是漫画，却并非我们惯常以为的卡通，也许这种残酷的现实只能用作者的粗犷风格来展现。

给小人物树碑立传已经成为文学写作的一种模式，在今天大多数仍然容易陷入宏大历史中不能自拔来说，这种写作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部浩瀚的历史。美国作家耶茨有部名著，名为“十一种孤独”，描写了生活在纽约的普通人生活，他们孤独、失望、困惑，有着大多数人的不安。如果你不是那种自以为是人读书人，《十一种孤独》(耶茨著，陈新宇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月)应该值得一读。耶茨跟契可夫一样，对平庸生活有着细腻观察力，他几乎可以不动声色地描写出人类那种天生的病——孤独。

《我读》(凤凰卫视出版中心著，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1月)其实算不上梁文道的著作，它只是近来“梁文道热”的一部跟风之作，但从受益广度来讲，显然对于很多看不到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的内地观众来说更容易阅读和接受。喜欢看书并很能看书的梁文道，说起书来总是娓娓道来，给人一种传授和灌输的作用。在一份不久前的问卷中，梁文道称自己一年看了300本书，这显然是个惊人的数目，但你看他每天在荧屏里的八分钟可能也不难猜想这是一个怎样敬业和痴迷于书籍的人。也许是浮皮潦草，也许是翻阅中寻找重点句子，也许是传播寻来的知识点和有趣的价值，也许是旁征博引典故为了让你找到历史长河中的某个交叉点，但这些都是梁文道作为一个职业读书人可以在短时间内让人获取最大效益的优点。作为一档电视节目，个人觉得《开卷八分钟》应该是梁文道自己撰稿，至少应该是靠他自己在镜头前自觉发挥为主，因为他在电视里说的话和他在文章中写的字，语气和气场是一致的，甚至你在观看和阅读时感受到的是同一种方式，就是娓娓道来、细腻阐释，有着一股刻意而舒服的原意为人服务的态度。

到了该介绍我喜欢的青山七惠作品的时候，说实话，写这份报告的时候我就一直期待这位年轻的日本作家出场。《温柔的叹息》(竺家荣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月)已经是青山七惠在中国出版的第三部作品了，按理说她的作品已经留给人们足够深的印象，谈论和喜欢她的人越来越多，但我觉得青山七惠的那种“淡淡哀伤”的风范还没有被足够认识，或者是人们常说的作品不够、作家年轻吧。当然，我们同样可以把这种观点当成屁话，因为你不能著作等身不顾质量就说自己优秀，数量有时候跟质量并不发生关系。《温柔的叹息》仍然是一本小册子，包含两个作品，分别是《温柔的叹息》、《捡松球》，篇幅都不长，温暖而无奈，其中《温柔的叹息》以弟弟的视角观察了姐姐的生活，亲情的温暖、成年人感情世界的无奈尽情流淌在青山七惠不动声色的笔调中。如今青山七惠已经成为日本文艺奖、芥川龙之介奖、川康成文学奖等奖项的获得者，她的作品足够迷人，并连续不断地可以传递到如中国这样的异国他乡，这真是一个幸福的作家。读她的作品，虽然容易陷入一种哀婉不明的情绪中，但能体会到这样一种人类的真情实感，我觉得也是一种幸福。



图2 为布鲁诺·舒尔茨

LITERATURE&NONFICTION 文学·非虚构

观察员 朱航满 (石家庄, zhm7976@126.com)

偶然在书店里发现蒋彝先生的一册《伦敦画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1版)，起先是被这书优雅的设计所打动，封面采用的是很有些印象画派风味的油画，书内则另有多幅韵味十足的书法与绘画作品，并配以疏朗清秀的文字内容，很有一种高雅脱俗的艺术气质，在书店杂乱的书中显得十分不凡。于是归来后，灯下翻阅，才知道蒋先生是一位曾旅居英

伦的散文作家，更为重要的还有，先生本就是一位十分卓越的艺术家，他擅长中国的书法和绘画，受到过良好的艺术教育。我看那简历，几乎又是一阵的惊叹，蒋先生出生于上世纪初的江西，青年时曾弃笔从戎，参加北伐征战，后在江西出任地方政府官员，谋求改革，但苦于时弊丛生，才不得不放弃政务，只身前往海外。蒋彝旅居海外时，曾先后在英国的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美国的哈佛大学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等一流学府任教，并在教学与旅行之余，尝试以“哑行者”的笔名写作旅行笔记，先后有十二册出版，分别有《湖区画记》、《伦敦画记》、《战时画记》、《牛津画记》、《爱丁堡画记》等。这些旅行笔记以英文写作，且皆由他亲自操刀设计装帧与插图，加以他细腻幽默的文章笔法，很快就成为当时海外书界的畅销作品。现在我手边的这册《伦敦画记》便是由台湾淡江大学英文系毕业的阮叔梅女士精心翻译而成的，也是国内首次介绍蒋彝先生的作品。



我细细品读蒋先生的这册《伦敦画记》，十分欣赏先生的书法作品，清秀藏风骨，很有些古典神韵；而我也更是喜爱先生的绘画作品，特别是这些画作以中国的绘画技法传达英伦风景，更是别有韵味，难怪英国人看到这些艺术品时会有眼前一亮的感受；先生的文笔更是很不一般，常以轻松幽默和优美细密的表述传递他对于海外生活的观察与感受，在这些文章中，他常常以传统中国人的视角出现，使得那些本应熟悉的景物和生活场面顿时显得有些陌生。在这些文章的叙述中，他频繁地引经据典、纵论东西文明，又挥洒自如，轻松地回到日常的现实世界中来，因此，我在他的身上既可以看到一位中国传统文人的儒雅形象，又似乎具有着西方绅士的翩翩风度与气质。而由于这些作品又大多写于中国抗日战争的国难时期，因此我读他的文字，每每可以发现这位游子对于故乡的思念与忧愁，许多细节让人十分难忘。他笔下的那些关于伦敦四季风景以及异乡生活场景的叙述，我以为恰恰正是寄寓和传达他个人乡愁的最好途径，记得在《月下伦敦》一文的结尾处，便有这样让人动容的叙述：

去年九月，大约中秋左右，我意外收到一位年轻中国女孩的来信。我十年前认识她，却已八年没见过面。她信里什么都没写，只抄了我在秋天那章所录苏东坡的诗。结尾处她加了些字：“月既圆，为何缺？”我的思索奔腾，无法抑制，于是冲到汉普斯特德林区，想看看那儿的月亮。

亮。那夜无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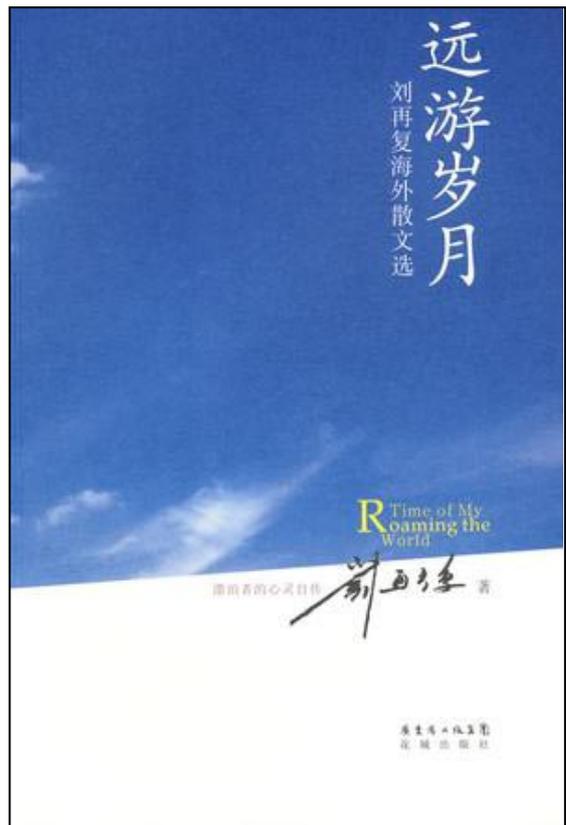
由蒋彝先生，我想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浪迹海外的那些华人游子们，他们在异国他乡思念着故乡，而又创造出了令人惊叹的成绩，仅以我所熟悉的人文领域为例，便有因传播东方文明而写出《吾国吾民》与《生活的艺术》等杰出著作的林语堂先生，在英国伦敦任教时开始写作并最终享誉世界的老舍先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高行健先生，以深厚的文艺底蕴而荣选法兰西学术院终身院士的程抱一先生，创办“国际写作计划”又著述颇丰的聂华苓女士，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而在欧美享有盛誉的夏济安与夏志清兄弟，获得享有“人文诺贝尔奖”美誉的克鲁格奖的余英时先生，屡屡摘得美国最为重要文学奖项的小说作家哈金先生，等等。当然，还有众多我未曾目及的作家和学者，他们的杰出才能已经成为整个世界的精神财富。由此，我便想，若是有一册著作能够重点研究或介绍一个世纪以来浪迹海外的华人在人文思想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一定是非常具有意义的事情。而我近来正好读完作家苏炜的一册散文著作《走进耶鲁》（凤凰出版社，2009年1月1版），便是写到了他浪迹海外多年，最终在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进行教书育人和写作研究的人生风景。苏炜在书中感慨，他之所以能够在异乡里安身立命，便是因为在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里有一群华人游子团结一起，创造了一个神奇的“中文乌托邦”。在这所由著名学者孙康宜女士担任东亚文学系主任的教学研究单位里，还聚集了来自大陆的才子学者康正果，台湾著名的抒情诗人郑愁予等多人，他们一起在海外创建了一个吟诗读书的乌托邦世界。

我读苏炜的这册洋溢着才气与激情的散文集，感慨他在异国他乡里能够继续自己的文学梦和作家梦，在没有母语环境的世界里却感受到一种温暖的创作氛围。为此，他就特意写到这样一个细节，作为东亚系主任的孙康宜女士积极倡导以中文进行研究和创作，她率先在几个中文教师的信箱里留下自己新作的中文稿件，安静地等待着大家的交流和意见，由此便逐渐地

形成了一种十分默契与浓厚的中文创作与研究的氛围。而更令我感到慨叹的还是作家在异国他乡里，逐渐地形成了另外的一种全新思维和眼光，使得他跳离出了过去固有的观念束缚，从而具有了一种十分冷静与带有距离感的审察，诸如在这部作品中他所写到自己在美国教书的见闻与感受——上课不必再受到任何的内容审查，开会也不必如以往的谨慎小心，图书馆可以自由地借到自己所需要的任何著作，学生独立的气质与杰出的成就让他这个做老师的也常常大吃一惊。而更让他备受激荡与沉思的是，他在文章《史力文为什么中止了学中文？》、《一个并非虚构的寓言》等文章中通过对两个不同国度孩子的教育而发现中国教育的危机与悲哀所在，诸如他所提及的那个在耶鲁留学的中国学生，却被同学们私下里称作“ROBOT”——对历史一无所知，却固执机械地维护着所谓的尊严——想来都是令人感慨的恐怖与悲哀。

倒是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在耶鲁大学任教的苏炜，在他为西方文明所击节称许的时刻，却在回望自己民族的文化财富时，又十分执着地对中国经典的传统文化表达着极为虔诚的敬畏与喜爱，诸如那一把高山流水的古琴，那一册埋没乡野的旧体诗稿，那一首首经久流传的唐宋诗词，都让他在异国的土地上魂牵梦绕，夜不能寐。他在文章中多次写到同样侨居美国并有着深厚传统文化修养的张充和先生，那是一种敬畏与承传的心态；而他对苏东坡这样的中国文人的赞叹与欣赏，便也有了一种对于生活与人生的期许暗暗藏于其中的。与苏炜有所相同的，则是客居美国的刘再复先生。浪迹海外多年，刘再复先生终于在美国科罗拉多山下开始了新的人生。在那里，这个曾经在中国知识界叱咤风云的知识分子潜心阅读中国古典文化，终于完成了他为之骄傲的“红楼四书”，其中分别包括《红楼梦悟》、《共悟红楼》、《红楼人十三种解读》、《红楼梦哲学笔记》（三联书店，2009年）等四部。这几册著作我断续读完，很惊诧刘再复先生以“悟证”的独特方式研究这册文学巨著，让人耳目一新，而其在文字中散发出浓厚的自由与古典的气息实在让我折服，读来犹如天女散花，落英缤纷，可见这些研究文字在刘再复先生来说，实已入哲思化境了。我不是红学的研究者，不好在红楼梦研究的体系之中评判刘再复先生的研究文字，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著作的阅读者，我在处处都可以发现一个中国文人游子在异乡生存的精神根底所在，在他的“红楼四书”的总序中，便有这样的夫子自道：“德国天才诗人海涅曾把《圣经》比喻成犹太人的‘袖珍祖国’，我喜欢这一准确的诗情意象，也把《红楼梦》视为自己的袖珍祖国与袖珍故乡。有这部小说在，我的灵魂将永远不会缺少温馨。”

在海外漂泊的日子里，刘再复将自己的写作归结为继续活下去的“一千零一夜”，为此他还创作了为数众多的散文作品，一起归结为他浪迹海外的“漂流手记”，其中便包括有《漂流手记》、《远游岁月》、《西寻故乡》、《漫步高原》、《独语天涯》、《沧桑百感》等九卷文集，这些著作大多在海外出版，我自然是无缘全部读到，但是近来读到的一册他的散文集《远游岁月：刘再复海外散文选》（花城出版社，2009年8月1版）便是这其中部分文字的精选。从那些被遴选出来的文字之中，我可以发现一个游子在海外漂泊的沉思与体悟，令我感到惊诧的是，在这些文字之中发觉的不是痛心疾首，不是落寞孤愤，不是叹息抱怨，更不是压抑绝望，而是美好、自由与希望，是沉思与歌唱，是对生活的热爱，更是对世界的拥抱。为此，他在书中感叹，自己出国以来仿佛是得到了一次“重生”，不但是现实生活上的再生，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彻底蜕变与洗礼，因此读他文集便有了上述的感慨，这也让我忽然想起他与高行健的一次对话，其中便谈到了自己在海外生存的精神追求。刘再复说，高行健曾在他出国之初告诫自己的那番言谈，现在想来早已成为他脱胎换骨的精神指南，而在这篇对谈之中也便会有这样的议论：“一个作家当然有自己的政治见解，在现实政治中，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乃至于公开发表政见，批评当权者或者集权政治。我就一再表明我的政治态度，而且从不妥协去顺应潮流或谋取利益。但是，我的文学创作必须远远超越现实政治，不作政见的传声筒。把文学变成政治控诉或呐喊，只是降低了文学的品格。文学不屈从任何功利，也包括政治权力。”（《禅性与文学的本性》，载《书屋》杂志 2009年4期）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

观察员 成庆 (上海, veron.cq@g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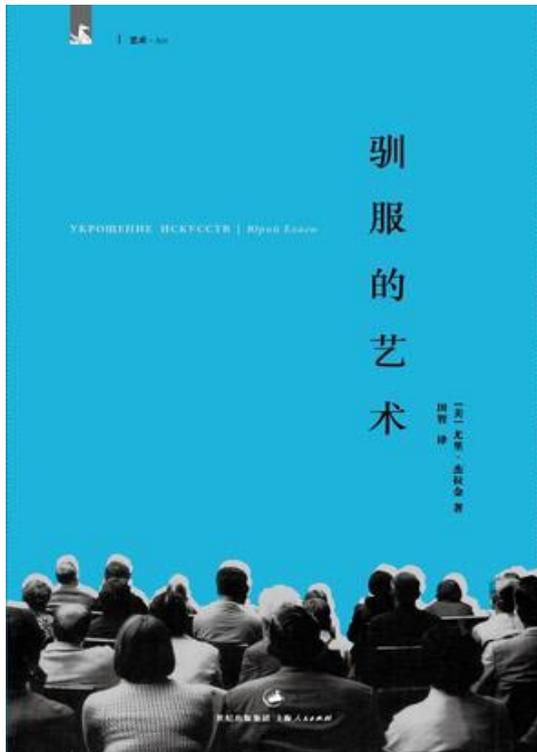
首先还是讲个笑话吧,前苏联瓦赫坦戈夫剧院的演员公寓里住着著名的戏剧导演波波夫,他在自家阳台上种了花,把花盆固定在阳台外面的栏杆上。

一天,管理员给波波夫送来了剧院经理鲁斯拉诺夫的便条,请他将花盆移到阳台内的栏杆上,防止花盆跌落砸伤其他人。波波夫作为前苏联的功勋导演,自然牛皮哄哄,当场回了个便条,说花盆固定很牢,不会出问题。

第二天,鲁斯拉诺夫发来一份盖有公章的正式通知,要求移动花盆,波波夫没有搭理,于是区警察局的一位警察遵警察局局长命令,要求波波夫移动花盆。波波夫也不是吃素的,他第二天拿到了莫斯科市警察局长乌尔的授权书,但是这激怒了鲁斯拉诺夫,他从苏联全国警察总部部长马卡利安那里得到一份文件,宣布废除莫斯科警察局的命令,必须立即搬走花盆。波波夫马上反击,他以红军剧院导演身份请求紧急拜见红军总司令、政治局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元帅写了封信,命令“立即停止对红军剧院导演波波夫通知的无聊骚扰,因为他在工农红军剧院的重要创作活动需要安宁熟识的环境。”

不过鲁斯拉诺夫是“超人”,他不可战胜,他以私人身份找到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和苏维埃主席加里宁,他从那里得到了搬走花盆的文字命令。

波波夫终于认输了,他没有去找斯大林,也无法找到更大权力的人,结果他终于搬走了花盆。



这则故事来自于尤里·叶拉金的《驯服的艺术》(田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之所以在这里占用这么长的篇幅转录这个故事,不只是因为在这里面看到艺术和权力的复杂关联,而是读到这个故事,让我感觉到某种“荒谬”感,之所以“荒谬”,在于“花盆”和“最高权力”的这种极端反差,在一个全面政治化的世界里,“花盆”也会被赋予了“权力斗争”的含义,它的移动是和党中央联系在一起的,就如同在中国用手机发一个黄段子也会受到停机威胁一样,“禁黄”并不是因为道德纯洁化的问题,而是在于“禁黄”这个动作本身,也就是说,“花盆”的移动最终不是斗争的最终目标,更重要的是由谁来主宰移动花盆,这就像我们的主管部门可以随便抛出一个“打黄打非”,就可以主宰我们上网、主宰我们发送短消息一样,他们真的在意道德议题吗?就算我本人天真浪漫地相信这一点,恐怕他们自己也不会相信。

“荒谬感”和“真实意义的丧失”是哈维尔对后极权社会的描述,如何对这样的精神症状有所应对?有朋友提醒我,徐贲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10月)里记载了当年捷克的现象学运动,许多捷克知识分子依靠现象学来恢复后极权社会环境下的存在意义。胡塞尔非我所爱,不过那位朋友却疑惑地问我,现象学怎么和沃格林的“体验”哲学如此相似?沃格林的确受胡塞尔思想影响很深,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是恢复真实体验的重要方法,但是沃格林却不认同胡塞尔那种“终极天启式”的历史哲学,认为那只不过是一种现代科学思维的僭妄症,关于这个问题这里自然无法赘述,但是这个事实却提醒我们,哲学其实也并非只是书斋里的学问。

前面谈到前苏联,最近看了一组NHK拍摄的关于俄罗斯转型的纪录片《普京的俄罗斯》,绝对应该够上四星半级别,值得推荐给大家。边看时,心里想的仍是本土本乡的那点儿事儿,不时地会冒出这样的念头:“假如我们转型了,会像俄罗斯这样吗?这样是更好,还是更坏?”普京相信“国家主义”,同时也是个现实主义者,他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任何人如果不为苏联的解体而感到痛心的话,那是没有良心的,但任何人如果想要重建苏联,那是没有头脑的。”在普京那里,姓氏姓资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俄罗斯帝国的“双头鹰”能否恢复前苏联“镰刀与斧”的社会主义帝国荣光,所以连俄罗斯的国歌都是直接拿的是前苏联的赞美诗重新谱词。在NHK的纪录片里,最让我感到震撼的不是“国家主义”,而是东正教的复兴速度。普京扶持东正教,让他们来补救前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但是东正教中所存在的那种“反西方主义、反犹太主

义、孤立主义”情绪却让人感觉不安，而且这种东正教精神如今也已与索罗维耶夫、别尔嘉耶夫这些宗教哲学家的思想联系起来，构建起一个独特的俄罗斯灵魂谱系。关于这方面，可以参考弗洛罗夫斯基的《俄罗斯宗教哲学之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这本经典之作。

中国人其实心里也想搞文化复兴，最近上映的《孔子》就是这种国家主导的“文艺复兴”行动，可惜“复兴”的水平太差，人见人骂，骂的让人看盗版的念头都没了。其实中国知识分子也有老老实实作基础工作的，不过这些学者大多无意经营国家意识形态，可能也没有当“国师”的念想，因此大多对儒家、佛学的研习只与个人心性相关，虽然只关涉个人，在我看来却是大气中正。就拿最近读的李四龙所著的《欧美佛教学术史：西方的佛教形象与学术源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来说，这本书的学术史梳理部分这里无需详介，作者的后记读来却让我感动不已，“四十不惑，这其实很难。孔子他老人家的人生履历，放到我们这些凡夫身上，还真不好学。这十年里，父亲去世了，儿子出生了，2003年11月，我办完父亲的丧事，从上海赶回北京，第二天正好是我儿子出生“百日”，去王府井的‘中国照相’拍了一张全家福。这是我第一次严肃地面对‘生命’。我的儿子在渐渐长大，我也一再地感悟人生：儒家赞叹‘生’之大德，佛家却要体认‘无生法’。现在，日复一日，学会了体验‘当下’”。初看上去这只不过是自曝家史，不足为奇，但是他所描述的却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生命体验，国人不信上帝，对生命的理解往往来自家族史的叙述与清理，当父辈作为生命的源头逐渐远去，我们自身作为生命记忆共同体的“角色自觉”便自然浮现出来，这就是中国人的独特生命观，看上去零散琐碎，背后却是一种关于生命的“严肃”与“庄重”。



正因此，所以我常会在意去观察和重现这种家族史里的独特体验，例如我爱读张大春的《聆听父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而且还会设想，假如今天能恢复出对家庭关系的传统“触感”，或许这才是“儒家”复兴的基础所在，因为是“皮肤触觉”和“气味嗅觉”主宰了我们的信仰，而不是某个教团或者某种强制性的意识形态。

清理家族史，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项别具意义的工作，如前面提到的《聆听父亲》，还有我在黄鱼车上买到的巫宁坤的《一滴泪》、章诒和的《这样事和谁细说》，都是以个人及家族的命运来折射当代史的悲情，但是对于传主而言，回忆其实也是一种治疗与反思，就像柏拉图所言，我们的回忆（Anamnesis）其实是在溯源真理、寻求至善。

中西之间，其实也并无太大的差别。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

虽然《图书公平交易规则》大兵压境，我依然顶风作案，三番五次窜访打折书店。在打折书店经常会有一些“艳遇”，比如文辉女士的《历史拐点处的记忆：1920年代湖南的立宪自治运动》（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1月），我想全价购买而不得，一进打折书店却发现它在丛中笑。再比如李晓斌先生的《变革在中国》（浙江摄影出版社，2003年12月），我完全没有想到它会出版。李晓斌的代表作是《上访者》，那个身穿破烂棉衣、胸挂毛主席像章的上访者为他带来许多名声，也掩盖了他的更多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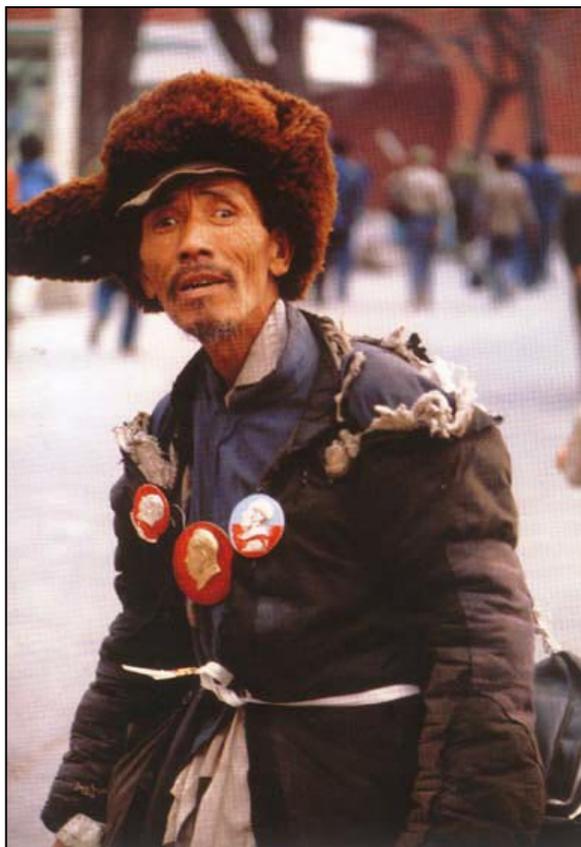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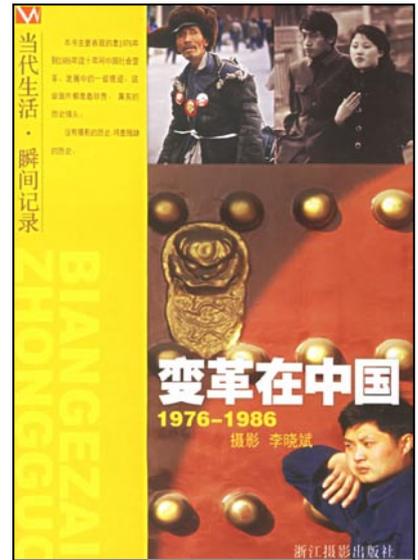
李晓斌手边有20万张底片，他以一己之力保存了一部影像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变革在中国》仅仅收入了1976至1986年间的一百多幅照片，不及千分之一，但已足以让我流连忘返。书中收有更多的上访者照片，其中一张是在1978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两周年，一些上访者在天安门广场“散步”，要求平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看到那些手中拿着花朵的

面孔，我不禁庆幸他们赶上了好时光。那些大胆包天的上访者是否会想到，三十多年后的神州诞生了“非法献花”一词？针对这些刁民，山东省新泰市已经总结了成功经验：“公安机关依法打击一批、精神司法鉴定治疗一批，集中办班培训‘管’掉一批。”

书中收有李晓斌和丁东两位先生的对话，贡献了很多耐人寻味的陈年谷子烂芝麻。在“四五”运动时，身份证尚未诞生，有关部门如何锁定非法散步者？不要着急，积极分子们自然会抄下散步者的自行车车牌，供我专政机关按图索骥。李晓斌也被抄了车牌，幸亏公安人员认识他，没有大义灭亲，而是法外容情，放过了他，也在无意中放过很多见证历史的照片。

2010年1月11日《南都周刊》的封面报道是“拆迁荒诞剧”：“因为拆迁，原来的信访办主任走上了漫长而无望的上访道路；因为拆迁，原来的拆迁队长应聘为职业‘钉子户’；因为拆迁，现任的法官摇身成为了告状人。这种连最天才的编剧也未必编造得出的角色转换，将拆迁这部大戏，从正剧变成了荒诞剧。”这种荒诞剧，历史悠久。1998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的专题片，准备使用《上访者》，但片子需要经过17个部委审查。编导们担心通不过，没想到中宣部副部长白克明率先支持，原来他的父亲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他和弟弟在70年代末也是上访一族。书中称白克明的父亲曾任河北省委书记，查阅白克明父亲白坚的简历，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没有担任河北省委书记的经历。倒是白克明后来先后担任海南省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并且在接受采访时对上访户“口下留情”。

在《变革在中国》里，可以看到恍如隔世的西单民主墙、“星星画展”，但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的微观变革，比如风起于服装、发型、饮食之末时的景象。即使是历史的关键时刻，李晓斌也是从日常生活入手，比如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他拍摄的是一位公交车上的拍摄者，摄影者和被摄影者形成互文关系，公众从被记录者转变为记录者。



我同时买了一本打折的《追忆瞬间》（江苏美术出版社，2002年），作者李振盛先生的代表作是《虔诚者》。如果把《上访者》和《虔诚者》放在一起，会相看两不厌。《追忆瞬间》以文字为主，图片为辅。李振盛拍摄的文化大革命照片，非常重要。但是我对他的文字不敢恭维，甚至读后产生副作用。1979年，黑龙江省宾县煤建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王守信因为私设近50万元金库，被称为“建国以来最大的贪污犯”，先是公审判决，然后执行死刑。在《处决王守信刑场目击记》里，李振盛这样写道：

为了能够拍到王守信最后时刻的面部表情，我先从她身前一米左右的地方假装若无其事地横向往走过去，边走边调照相机

的焦点距离。走过去之后随即转身，以同样的步伐往回走，当走到她面前时，我突然蹲下来，迅速取景并按动快门。这一系列动作都是在瞬间之内完成的，就这样，在王守信尚未反应过来的片刻之间，我顺利地抓拍了一张王守信木然地跪在那里，眼睛无神地看着相机镜头的特写照片。

在枪响的一瞬间，我也按下了相机的快门，拍到一张难得的照片：王守信的头部被子弹击穿，脑浆迸裂，冒出来的热气与寒冷的空气相接触，立刻就在她的头顶上方凝成了一团白色的气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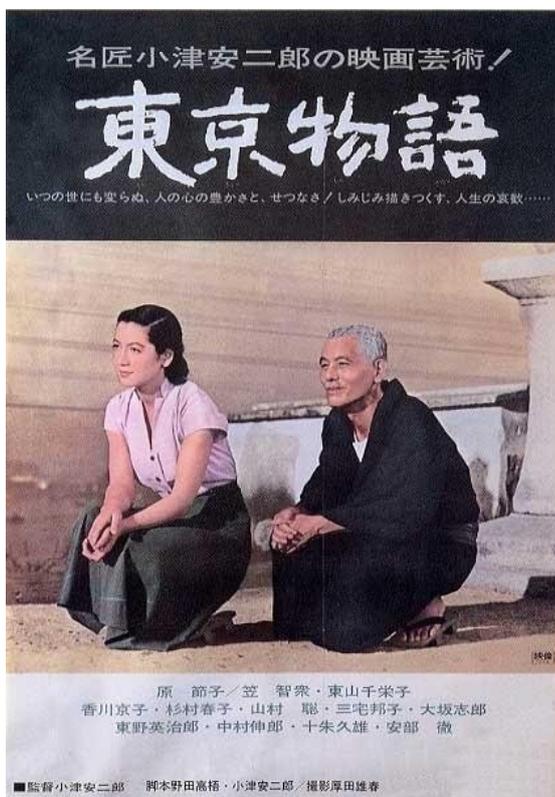
李振盛把王守信视为罪大恶极的反面典型，称她是“在看押期间仍旧不思悔改的贪污犯”，当王守信表示不服判决，李振盛这样写道：“观众席上的群众表情严肃，厌恶地看着她在场内拙劣的表演。”在网上的博客中，李振盛对王守信的评价更为模棱两可一点，他透露，胡耀邦曾希望不要急于杀人，先将此案调查清楚再说，但是王守信还是被从重从快地枪毙。两个版本的差异，不知是否因为尺度不同。如果李振盛爱惜羽毛，应该将《追忆瞬间》买下烧掉。

最后推荐《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2月），黄宇和先生通过详细的资料还原孙中山伦敦蒙难的前前后后。这本书早已打折，此次购买，主要是想看看革命前辈的英雄神话是如何制造出来的。这种研究或许让后来者有所忌惮，但更有可能鼓舞了后来者，既然制造神话可以成为“国父”，那还有什么神话是不可以制造的呢？阅读《孙逸仙伦敦蒙难真相》，正是为了提高辨认神话的能力。人人都有火眼金睛，神话自然会现出原形。

图2为李晓斌作品《上访者》，图3为李振盛作品《虔诚者》

CINEMA&URBAN SOCIETY 影世

观察员 言一（香港，richard7briner@gmail.com）



周日起了个大早，连早饭也顾不上，为的只是能准点赶上小津的《东京物语》。曾经从不进影院的我，现在却几乎三日不进影院便觉憋得难受，影院空间的魅力固然难以抵挡，而能在大银幕上细读小津那一幅幅精雕细琢般的镜头亦大约算是人生幸事之一了。

只是在这里，我并不打算将文字的篇幅放在对小津镜头的分析之上——一来是力有不逮，二来懒于拉片——相对的，我所希望呈现的，却是小津有意或无意向我们展现的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代际关系。让我注意到城市这一话题的，是影片开始不久后的一个情节：大儿子租车去接二老，从东京车站到自家住地，竟有着半小时的车程。显然，大儿子的住地位于东京的市郊。这一点从其住宅周围建筑的风格也可看出。想来也正是从那时起，二老开始意识到自己儿女在东京这座大城市的生活未必像看上去的，或是想象中的那样美好。也正是从这一刻起，城市生活，或者现代生活的节奏开始作为一个扰乱因子发挥效力，而彼时日本代际间的紧张乃至冲突也由此渐渐浮现。

计划好的出行因突然而至的病患取消；忙着打理自家理发店生意的女儿亦是分身乏术，反倒是寡居的儿媳请假带着两位老人在东京城里游历了一番。东京城很大，老人在城市的高处发自内心地感叹到；而作为一个并不明显的对比，儿媳的居室又是那般的狭小。女儿在楼下叮嘱丈夫不要再买昂贵的糕点回来；一回头又和自己的哥哥合计着其实让老人自己出去旅行在时间和金钱上都更为划算，以至于老人们

的突然归来竟不得不另觅住处。及至母亲病危，儿女所盘算的亦是归家之旅对于自家生计的耽误；再至母亲病逝，丧事结束，儿女拿着纪念物匆匆离去，回复各自工作生活，只留儿媳陪伴孤老。那表面始终平淡如水的老父，其内心种种体悟又岂是寂

奠二字可以当的。

上述的种种细节，初看之下，只会让人想起所谓的伦理道德，也即为人儿女究竟该如何对待亲生父母，孝道二字究竟该如何书写。但若我们换个角度提问，则会看到完全不同的景象。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或因素使得片中的亲生儿女都将自己的工作置于父母之上，是一种什么样的动力能让他们选择在丧事完毕之后即刻离去，丝毫不顾家中老父？对这样的问题，影片末尾，儿媳(原节子)对家中最小的女儿之间的对话颇值得玩味。儿媳说：孩子长大，会渐渐离开父母的。到了他们这种年龄，都已经有一个和爸妈不同的私人生活。他们绝不是恶意的，因为任何人都是最珍惜自己的生活。小女儿说：是吗？但我不想变成那样。这样的亲情没什么意义。儿媳再道：虽然不希望如此，不过每个人都会变成这样的吧。等我再婚，也会变成这样的。



不难想象，这样的一种代际相遇，紧张。如果没有老母的去逝，放在眼下或许会轻易被冠以代际冲突，或者代沟而一笔带过。可正是片中所呈现的这样一种生离死别逼得我们必须去面对前述的拷问，必须去面对一种(我称之为)资本主义伦理与传统家庭伦理之间的选择。之所以将这种城市生活中的“合情合理”称为资本主义伦理，乃是因为纵观城市化进程，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在其中可谓居功至伟。不管是从

马克思还是亚当·斯密出发，我们都可以看到资本的魔法乃是源自交换(exchange)与流通(circle, flow)，而城市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巨大的交换平台，大量的人力与物资在此汇集，互相交换，各取所需。而这样的一种集中交换，在其交换的过程中还包含有一种自我加强的机制。换言之，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力和资源流向那些最为早期的城市，城市的规模亦随之不断扩大。可以说，如今城市的荣光，全都归于资本主义的逻辑。而随着城市的规模越来越大，人力与物资越来越多，对交换效率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从而，一个人若要在城市中生存，则势必要配合他人，或是这个城市的节奏。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大规模的配合与协作当中，人的生活节奏不再是通过在某个小群体(communitiy)内部的协商来确定，而不得不服从与一种不知源自何处的普遍节奏。于是，正如Henri Lefebvre 指出的那样：如果某天某个城市的时钟忽然集体快了或者慢了一个小时，那将意味着一种灾难。

如果我们在上述的语境之下，再次检视片中儿女的行为，便会发现：儿女之所以最终选择了资本主义伦理，正是因为长期的城市生活已经让他们将东京这座城市的节奏内化到自身身体之中。一旦脱离了这样的节奏，便会感到紧张与不适，急切地想要回归。马克思所谓对人之异化，莫过如此。在此，我们甚至不妨去想象一种前现代的非城市生活，一如片中老人那个临海的故乡。若是没有城市，子女亦都不曾远去。那么家庭，便会成为主导生活节奏的核心，世事的运转亦会是另一套不同的逻辑。面对着，这两种不同的逻辑与节奏，我相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在此，我亦无心去做褒贬之分。只是当现实生活中，当火车毕竟带走了许多人的儿女，当对故土与家庭的梳理造就了城市的辉煌，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回头重新审视城市化

在儿媳眼中，现实的生活，尤其这城市生活乃是造就这凉薄的源头。作为一名医生，难道不正是该以病患需求为第一要务么；而一家店铺若是时开时关，则极易失去顾客。片中儿女们的行为，若是放在我们眼下的生活当中，其实竟是那样的合情合理。只是，父母的出现对这一情理提出了挑战：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而这样的拷问，亦并非一个伦理抉择那么简单。



进程本身与当初被轻易，决然抛下的另一种生活的节奏与可能。至少，应当看到在这个流动性极高的社会，城市的生活，实际上是**反家庭的(anti-family)**。

鲍曼所常用的流动性(liquidity)与维希留(Virilio)的速度(speed)，都是解读城市生活的极好关键词。就在观影的过程中，我亦曾问自己，若是当时的火车换成眼下的新干线，事情会不会不一样。无独有偶，2008年的一部德国电影《樱花盛开》(《Kirschblüten - Hanami》)几乎是从事实层面给出了回答：依然不会。因为随着火车的提速，飞机的出现，城市生活的节奏亦是不断加快。所以在这部被不无刻薄地评为《东京物语》之山寨片的《樱花盛开》当中，我们看到父母亲最疼爱的小儿子乘着飞机在日本和德国之间匆匆往返，一如《东京物语》中在铁道部门工作的三子。也许，正是火车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城市生活，抑或现代性的来临，小津将最后的镜头留给了驶出故乡的火车。等到了侯孝贤的手中，火车这一意象更是频频出现，几乎成为了一种乡愁的象征。而《东京物语》中的一句台词：坟前难尽孝子心；在我看来，竟像是一句对现代生活的诅咒，德里达口中的马克思的幽灵。

不过，说来最为让我唏嘘的还是哪怕抛开小津那一代电影人的作品不谈，在当下的日本电影作品中，对家庭，对城市生活，对生死的关注与探讨亦从未停止过——比如《幻之光》，《下一站，天国》，《东京铁塔》，《三丁目的夕阳》，以及近年的《步履不停》，《夏日大作战》等等——而相比之下，国产的影片，除了独立制作地下发行的少量影片之外，在此类的话题上可谓处于空白，毫无表达。我不禁不无恶意地揣测，国内电影在此类话题上的缺席，是否正反映了国内文化层面在家庭，城市生活方面启蒙与反思的欠缺，对家庭与传统生活的漠视与习惯性抛弃，进而也才会在现实生活中出现毁人家园，逼人自焚此类极端野蛮的事件。又或者，其实正是毁人家园，逼人自焚这样的事件，作为一个信号话给我们知：长此以往，这个看似文明的国度将注定不会出现《步履不停》这样的影片，不会出现是枝裕和这样的导演。

不管是马克思，还是本雅明都曾告诉我们：世上的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的(all things are connected)。故而，那些产自他国的影片，那些来自他国的著作总会在有意无意间(literally)发挥出借镜的作用。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的一本小书《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宋立宏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12月)被翻译引进。尽管在这本小书当中，戈夫曼将重点放在了讨论在人与人的互动过程中，那些遭受污名化的人是怎样处理，或者管理自己所背负的污名的，以避免和减少社会交往中的不必要的误会。但污名和污名化一词，却在社会的层面有着更为广泛的应用。一旦检视历史，你会发现不管在怎样的时空当中，都有污名化这一行为的存在；而这一行为的核心其实在于是将某些人，事物或是行为进行归类，以便于管理。由此，不难想象，此

时的污名却可能是彼时的美名，桑塔格的《疾病的隐喻》对此已经做出的最好的阐释。而在此，我想谈及的，则是城市中的污名化。

关于城市中的污名化，最为明显的史例便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欧洲(尤其是英国)城市。彼时的欧洲城市正处于工业革命和城市化进程的初期，城市区域迅速扩张的同时，也造就了不少贫民窟的出现。由于充满了外来，底层的人口与犯罪，贫民窟因而被视为不洁和混乱失序(disorder)的地方，也是城市管理者所一直希望通过清理将



其纯净化，重建秩序的客体。但是否贫民窟就真的等于不洁与失序呢？大量的城市研究都可以告诉我们，在贫民窟里其实是自有其秩序的，只是这一种或者多种的秩序不为城市管理者所知，或是不为城市管理者所认同而已。从而，所谓的不洁与失序只是来自城市管理者的一种污名化行为，而这种行为背后的逻辑则在于贫民窟的一切被城市管理者视为了与自身不同甚至不相干的“他者”。

值得玩味的地方在于，这样的一种逻辑在现实中可能被反转。也即，当某个群体或行为被当权者视为“他者”之后，那么当权者往往会通过污名化来对其进行区分，区隔以便“管理”。也正是在这样的一个逻辑之下，我们也才能真正的理解：何谓“非法献花”，何谓“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何谓冥顽不灵的“钉子户”；为何扫黄会封BT电影站，为何一份《网瘾报告》引出了一场《网瘾战争》，为何在《暴力街区 13》和《第九区》这样的关乎拆迁的影片中，被拆迁人群都被扣上了暴徒的帽子，为何立法会门前手无寸铁的80后会被“认定”为有不理性与激进的暴力行径。不难发现，种种看似荒诞的背后，却可能隐藏着一套再理性不过的逻辑，再悠久不过的权力于体系之内的流动，可以是关乎观念的政治(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s)，也可以是眼下消费符号对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争夺。

自古有云：长安居，大不易。即便今时今日，由前所述观之，欲成为大都市(metropolis)之市民(citizen)亦未见的轻松几多。城市里火树银花，香车宝马固然惹人留连；但蓦然回首，生活却在灯火阑珊之处亦未可知。

图2为二老突然归来以至无家可归之场景；图3为老母亲被安葬几日后儿媳跟公公道别的场景；图4为描绘维多利亚时期贫民窟之画作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ENGLAND 英格兰

捕捉布莱尔的“影子”

特约撰稿人 孙晓骥 (北京, 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



“多年以后，面对质询委员会，托尼·布莱尔将会回想起，工党获得大选胜利的1997年5月1日下午，他与竞选团队拥抱庆祝的场景”……这大概是小说家罗伯特·哈里斯(Robert Harris)现在最想模仿的一个开头。昨日首相，今朝罪臣，政治界人物的沉浮用“魔幻现实主义”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当年那个标榜“改革”的工党年轻党魁，又怎会料到，自己有一天会以“战争嫌疑犯”的身份，登上报纸的头版。

布莱尔为当年的伊拉克战争，走到了质询台前。据BBC的政治新闻编辑尼克·罗宾森观察，在接受质询的1月29日，布莱尔刚刚进入会场，眼神中带着

少有的“紧张和惧怕”，听证会刚开始时，布莱尔拧开矿泉水瓶盖的手甚至在发抖。但没过多久，有着外交家天赋的布莱尔就应对自如了，言谈间已开始与质询者针锋相对，并为饱受批评的伊拉克战争开脱。

英国出兵伊拉克，其间有多少“猫腻”，一时难以说清。但这场战争确实把布莱尔由一位众人景仰的明星首相变成了今天反战者眼中的过街老鼠、诡辩家。这个形象，倒是与罗伯特·哈里斯的小说《影子写手》(The Ghost)中的那位首相亚当·朗颇为相似。有趣的是，几个月前，发生了大导演波兰斯基因“猥亵幼女”罪在瑞士电影节被捕的事件，而在被捕前，波兰斯基正在着手的便是由《影子写手》所改编电影的后期编辑。

波兰斯基身陷囹圄之后，罗伯特·哈里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替他鸣冤叫屈，同时，这位被英国媒体称为“与权力中坚走得很近”的小说家兼新闻人，此时也显示出他的另一种敏锐。在那篇文章里，他质问道：为什么要在此时抓捕波兰斯基？

这不由得让人开始怀疑某种阴谋论，比如某国政府为了阻挠此片顺利上映而出此下策，因为这本小说里影射了太多的国家机密和政治圈的肮脏勾当。虽然这部荣获了2008年国际惊险小说大奖(ITW Thriller Award)最佳长篇小说奖的作品被很多人视作消遣读物。但仅仅将它描写的政治八卦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似乎又太过轻巧。其实，哈里斯早在1992年就认识后来当上了英国首相布莱尔，但在政治上却与他观点相龃，及至伊拉克战争爆发，英国由于布莱尔的亲美政策而站在“反恐”的一边，哈里斯也彻底与这位当时还颇受欢迎的首相决裂。

2007年，布莱尔卸任之际，哈里斯放下手中别的工作全力写作一本讽刺布莱尔的虚构作品，准备好好“回敬”一下前首相，于是就诞生了这本《影子写手》。虽然哈里斯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仅仅是对影子写手(写作枪手)这一职业的生存状况感兴趣，但任何一个人看过他的书之后都会不约而同地感到，小说中那个虚构的英国首相亚当·朗，分明就是现实中托尼·布莱尔的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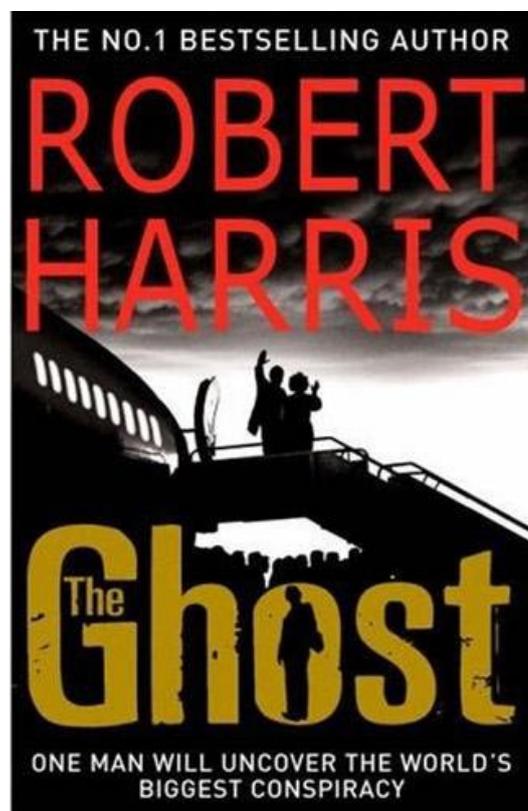
就这本第一人称小说的情节来看，并不算复杂：故事中的“我”，是一位职业作家。在一位名叫麦卡拉的职业枪手离奇死亡后受雇于一家出版公司，要求为英国前首相亚当·朗代笔撰写一部自传，回顾他的生活和权力生涯，稿费则是高得惊人。亚当·朗是20世纪下半叶英国在位时间最长也最富争议的首相。在他之前雇用的一个职业影子写手麦卡拉死亡后，“我”接替了前者的工作，奉命在两周之内完成这本回忆录。

但是当“我”开始着手回忆录的撰写之后，前首相的更多秘密随着写作进度的发展而一天天被揭开。原来，整件事情的背后有亚当·朗的政敌一手策划，而首相夫人露丝·朗更是中央情报局特派的卧底，为首相出谋划策的同时确保英国的政策会跟美国一致。在“我”遵循着麦卡拉的遗稿追寻真相的蛛丝马迹之时，亚当·朗却在机场遇刺身亡……小说最后，这位捉刀者还是冒着危险选择了出版回忆录，将真相公之于众。

当然，小说的情节并不能一一与现实对号入座，有的甚至显得过于夸张。比如首相露丝·朗的特务出身以及他与影子写手之间的情事就几乎有过度调侃之嫌，但仔细想来也并非荒诞不经。从各种纪实类的出版物中不难得知，布莱尔在现实中的很多内务决定都是悉数“听老婆的”，而切丽·布莱尔在回忆录中自爆年轻时的情史，这好像又与小说中露丝·朗在冥冥中有某种呼应。

这种写法，不禁让人想起了18世纪以来，肇始于斯威夫特的政治讽刺文章。在名篇《一个小小的建议》中，斯威夫特针对爱尔兰穷人过多子女过多无力抚养的问题竟然向公众谏言说，不妨将多余的婴儿视作食物吃掉。因为有钱人和地主们“既已吞食了儿童的父母，当然也最有资格饱餐这些儿童”。原来，作者故作惊人之语是要以冷暖人情警醒公众，揭露特权阶级的面目。这种只写其意而不写其实的讽刺手法，亦被后代的作家继承，例如伊芙琳·沃尔、戴维·洛奇等人均可被列归此类，哈里斯也不例外。

其实，最初见到布莱尔时，当时对保守党政府抱有严重不满的哈里斯，彻底为布莱尔的天赋所折服，认为这是一个能够改变英国政治史的时代人物。他本人还一度成为了布莱尔的随身记者。不过，随着英国现任商务大臣曼德尔森当年因为“护



照丑闻”而被布莱尔作为牺牲品而排除出政府时，作为曼德尔森好友的哈里斯，对布莱尔的做法自然看不过眼。他的看法是，曼德尔森当年在党内斗争最激烈时毅然抛弃布朗投奔布莱尔，此乃“义举”，如今曼德尔森不小心捅了娄子，作为带头大哥的布莱尔不仅不出手相救，反而落井下石，实在有违“江湖规矩”。对布莱尔这种不仗义的人，如何信得过？

从此，哈里斯踏上了“反布”的不归路，但他没有直接采取政治回忆录的体例——例如他非常瞧不上的坎贝尔为布莱尔撰写的回忆录《布莱尔岁月》(The Blair Years)之类——哈里斯在小说中借角色之口说，“政治回忆录为何是出版界的黑洞，原因就在这儿。表面上的姓名可能会响声震人，然而所有的人都晓得，一旦窥视进他们的内心世界，看见的无非是一套陈腐老套的内容。”因不想陷于“陈腐”，于是哈里斯写作了《影子写手》，不仅为前首相布莱尔“画像”，也承接了英国讽刺文学的传统，为唐宁街的政治圈画了一幅台前幕后的众生相。

***The Ghost*, by Robert Harris, Simon & Schuster, October 2007.**

FOCUS · SHENGSHI 聚焦 · 盛世

编者按：

陈冠中先生的《盛世：中国，二〇一三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9年；台北：麦田出版，2009年12月)没有在大陆出版，但是大陆知识界对此书的关注比港台有过之而无不及。本期“独立阅读”刊发“盛世”专题，不仅为了介绍《盛世：中国，二〇一三年》，也试图唤起对“盛世”的思考和讨论。

恐惧出盛世

特约撰稿人 夏佑至(上海, xiayouzhi1997@gmail.com)

恐惧有脚，能追着人跑。十七八年前，我年纪小，每晚自习后步行回家，经过村口坟地，总感到被人捏住了心脏；我的脖子僵直，眼睛只敢盯着脚尖前面的一点点路面，直到喘不过气来。为了克服恐惧，我越走越快，最后落荒而逃，但恐惧紧跟在我身后，保持着一个身位的距离，随时可以伸手抓住脖子，把我从地上拎起来。



文字也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让人害怕。我躲在父母的卧室里看反特小说，里面有杀人移尸的情节，那间房子又高又潮湿，家具陈旧，四下无人，安静得可以听见窗户外面的风声。又是有看不见的东西捏住了我的心脏。我赶紧拿着书到了室外。那是个大晴天，风很轻微，菜园里的黄瓜正在开花，闻得到大蒜抽薹的刺鼻味道。在暖洋洋的太阳底下，蜜蜂嗡嗡的声音传入耳际，黄色的蝴蝶互相追逐，在爬满葡萄藤的土墙上方飞进飞出……特务却准备把同伙的尸体丢到高崖下面去。我的胳膊上爆起了一层细密的疙瘩。

很多恐惧都没有具体的原由，有些成为个体性格的一部分，跟随你一生，有些只在特定的时间里发生，那是成长的一个阶段，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不治而愈。几乎所有的恐惧都是非理性的。你讲不出恐惧的原因，无法描述和恐惧有关的全部感受，

不知道这种感觉什么时候来, 为什么又会消失。我们不能确定恐惧的边界在哪里。但有一种恐惧例外。它是可以讲述的。

《1984》也让我有心脏被捏住的感觉。我确凿地知道这种恐惧来自何方, 并且因此更加清楚, 为什么这个时代有那么多人感到不安全和原因不明的害怕。如果怕黑是因为人类混沌含糊的集体无意识, 政治上的恐惧恰好相反, 是因为人乃有理性和自尊心的生物, 是我们对愚弄和恐吓的本能反应。

即便到了盛世, 这种本能反应也不例外。方草地和小希对盛世的太平景象感到恐惧, 于是寻找同类, 想找到失去的时间, 揭穿盛世的谎言, 并非谵妄, 而是出于理性和自尊心。

要打击理性和自尊, 最有效的工具仍然是恐惧。盛世必须让人感到恐惧, 因为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严打。而之所以有严打, 是因为人们害怕失去秩序。从来没有组织起来的经验, 人们无力保护自己, 又害怕社会成为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 军队就成了最后的希望。盛世看上去不是最坏的选择。恐惧的目标是让盛世中人自己说服自己。虽然被孤立、被监视、被药物控制, 变得柔弱无力, 既没有远见, 也没有尊严, 毕竟没有被拉去当炮灰, 还能享受欣欣向荣的物质生活。这是一张格式合同, 要么全盘接受, 要么彻底出局。

说起来, 盛世也是逐渐成形的。2013年只是总成。至于部件, 兴许2008年做成一件, 2010年又完成了一点; 所以说, 盛世不光是一个结果, 盛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叫做“盛世化”。物质享受日渐繁荣, 恐惧逐渐积累, 格式合同的内容一条一款地增加, 最后, 表态的那一天才突然到来, 人人必须做出自己的选择。

如果我对这样的“盛世化”持一种乐观态度, 那是因为林肯说得好, 你可以在一段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 也可以在所有时间里欺骗少数人, 但你不能在所有时间里欺骗所有人。谎言很难持久, 并非因为盛世自身的漏洞, 而是因为平常人物鸡毛蒜皮的理性和自尊心, 很难完全被收买或是镇压。

对一个个体来说, 盛世里首要的难题不是和别人相处, 而是如何自处。因为日复一日, 羞辱和欺骗将变成自我羞辱和自我欺骗。这种状况和1991年前的苏联、1945年前的德国和1976年前的中国并没有什么分别, 盛世要么演变成法西斯, 要么就会因为庸俗不堪而崩溃。人们自己看不起自己, 只能消沉避世, 或者逃跑乃至自杀, 要么像小希那样公开抗议, 才能维持自身的完整。这不是最好的选择, 但别无他法。

战争能够终结盛世, 但更可能的情况是盛世因为人性的反动而四分五裂, 最后崩塌成无数个笑话。在平常国家里, 政治笑话既不多, 也不怎么可笑, 但在盛世化的国家里, 却是一种非常明确的指标, 又多又冷的政治笑话预示着盛世的开始, 也将预示盛世的终结。设置过滤词、关闭手机的短信功能或者对邮件进行检查, 都不能杜绝笑话。这些手段看上去是新技术, 其实新意很有限, 难以改变大势所趋。

现今一切才刚刚开始, 人们对盛世的前景半推半就。和1984年不同, 2013年的宣传机器不相信自己灌输的那套假话, 也不相信灌输的对象会相信。日子不过是一场化装舞会。你假装为人民服务, 我假装相信一切。许多人都有置身事外的超脱情绪。他们有一点恐惧, 夹杂着兴奋和受伤的自尊心, 想和陈冠中一样, 挤在前排, 等着看笑话的出现。

图1为 Scopophobia 场景, 图2为基于《1984》创作的 Logo



FOCUS · SHENGSHI 聚焦 · 盛世

心甘情愿地委身巨灵

特约撰稿人 贾葭 (北京, jiajia80@gmail.com)

去年圣诞节前, 一位朋友半夜打来电话, 喜不自胜地说, 盛世来了。原来卓越网所有大部头的文集及丛书, 均报价 25

元。当时以为是圣诞礼物，一口气订了十几套，码洋大概有四万余元。我说，假如这次订单成功，我发誓三年内不批评现政权。后来当然没有买成。自省之后，觉得自己非常容易满足，在大是大非的问题面前，没有能够站稳立场，这是不对的。

假如这批书真的送到，我很可能往后的三年都埋首书城，不会再继续指桑骂槐地扯咸淡。这就好比，大学教授拿了组织上的项目资金，就不会编出组织不喜欢的报告。农村免了农业税，实行了不算多的医保，就顿时变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大概普通人的需求一旦稍被满足，就会少很多牢骚，社会就和谐很多了。

中国从 19 世纪上半叶开始，就没过几天安生日子，中日战争前十年，都被称为“黄金时期”，可见中国人对河清海晏的期待是何等强烈。然而运动七、八年就来一次，最近这三十年，不论其间有多么令人心寒齿冷的事件，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也算是难得的承平时代。何况，组织上也认为现在我们就处于盛世，那就是盛世了，不含糊。

以此而言，陈冠中的《盛世》其实并非是对将来而恰是对当下中国的描摹。我们已经处于一个最好的时代，这里人人都极度兴奋，因为国家的伟大复兴已经达成，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即便是个体仍然有这样那样的苦楚，但二百年来的强国之梦业已成真，这就是我们的兴奋剂。个体的伤疤还没好，就忘了疼。

对于国家强盛的这种期待，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成为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祖国就是母亲，而母亲又长期处于一种受难及被侮辱的状态。每个儿女必须提高警惕时时戒备，才是爱国的表现。这种国家批准的仇恨，是现当代史上的一股强大的动员力量，也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盛世”这种宏观命题，听上去就会被由衷地认为是对的，已经成为我们的惯性思维。

当然，盛世不是说了就有，它表面上需要一个让外界承认的过程。奥运会对于中国而言，不啻是一个成人礼。这个国家才六十岁，与那些曾叱咤风云的老牌国家相比，绝对算年轻。奥运会、世博会就是它的秀场，它想要以此重新介入国际秩序，并重振当年万邦来朝的汉唐气象。只是，这一外界承认过程，并非需要外界真正的承认，只需要让国内民众以为如此便可以了。



盛世的主要特征是，组织的一切政治行为都有其不容辩驳的合理性。一切以国家利益的名义行之，便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奥运前夕网上流传一篇题为《夏眠丸》的短篇小说，大意是居委会给居民吃了一种丸药，睡一个月，醒来奥运就结束了，大家皆大欢喜。《盛世》中的故事与此有相似之处。或许这就是最好的唯一能接受的结果，不然，我们又有何办法呢？

故事里，小希和方草地他们之所以面临自我怀疑和救赎，就是不能接受这样“当然”的结果。经常会有网友在我的博客或者专栏文章下跟贴质问，现在一切都好好的，为什么你有那么多不满？这不过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类似的疑问

一多，让我觉得：这一小撮才是不明真相的，其他都是眼睛雪亮的。这一小撮就是和谐的敌人，盛世里的不安定分子。

长期以来，“国家好才是真的好”的思维指向，将扭曲变成常态，把谬误变成真理。那一个月失踪的时间，就在这样的思维之下变成真正消失不见的东西，变成历史的盲点。每个人都像合唱团的一员，跟着指挥棒引颈高歌。《盛世》的封面就是如此，在一片红色的海洋中，人们井然有序，跟在两个领道人后面阔步前进。

这本书就像一个纸牌游戏。陈冠中笃定地猜出统治集团手中都有哪些牌，还将会打出哪些牌。也就是说，目前他们回旋余地仍然很大。这个体制所能释放的空间足够让它继续运转。令人担心的是，故事当中的若干情节不仅已经发生，且后续情节还有继续成为现实的极大可能，仿佛一张从天而降的大网，我们无法闪避，甚至是心甘情愿地被这张网笼罩，然后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药丸已经被我们吞下，大家都等着那一天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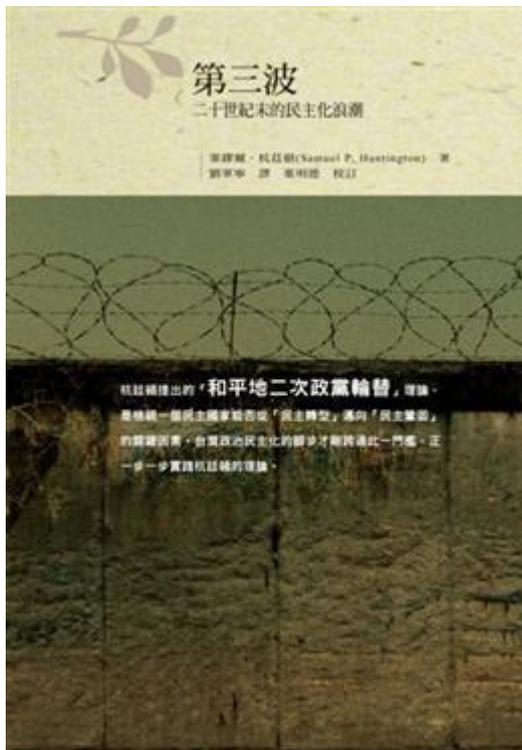
FOCUS · SHENGSHI 聚焦 · 盛世

盛世，不自洽的和谐

特约撰稿人 羽良（北京，priestliu@gmail.com）

历史终结后的历史，一个引子

27年前，阿根廷军政府倒台；21年前，柏林墙倒下；19年前，华约和苏联相继解体，同年，南非全面废除“种族隔离”制度；13年前，韩国民主运动领袖人物金大中成功当选韩国总统。金大中获胜的这一年，历史的时针指在1997。就在这一年，邓小平去世，香港回归中华人民共和国。



热爱宏大叙事的保守派学者亨廷顿，把那一波历史叫做民主化浪潮第三波，他的徒弟福山，则发明了更标题党的说法“历史的终结”。不过，保守派从来都不是乐观派，相对于自由派对冷战结束和后极权主义倒掉的弹冠相庆，保守派倒是更有一份冷静。他们不太相信这个世界上敌人就此消失，而事实上，也的确如此。1997年是个偶然的分水岭，在接下来的几年，俄罗斯送别了一手了结苏共的叶利钦，迎来了克科勃出身的普京；中国则忽然告别了韬光养晦，喊出了伟大复兴和平崛起；委内瑞拉用选票选出了一个想当终身总统的查韦斯；欧洲没有送别卢卡申科这位欧洲最后的独裁者，却可能迎来一些日益声名狼藉的民选总统，比如萨卡什维利，比如尤先科。

列宁对机会主义的批判，用了“进一步，退两步”这个贴切的字眼儿。后极权社会的垮台，历史似乎迈进了一大步。威权主义在冷战后世界忽而浮出水面，民主社会对此的托大、忽视、绥靖，甚至亦步亦趋、同流合污，似乎更像是“退两步”的表现：全面的意识形态对抗消失之后，民主失去了参照物，如同大杂烩一样的威权主义，用一种迷惑性的姿态，拖拽着这个依旧动荡的世界，朝没有理想的保守状态大踏步的前进——或者说倒退更合适些。

中国，一个曾经极度接近于极权主义社会的封闭国家，因“改革开放”之名，三十年间，成长为世界的一极。这个素来为神秘主义文学提供无限素材的东方国家，在政治上对大多数西方人而言，依然是个谜。与后极权时代的苏东欧共产党不同，邓小平等人开启的改革开放进程以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模糊了列宁式政党的棱角，淡化了绝对主义政权的色彩。在八十年代之前，美国甚至曾经单方面幻想过将脱离苏联阵营的中国拉入北约组织，成为遏制苏联的前沿基地。而即便在中国重演墨西哥的特拉特洛尔科广

场惨案之后，西方国家也只是矜持的孤立了这个国家短短几年，复又在市场的诱惑下，大规模的重返中国。十亿消费者让任何资本者都无法选择性失明，它的故宫，它的美食，它的女人，它写入宪法的私产经济，它签而未批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它的奥运会，当然，还有它失而复得的盛世。

盛世，魔幻现实主义的现实

终于说到了“盛世”。

陈冠中笔下的《盛世》，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奥威尔的《1984》，亦或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文学就是这样，伟大的复制是承袭伟大的方式之一，只要它源于对现实真切的理解。《盛世》道出了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的点点滴滴，它精确的、有血有肉的、甚至是平易近人的勾勒出一个威权主义中国的真实面貌。

政治学的民主理论家们几十年来一直以精确描述民主主义、极权主义和威权主义为己任。他们的工作成绩斐然。今天，稍有判断力的人都可以毫不费力的分辨哪个国家是民主的，哪个国家是极权的。唯有威权的面目模糊不清。今天的威权主义，没有斯大林时代无所不在的秘密警察，没有冷战时代拉美军人威权直截了当的暴力，没有后极权东德泾渭分明的平行社会，没有计划经济贫乏而滑稽的物质满足方式，也没有神权国家狂热的禁欲审查。在一个威权国家，它可能有看上去还在运行的选举制度，它的集体领导看上去似乎早已进化成祛魅的官僚治国，它对自己的意识形态看上去并不怎么坚守，它欢迎一切看上去只考虑赚钱的资本，它不拒绝而且完全欢迎外来的知识，只是保留接受什么和如何解读的权力。在这个国家里，国家对个体的暴力总是以偶尔的和“为人民服务”的方式出现的，当它隔离你的时候，它说是为了防止疫病传播；当它禁止你上某些网站的时候，它说是为了你孩子的身心健康；当它逮捕国家首富时，它说他“原罪”；当它停掉电影院的《阿凡达》时，它说我们应该为智慧的祖先多留些档期；当它的国有企业大批贩卖加了奶粉的三聚氰胺时，它告诉你该抓的都抓了，剩下的都是好人。它鼓励你上街为地震灾区加油捐款默哀，却禁止非官方的死亡调查；它告诉你奥运期间可以合法游行，却不给你一个申请合法游行的行政渠道。这个国家所有的人都有看不到 CNN 却反对 CNN 的权利，也同时拥有委托律师辩护并随后举报辩护律师的法治。

这样的社会，从来不认真的剥夺个人的财富和生活的幻觉，就像它从来不认真的对待每个人的权利一样。这是个稀松的、不严肃的社会。知识分子曾被短暂的激起反抗和仇恨，却迅速被学院分肥体制的优待所宽慰平抚，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不是和解，而是原谅，是党对知识分子的宽宏大量。它令人瞩目的 GDP 增长虽然带着血，但并不妨碍它用吃饭的权利为人权做新的解释。民众为别人的财富而炫目，经济发展的幻觉为全民性的机会主义提供了土壤。每个人都不满足于自己的现状，却又总是在为权利而斗争之前找到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理由。



威权的表征是山寨的自主创新，是不严肃的严肃，是反低俗的低俗，是新闻联播和春晚，是躲猫猫和俯卧撑，是隔代指认和打黑风暴。总之，外国人觉得它虽然不先进，但也不是万恶之所。他们容易看到它的进步，并借此宽慰自己的贪财和丧失原则。而它的本国人，在这个山寨的、不严肃的国家里，活的浑浑噩噩，用看盗版的幻觉和 70 年的恒产支撑着明天会更好的幻觉。

这就是盛世。一个非民主也非极权，不算好也不算差，财大气粗却又国富民疲的盛世。这样的盛世，以前没有人说清楚过，这次，陈冠中似乎帮我们说清楚了。

聪明人的阴谋论和无法自治的社会

《盛世》有一个不同以往的精彩结尾。他借何东生之口描述的那个“利维坦式阴谋”让人拍案称奇。如果社会真的能靠机械逻辑运行的话，我相信，这个阴谋是美好的。就像黑客帝国里愿意选择生活在虚假世界的叛徒一样，既然虚假的世界可以自治，何苦追求那个前途不明的 **real world**？

很可惜，社会这个复杂系统所具有的无限延展性，令何东生完美的阴谋论变成了难以自治、漏洞百出的巨灵幻象。即便是在盛世所描述的那个貌似稳定确实压倒了一切的社会，社会系统的自我分化依然在进行，哪怕是畸形的生长。当权阶层中的野心家、青年团和右翼思想煽客蠢蠢欲动，甚至让何东生这样绝顶聪明的忧国忧民者背后发冷。而在右翼法西斯幽灵的反面，小希这样的人道主义者，方草地这样努力保留社会记忆的活动家，以及老陈这种不自觉走向“反动”的围观群众，当然，还有那个努力不想与政府发生正面冲突的地下教会，其实都在以微不足道的力量反复的让何东生的完美阴谋逻辑破产。

总之，单一逻辑的社会系统是无法自治的。

这可能是《盛世》所留下的唯一明确而不明示的结论。

图 2 为贵阳花溪城市中心具有“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概念方案

FOCUS · HEYDAY 聚焦 · 盛世

理想主义的 Ecstasy: 盛世的宏大叙事和创伤后遗症

圆 (香港, siuwoonwong@gmail.com)

Speak softly and carry a big stick; you will go far.

陈冠中不是写小说出身的，他的文字也没有太大的所谓文学性，要耐着粗疏的行文看毕整本书，亦需要能耐。陈擅写散文、评论，由《号外》的专栏，《我这一代香港人》更被奉为香港战后婴儿潮一代反思的先锋（然后就是引起最近香港所谓 80 后讨论的吕大乐《四代香港人》），立论清晰，但不代表就是写小说的材料，而《盛世》中的主题非常明确，直指 BJ，“关键词”毫不避嫌，



也就用不着借小说虚构的隐喻来遮掩，为甚么陈会选择小说形式？陈冠中说，小说有评论和散文都取代不了的功能。班雅明在《说故事的人》中比较新闻报道和小说，指新闻报道本身在所谓力求客观的背后而预设了一定的解释，而对事件的论述本身就是文本的构成，小

说却具被无限诠释的可能性，不被唯一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on)所垄断，这应该就是小说所独有的功能。

梁文道在开卷 8 分钟中，已提到每一条都充满矛盾的新盛世主义十项国策献言，然而我们的商业世界中，不总是充满这种荒谬的宣言，而大家习以为常么？当宣传的言论越来越与人们生活脱钩，听着说 2009 年经济好转，身边失业超过半年的大学生何止一两个？宏大叙事往往服务于权力，借助话语权粉饰的控制与谋利。

最近又再成为外交焦点的 google 事件，美国强烈谴责中国以骇客入侵异见人士电邮，然后中国又发出声明，指中国才是骇客入侵的最大受害者，被告转为受害人，这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状态，正见证了取得世界上发声渠道的体现。或许有人会问，吱个声，有这么难吗？有时发声了不一定代表有人理会，不一定代表声音能够被传达，而能够申辩，不管算砌辞诡辩还是强辞夺理（我知道两者并无本质上的分别……这就能看出笔者的立场了吧），毕竟代表着地位和权势。小希儿子的名字，由韦民改名为韦国，其隐喻露骨得……啧啧，以往人们都把为国为民连着念，没想到原来层次还是有不同的，对外不再有共同敌人了，斗无可斗只好玩阶级斗争——斗出个阶级来。发声权，一如其他所谓“普世”的价值，人权、自由、民主，在这种人眼中是某些人的专利——声音大的人的专利。

至于发声的难度，现实中因为在网上散布“颠覆国家”言论而入罪的例子多不胜数，我们倒是可以看看在《盛世》中，小希的遭遇。碰巧小说中小希的反动文章也都是利用 google 文件存档，中宣局忌三分，无法下手，无怪乎 google 要在中国发难前先下手为强。小希在网上与愤青骂战，她在自白中说：“我只知道这样做是为了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忘记，某某某（此处删去三字——编者按）不是像他们自己宣传的那样永远的伟光正。”小说的发展围绕着的，就是一句“千万不要忘记”，若不是在小说中有几个忘记不了事儿的人，老陈仍然会“嗨啦啦”的幸福地生活下去。故事到最后，这群理想主义的孤独者，并没能幸福地生活，很多人都说陈冠中执笔的这本《盛世》是中国式的《美丽新世界》或者《1984》，算是为小说奠下了反乌托邦的去路。

小希不断繁衍的电邮地址，方草地竭而不舍寻找自己人，更反映到的是他们害怕自己忘记，害怕发现自己是少数，这是虚拟也好，现实也好，理想主义者的悲哀，明知自己所坚持的是对的，却苦于无人和议，自己也动摇起来。把清醒的人逼疯，是一种管治手段。如果政府喉舌所说的“热烈庆祝”没有让你听得顺耳的话，我们大概是自己人，然则小希和方草地都比我们幸运。真、假，正、邪，远不如童年时看电影一般黑白分明，当一切都成为一种“话语”，一种“论述”，一个“角度”，真相更没处可找了。能把这把戏玩得比解构主义更彻底，还有人能说中国学术水平不如人么。

温情总理温家宝年前写的粉笔字“多难兴邦”，不正描述着我们国家机器 1949 年后奋力图强的道路么？一如“火烧旺地”的咒语一般，震醒了我们沉睡的巨龙。“伤痕是一种记号，指向身体非经自然的割裂或暴露，最终又得以痊愈，弥合的痕迹。”（王德威语）留下来的痕迹记录了受伤的痛楚，人们既想把它抹销，而在注视它时，又使自己藉着回忆重访暴力的现场，记忆永远是不可靠的，有时我们美化好回忆，有时，透过回忆痛楚，夸大痛楚，把自己想像成为受害者（Victimization）。

提到创伤，那就得提及一下心理分析中的自我防卫机制，自我防卫机制是当人面对挫折和灾难等伤痛，为了把这痛苦转化成可承受的程度，便会把记忆加以扭曲，或做出无法预算的反应，以让自己适应。

方草地追寻那不见的一个月，或许很多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心裡面都想到了某件中国改革的大事，然而，不见的还有更多更多，从追寻文革历史的困难，龙应台早前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及《盛世》中的八三严打，我们的历史没有时间顺序的连贯性，而更企图捡拾碎片拼成完整。

老陈不愿意追踪到小希的下落，不愿意寻找方草地所谓消失的一个月，或许反映的是常人的懒惰，若放诸于整个民族，可否解释为，整个民族一同在过去被欺负的创伤中，通过否认、补偿，而建立的盛世，会否就埋伏着对伤痛的报复？沉醉在繁荣大国的狂喜，又会把这个几千年的民族带往哪去？“我们在哪里？”这条问题是人身处任何环境时都会问的，我们在哪里？我们要去哪里？接下来我们要到哪裡去？末段何东生的口若悬河，盛世正高速向前，这个时候能叫停，好好想想应该怎样走？走到哪里去？

故事结尾的真相大白，当广大国民或明或暗的反抗着现代锦衣卫的同时，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在大幅度的蔓延。结局里，他们从黑暗中走出来，有点像电影院散场的感觉，一群朋友不知往哪去，反正，回去是没可能的了。

小说难免脱离现实，为了满足一下作者或读者在现实中达不到的欲求，现实中断不能让人能动领导人的半根头发。我们要问的，也许是，这书到底是要唤醒理想主义者的梦，还是要麻醉理想主义者。“落地的麦子不死”，单是这一句，就足以让《盛世》遭遇和谐。

图 1 为市民在得知 google 将要撤离的消息后主动前往中关村 google 总部鲜花

FOCUS · SHENGSHI 聚焦 · 盛世

播撒龙种，收获跳蚤——读《盛世：中国，2013》偶感

特约撰稿人 刘柠（北京，postdadaist@gmail.com）

2009年岁末的京城，史上罕见的寒潮袭来，连降三场大雪。从万圣书园出来，不禁打了个冷战，裹紧大衣，顶着刺骨的寒风向五道口城铁站走去。

正值下班高峰时间，13号线人满为患。因甲流（H1N1）流行，约有一半的乘客带着戴口罩，只露出两只眼睛，看不出任何表情，有的玩手机，有的盯着车厢里的电视屏幕。虽然奥运已经过了快两年，那上面还在轮番播放“新北京，新奥运”。我肩背塞满书籍的书包，右手抓住吊环，左手翻开刚刚买来的陈冠中小说《盛世：中国，2013》。这本港版小说装帧素朴典雅，封面的主色调是“中国红”，透着温暖、吉祥、和谐。红色之上，有一块金色的方块，细看是60周年大庆阅兵式上女民兵方阵的轮廓图。尽管像一片散落的棋子一样，看不出其中任何一张脸及其表情，但你尽可凭头脑中两个月前的记忆内存，联想那由清一色的短裙、长筒靴和齐刷刷地甩着正步的修长、性感的美腿构成的飒爽英姿。



冬日日短，暮色四合。车厢越来越挤，我不得不把书举到高于头顶的前上方，仰着头看。旁边俩男女好奇，也抬头看我的书页，但到底定力不足，看了会，可能觉着累，就不看了。我则津津有味地翻页，一页一页往下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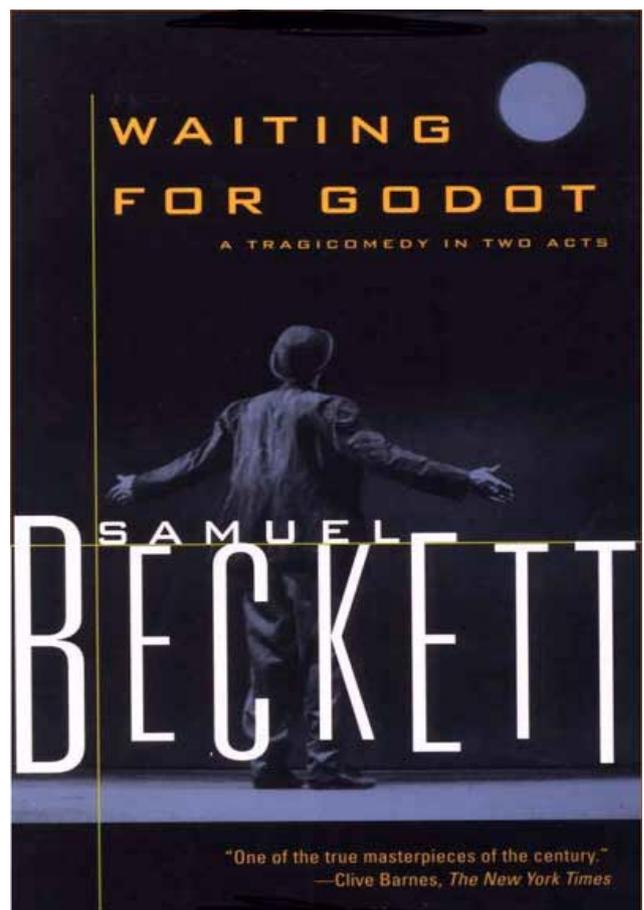
我不想马上回家，打车到三里屯太古村找星巴克坐坐。自从旺旺集团收购了星巴克之后，一些中式饮品就被开发成了全球化饮品，像我手中的桂圆龙井拿铁，口味就非常好，据说巴格达、贝鲁特、喀布尔等伊斯兰重建城市都在热卖，连非洲的安哥拉卢安达、苏丹喀土穆、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都开了店，是星巴克旺旺与一家叫欧非拉友谊投资公司的中资企业共同开发的新市场，以后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星巴克旺旺，商业不忘文化，也算是软实力的呈现……

一边读,大脑中的搜索引擎同时启动,开始搜索三里屯的方位。三里屯,这块历来被认为是红朝都城中离西方最近的“飞地”,在将近 15 年的时间,离我住的地方只有两站地,我熟悉那条街的每一家店铺,至今记得哪几家酒吧有售我爱喝的北京扎啤。星巴克旺旺、桂圆龙井拿铁、全球化、软实力……这些一个个似曾相识、却又令人不着四六的名词纷至沓来,无论如何难以与那个我熟稔的街区的感觉相契合。但虽说如此,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又呈现出某种惊人的一致,令人五迷三道。不知不觉间,车到了望京西站。刷卡出站,沿过街天桥往外走。本来不算窄的路面,两边挤满了小贩的摊位,除汉族人外,还有藏族人、新疆人、蒙古族人,商品则从各类民族服饰,到五金小家电,到盗版 DVD,到烤香肠、红薯、玉米,到天津煎饼果子,真可谓琳琅满目,物质极大丰富。

人挤人地下台阶,被摩的和黑车的拉客者团团围住,一边往下走,一边谈好了一辆黑车的价钱。突然,人群开始骚动,但见过街桥上面的小贩们拎着编织袋和塑料包裹四散奔逃。定睛一看,路边停着一辆白蓝双色的小卡车,驾驶舱上的警灯还在闪烁——原来是城管来了。回家的路上,霓虹闪耀,各类店幌迅速向后退去:山东人民菜、阿里郎韩餐、平壤咖啡、罗马乐园洗浴城等等,令人目不暇给。坐在 5 块钱的黑车上,下意识地看窗外令人致幻的夜景,边想着刚才读过的小说情节,我平生一种很强烈的错愕感,仿佛时空穿越,置身于尤利西斯的时代。

对我来说,读陈著的最大收获,就是对生活中四处弥漫的荒诞感的确认。长久以来,我觉得自己一直被某种荒诞感团团包围,它无壳无体,却无处不在,像水母类软体动物一样,自体繁殖,成片生长,无边无涯:每当我乘车经过某城乡接合部,看到洛可可风格的巍峨壮丽的洗浴城大厦旁边,如山一样堆积着建材垃圾的时候;每当走出某个沿海城市现代化的机场,扑面映入视野的,是跟“西门子”、“日立”等商业广告并排矗立的“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的红色标语牌的时候;入夜,在中南地区的省会城市,“歌啾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城里的一半人口为另一半洗脚,成为一道巨大的风景线。微醺的地方官员身披浴衣,歪在沙发上,在央视《新闻联播》的背景声中打盹,双脚任由洗脚妹抱在怀里揉捏;在京、沪、深、穗等一线城市的百货商场,舶来与山寨齐飞,人们各取所需,旺盛消费,不亦乐乎;在重庆的“打黑”风暴中,犯事被抓的京城名律师前一天还铁嘴钢牙,一幅死磕到底的姿态,翌日便幡然醒悟,洗心革面,发誓重做新人……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个国家会成为前卫艺术的沃土了。从圆明园到北京东村,从 798 到宋庄,方力钧笔下表情暧昧的大秃头和岳敏君笔下那些就知道张巨嘴浪笑,且一笑便比常人多露出至少 12 颗牙齿的傻哥们,他们才是这个时代雨露滋润禾苗壮的当仁不让、如假包换的主人。

生活在荒诞感中的人,大抵是真诚的,他(她)自己并不觉得荒诞,正如等待戈多的流浪汉并不知道戈多今晚不回来或世上本无戈多,他只是在那一味地等,痴痴地等。但惟其如此,荒诞才越发显得荒诞,才具有质量感。在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之后,中国人盛世正式开始之前,曾有一个月的时间差。但这 28 天“光阴的故事”在官方话语中被抹掉之后,所有人的记忆内存同时被覆盖存盘,就跟从来没那回事似的,于是“时间开始了”。只有老陈、小希、张逗等极少数分子,依稀记得发生过这么回事。为了让记忆的链条尽可能保持完整,想找回,却苦于无处找寻,于是成天寻寻觅觅,神思恍惚,跟孤魂野鬼似的——但这基本上是盛世的不和谐音符,属于有待纠错的“程序错误”。事实上,系统对此也尽在掌握。就读于北大法学院、立志毕业后进中宣部、隶属于超精英组织“SS 读书班”的 80 后青年才俊韦国在手记中如此披露自己的烦恼:“……一个小烦恼,就是很不幸韦希红是我的‘妈’。她是我事业进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我必须排除这种不确定性。如果在毛的年代,她肯定已被判现行反革命罪。现在国家真是太宽容了,我叫我的国保上线把她长期关在精神病院,他说不着急,一切都在掌控中,先让她到处走动,看看她见些什么人。无奈。”



月份“被丢失”，是因为中国盛世的降临。盛世亮丽光鲜，不仅出民水火，而且是拯救世界经济于“冰火期”的救世主，具有从意识形态到制度的强大优越性，根本排除一切不和谐因素。或者说，因为系统太强大了，几乎无所不能，一旦系统启动，运算能力超强的CPU可在瞬间强制“纠错”任何不和谐程序，让不和谐变成和谐。因此，诸如“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稳定第一的依法治国”、“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央企主导的公平竞争”、“后西方后普世的主题思想”（所谓新盛世主义的十项国策献言）等乍看上去张力十足，无论如何难掩冲突的奇幻构想，也都被“和谐化”，成了威权主义盛世国家的靠谱国策。

毋庸讳言，陈著是一部社会幻想小说，旨在通过对“和谐社会”的叙事，折射出在世界经济普遍持续性萧条之下，中国经济“风景这边独好”背后的“盛世危言”。但一方面是“2013年”（盛世开始）的时间设定过于迫在眉睫，另一方面是从地名、场所，到人物、事由，对现实大背景的影射过于露骨，令人读着读着，便不禁对号入座，直入情境，有很强的“非虚构”色彩，这种感觉越到后来越明显。小希在网上结交了一些异议分子，并参与地下教会的活动和陈千里寻人到河南等情节，令人想到胡发云小说《如焉@sars.come》中的相关情节（并非指情节的雷同，而是某种情境上的神似）。

小希、韦国母子的命运和现实处境颇耐人寻味，一个是野心勃勃的未来盛世精英，一个是经历了长期被边缘化之后的郁闷，在宗教中寻求安慰，并最终成为“国家敌人”的知识女性；一个觉得自己是大时代的弄潮儿，立志要做一番“浪漫”的事业（“我认为中宣部很浪漫”），一个则在现实中郁郁寡欢，一路退避，时而在退避中尝试反抗。其间的时间跨度刚好是一代人，大致等于改革开放30年。小希作为早年接近“老陈”等《读书》圈层的京城知识分子，受过80年代启蒙文化的熏陶，思想立足于人文，对现实格格不入；韦国作为改革开放后长大的一代，虽然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思想上却被90年代以降越演越烈的、建基于“大国崛起”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彻底洗脑，但却不自觉，反而以为自己是开风气之先的“精英”。一方面骨子里有强烈的精英意识，要干一番大事业，另一方面却高度现实，现实到了势利、冷酷的程度，甚至为前途不惜把自己的母亲送进精神病院。而所谓的“盛世”，正是这群“精英”狂欢的舞台。

播散龙钟，收获跳蚤——80年代波澜壮阔的启蒙主义运动，何以被置换为冷血的盛世“精英”们的生存哲学、权力逻辑？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随着那28天的“被丢失”，还有哪些东西被遮蔽、被掉包、被失语……凡此种种，《盛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文本和契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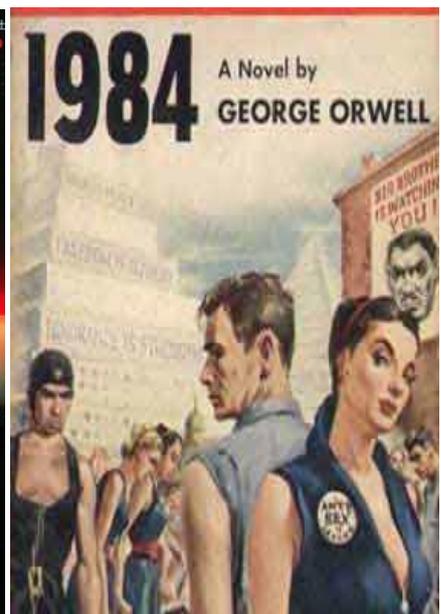
图1为09年国庆阅兵女兵方队；图2为贝克特作品《等待戈多》

FOCUS · HEYDAY 聚焦 · 盛世

盛世下的意义危机

观察员 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读《盛世》，让我想起两部小说，一部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一部是索尔·贝娄的《拉维尔斯坦》，前者讲的是在极权社会里，“存在意义”如何被“老大哥”所监管；后者则讲的是一个在现代自由民主社会里仍然在反思存在意义的“现代苏格拉底”。极权社会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自然存在意义问题，毕竟言论出版都不自由，不仅不敢说话、不敢思考，还要担心被同化；进入开放社会，问题仍未解决，小说里的知识分子（阿兰·布鲁姆的原型）觉得“庸众”浅薄无知，整天嘻嘻哈哈，看肥皂剧，吃速食，读快餐杂志，没有一点积极向上、追求美德的冲动，明为自由



选择，实际上仍被悄悄洗脑。

从这个角度来看《盛世》，小说其实隐藏这样一条线索：在极权社会里，平头百姓受到监管，每日口号语录，意义问题早已遗失；但当进入“盛世”，百姓享受市场化的物质成果，没有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存担忧，只需安心接受权力安排，意义问题无需操心（至少对于《盛世》里的主政者而言是如此）。因此，从极权社会到“盛世”，意义危机的问题其实是具备反思性格的“知识分子”的意义危机，题中之义乃是：要么从极权到“盛世”的过渡，这中间数十年的那场追求“自由”的存在意义之战，只不过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要么是，这样一种压抑“价值之争”的政治模式（巨灵模式），是人类的末世结局，只不过是那些“法家圣人”、“治理术狂人”的痴心妄想。

《盛世》全书，其实不离前述小说中所关涉的基本问题：在“盛世”之中，知识分子还需“反思”吗？大部分老百姓都准备安心享受盛世荣光了，“存在意义”问题还会继续存在吗？

仔细想想，《盛世》的标题全称其实应是《盛世下的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如何看待盛世》，无论是老陈、小希、韦国还是那位“深谋远虑”的何东生，他们关注的虽然都是政治斗争，背后的主题仍然不离盛世下的“意义”问题，小希与老陈的“理想主义”是他们在 80 年代拥抱的道德理想，说得浅白点，本质上或许只是一些做人的基本常识：不说谎，不能忍受看到个体生命与尊严被践踏；而韦国这一代年轻人则将父辈的那点道德感抛之脑后，信奉的是赢家通吃的生存竞争法则；而何东生这般“看穿世事”的策士们，则将身心托付于国家这一巨灵，放逐仁义道德的政治束缚，“如何有效”才是他的行事原则。

《盛世》里将老陈和小希与 X\Y\Z 三位 SS 小组的导师作比较，不论是小希、老陈这些在野之士的痛苦挣扎，还是 X\Y\Z 国师式的处心积虑，其实凸显出来的是这样的疑问：80 年代所彰显的人性的尊严与自由等启蒙论调，为何无法成为启蒙一代人所坚持的政治与道德理想，反而在“盛世”的背景下透露出颓败与无奈？

以这样一种疑问切入，将《盛世》放回到这三十年的社会转型史里，其实看到的也是几代人各自的心路历程，不过值得提醒的是，书中所谈到的小希与韦国这两代人的价值分歧，却无意中略去了 70 年代生人的尴尬处境，尽管在这里本无必要去为这一代“夹缝中人”争得一席“在场”的角色，但是略去这一代人，无疑也会大大简化了这 10 余年的思潮状况。

70 一代人，生在红旗下，童年时模糊地感受过“严打”，跟着刑车当过围观群众，懵懂中体验过 535 的政治危机，读过八十年代的一些禁书，但并没有文革时代的痛彻体验，对“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意识形态缺乏狂热，看上去似乎免疫于各路意识形态话语，但是在 90 年代不经意地成为 80 年代启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遗少”，自由主义、理想主义，人文精神等等，成为最初的思想资源。但是正当我们沿着“启蒙大道”一路高歌猛进时，那些“思想前辈”们却各自东西，在自由主义、新左派这样的大路标下，儒家社会主义、国家主义等各种意识形态此起彼伏，目不暇接，启蒙的形象几近碎片，对于我们而言，到底坚守什么、批判什么，反而构成了一个令人困惑的挑战：是与曾经的“前辈”各自随流而动，还是在意识形态危机下重新寻回自己的判断与主体性，构成了 70 年代一代人的精神负担，这一点而言，相反对于韦国这些 80 一代却更容易释负。就像韩寒与韦国，构成了这一代年轻人两种极端的可能性，一方面他们可以根据利益来选择与资源控制者的关系，一方面他们也可以在已经开放出的部分社会空间里向这个体制进行挑战，其“直捣黄龙”之勇气，不光让 70 年代，甚至连 60 年代人，也不时会有“启蒙事业”的代际混乱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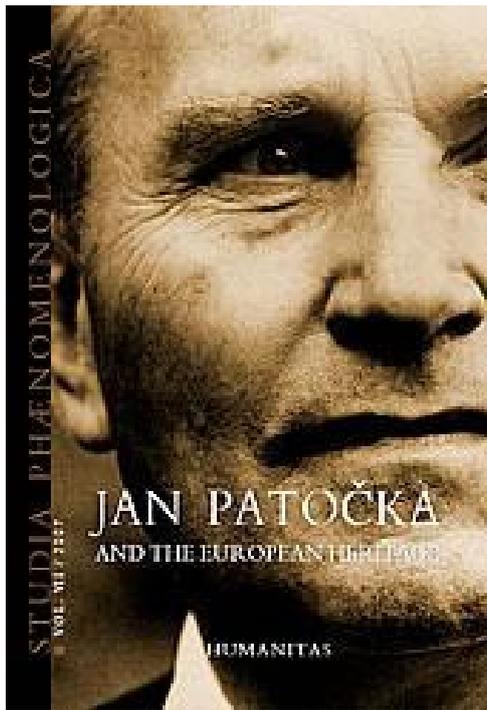
80 后一代人在两个方向的极端可能性，或许暗示出在未来的“盛世”情境下，“反抗”与“合作”将成为一代人的政治选择，但是于我而言，“反抗”与“合作”并不构成问题的全部，或者说，《盛世》揭示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假如百姓都欢天喜地地接受“盛世”，知识分子的那些反思，是否就是荒谬的？又或者，说“面对真实”的这一项意义要求，本身是否就应是人的本质特征，而知识分子的反思就是要不断的唤醒这种“真实”，让大众也能加入这场“面对真实”的意义之战？

回想捷克当年的七七宪章运动，表面上是一场政治反抗运动，但同时也是一场“生存意义之战”，无论是剧作家哈维尔还



是现象学学者帕托契克，他们的政治反抗背后，都蕴含着一种哲学意义上的追问：何谓真实？其哲学根源又为何物？哈维尔没有皈依过天主教，但却说：“我从小就感觉到有一种高于我的存在，那是意义和最高道德权威的所在。而且，在‘世界’的事件后面，有一种更深刻的秩序和意义。”这种“准宗教式”的哲学情怀，当年也曾鼓舞过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但是何谓“更深刻的秩序和意义”，我们却并没有过多探询。相反在捷克的现象学运动中，帕托契克却是将现象学与政治反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极权之所以要反对，是因为它是一套对权力意志的迷恋，它压抑对“真实”的探求，而且还会僭取“真理”的面目，自我宣称最高价值。反抗极权体制，不仅需要恢复常识，而且还需要有一种超越性的追求：对于哈维尔来说，这种追求是“良知”，对于帕托契克而言，那是对“虚无的反抗”。

“克服虚无”不一定会走向“面对真实”的哲学之路，从海德格到卡尔·施米特，都是一种试图克服现代虚无主义的现代思想努力，但是当他们的哲学走入实践，却又投入了极权的怀抱，相比帕托契克这样的哲人，同一个目标，不同的道路，这又意味着什么？



相比起来，中国的“哲学家”也喜欢谈救赎，谈道德，也会谈“拯救与逍遥”，念叨的是对虚无主义的克服、对现代性的批判，但是10年岁月匆匆过，最后却迎来“盛世”的国家主义巨灵，这些“虚无主义的克服者”们一方面认为大众必须以“巨灵”为意义的依托，一方面又在私下偷笑：“哲学家们才知道什么是真理，巨灵只不过是哲学家的诡计而已”。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哲学家”，要么回避政治，要么视政治为“谋略”，前者以“去政治化”和专业化作为逃避政治的借口，最后直落犬儒之窠臼；后者隐秘口授，私营党社，想的是如何靠培养一批“诡辩之士”操纵政治。说到底，他们也并没有真正地面对“生存意义”问题。

《盛世》里那丢失的“28天”，是将“前盛世”到“盛世”的转型过程进行“洗底”的28天，消除掉这28天的记忆，就意味着“盛世”让转型过程中的种种不道义都可随风成往事，不必回首追寻。但是在这“28天”发生的故事却事关“生存意义”的重要性所在，意味着对“盛世”的反抗从最开始指向的就不是简单的“衣食足”的物质目标，而是事关一种更为丰富的个人尊严的意义追寻。因此，盛世目标如果能得以服众，让人心安，最终就必须消解生存意义问题，让寻求“真实”这个目标变得虚无化，不具意义。

这就是“盛世”的哲学本质，它克服了极权治理技术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不足，从而试图让物质利益的欲望满足成为人生的全部意义问题，放逐“真”

与“善”的问题，也就使得政治只成为“生产”与“消费”的问题。批判盛世，其实批判的是这种关于人的人类学界定，人不仅仅是物质欲望的个体，同样也是一个不断寻求“真实性”的个体，不管他们所理解的“真实性”是科学，还是宗教。

当然这种批判也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就如今天的百姓同样会满足于各种“盛世”话语一样，奥克肖特也曾说，不是每个人都有自由追求的欲望，相反许多人会以这种自由作为负担，极权主义满足了这些人的要求，代替他们来进行选择，安排他们的一切，让他们过得安全而且快乐。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治理技术是无法消除意义危机的，治理术不会因为技术的高度发达而让某种“被安排的人生”而能畅通无阻，相反，无论是极权还是盛世，每当人们一次又一次的相信压抑和消除生存意义成为可能的时，就会遭遇到下一次的危机，而政治危机的爆发，又往往是从生存意义的危机作为开端。

陈冠中笔下的小希等人，觉得盛世来临，惶惶不可终日，这种悲观论调，现实中已成常态，而我常会乐天派式地以为，这等盛世，怎么看，都是满目疮痍，危机重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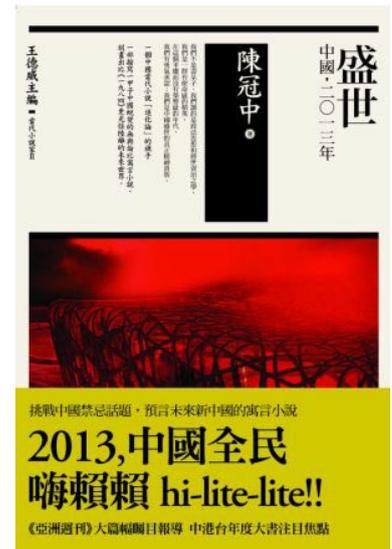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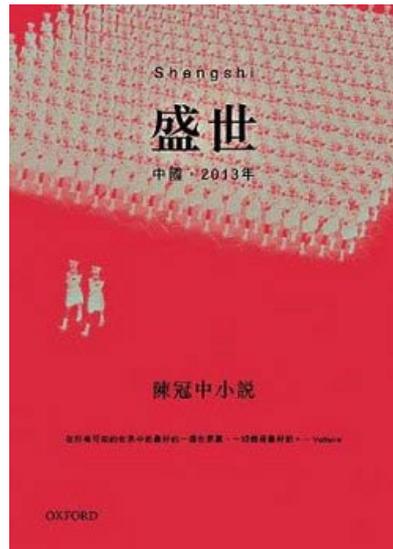
图3为七七宪章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图4为期刊《现象学研究》之《帕托契克与欧洲遗产》

FOCUS · SHENGSHI 聚焦 · 盛世

二十一世纪的“推背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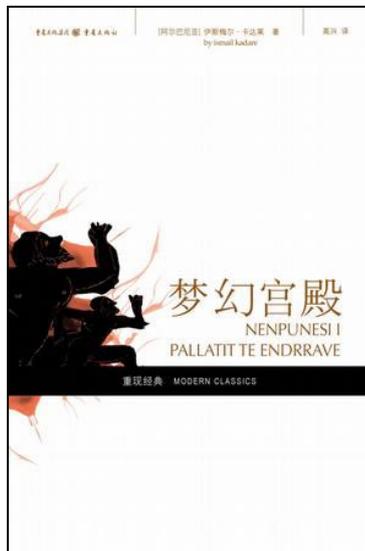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

陈冠中先生的《盛世：中国，二〇一三年》（以下简称《盛世》），出版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在知识界广为流传。它是二十一世纪的“推背图”，引起不同专业读者的普遍关注。我买了一本台湾版和三本香港版。我更喜欢香港版的装帧，封面是红色的喜洋洋的色调，符合2013年的和谐气氛，仔细辨认才能发现的女兵阅兵方队，性感又威严，很符合2013年的指导精神。封底印着“新盛世主义的十项国家献言”：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稳定第一的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威权政府、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央企主导的公平竞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以我为主的和谐外交、单民族主权的多族群共和、后西方后普世的主体思想、中华文明举世无双的民族复兴。可惜字体太小，如果以“八荣八耻”的模式印出，效果更佳。



当然，我买这么多本《盛世》，不是为了收藏，而是送给朋友，但主要送给研究思想的朋友，没有惊扰研究文学的朋友。如此厚此薄彼，是因为我对《盛世》的文学价值有所怀疑，它犯有小说的大忌：情节概念化，人物符号化。《盛世》预设全球进入经济崩盘的“冰火期”，中国一枝红杏出墙来，经过28天的集体失忆，“新盛世主义的十项国家献言”在2013年取得全面胜利，全民陷入一片欢乐的海洋，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只有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感觉不太对劲。这是一个非常明晰的“寓言”，明晰到寓意呼之欲出。书中的人物形象过于鲜明，借用福斯特的术语，都是扁形人物（又称扁平人物）。作者使用了一些障眼法，也否认在影射，但还是很容易对号入座。

台湾版封面称这部小说“刻画出比《一九八四》更光怪陆离的未来世界”，有人建议《盛世》直接向《一九八四》看齐，改名为《二〇一三》。在我看来，如果把《盛世》放到“反乌托邦小说”的谱系里，它和《一九八四》的差距不可以道里计。暂且不说《一九八四》这种反乌托邦经典，就在阅读《盛世》的同时，我读了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的《梦幻宫殿》（高兴译，重庆出版社，2009年11月）。这里照抄一段它的内容简介：



卡达莱将小说的背景虚构在19世纪的阿尔巴尼亚，当时阿尔巴尼亚还处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主人公马克-阿莱姆在梦幻宫殿（睡眠与梦境管理局）工作，梦幻宫殿每天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分类、分析成千上万个梦境，以便了解人民的所思所想，帮助国家或君主免于灾难。在他有权的叔叔的帮助下，马克-阿莱姆在梦幻宫殿直上。但是，有一次在破解一个意义重大的政治性梦境时他出了差错，结果给自己和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与《梦幻宫殿》相比，《盛世》的想象力严重不足。作者似乎意识到这种缺陷，在第二部加入了推理小说的元素，却适得其反，读来非常突兀。绑架高级官员何东生的创意，仿佛来自大陆警匪片的编剧。但是大陆编剧一般不会如此低估专政机关的厉害，政治局委员哪里是那么容易近身的？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但是”，我就不会写这篇文章。《盛世》的贡献不在文学层面。我更愿意把《盛世》当做像小说一样的政论，而非像政论一样的小说，前者是称赞，后者是批评。王德威先生为《盛世》做了有力辩护，在台湾版序论“《新中国未来记》——廿一世纪版”里，王德威坦承“纯从叙事技巧来说，《盛世》不无可议之处”，同时指出陈冠中正是要反击“完美的叙事”，“《盛世》的叙事本身的缺陷成了必要之恶”。但是，王德威表示“这样的解读也许有为陈冠中强作解人之嫌”，又指出小说作为一种“社会性象征活动”的政治意义潜能，在当代中国小说里已经久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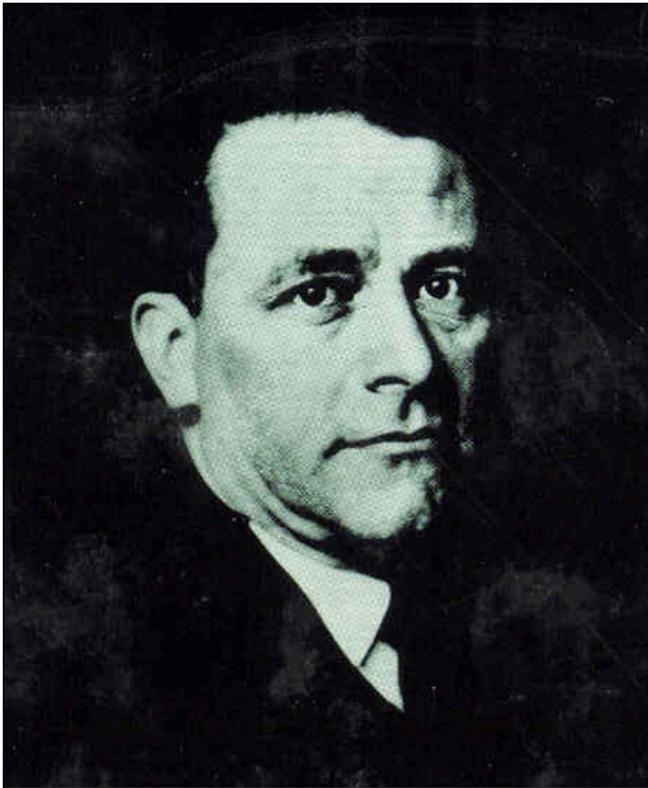
我非常理解王德威对《盛世》的辗转反侧。这与当代中国文学的整体状况有关，在“纯文学”的保驾护航之下，文学已

经成为毫无意义的填字游戏,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小说”具有对冲作用。2006年,思想界对《如焉@sars.com》(胡发云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6年10月)的推举,也是出于这个想法。但是以“政治小说”对冲“纯文学”,未必收到以毒攻毒的奇效,反而可能两败俱伤。王德威将《盛世》放入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的“政治小说”谱系,是为《盛世》寻找文学上的合法性。陈冠中也表示“借用了一点点政治小说、反乌托邦小说和推理小说的手法”。在我看来,不如直接把《盛世》拉出小说的行列,把它看作小说体政论。

从小说体政论的角度来看,情节概念化、人物符号化就不是什么问题,反而说明条理清晰、观点鲜明。叙事具有缺陷没有关系,与一二三四、甲乙丙丁的政论相比,《盛世》已经是异常生动。缺乏想象力也情有可原,讨论政治要从现实出发。从我所了解的反应来看,《盛世》获得关注,不是因为它超出了读者的预期,而是印证了读者的判断。或者说,《盛世》讲述的

不是2013,而是现在和过去。通过严打建立威权不仅是1983年的往事,正在重庆复制。2009年,朝鲜进行货币改革,同时规定货币兑换额度,比小说中个人存款兑换成消费券还要利索。知识分子与民同乐,关心蔬菜和粮食,关心住房和股市,却对蔬菜、粮食、住房、股市中的历史和现实形同陌路,在上海已经有着一二十年的悠久传统。

对于当代中国,学术研究多半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这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是走进自己制造的迷津,一件非常容易做出是非判断的事情,经过一套看似深刻的话语的包装,变



得模棱两可,甚至黑白颠倒。比如对于国家主义,历史上已有很多伤口,但是在学者那里,经过现代性、中国模式、认同政治等包装,就会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圣词。另一种是走进迷津再走出迷津,描绘迷津地形图,这是学术研究的应有之意,但只有少数学界中人能够入乎其内、出乎其外。陈冠中曾在台湾《思想》第一期发表《顾左右言他:中国论述的绛树两歌》,可惜知者寥寥。

《盛世》以“简约而不简单”的原则,描绘并且介入了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它的主攻对象是SS读书班,该班最年轻的成员韦国这样描述:

SS读书班是学术、政治和产业界的结合……我们的人脉一直往上延伸,直通天庭。

我们不是书呆子,我们读的是政法思想和经世资治之学,座右铭是智勇双全——我们是提倡尚武精神、英雄主义和男子气概的。

X和Y、Z教授是SS读书班的发起人,他们的主张是:理念与权力结合,让中国更强大。是他们以精读西方和国学正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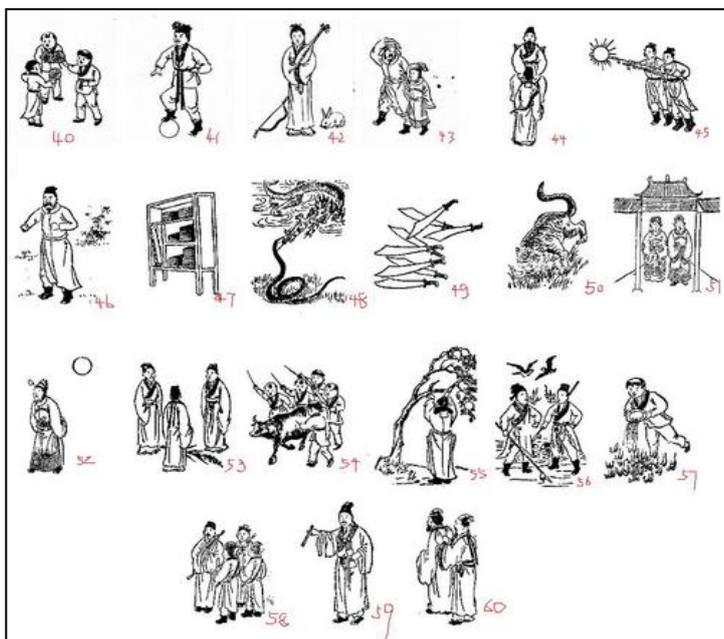
的名义，吸引官员、解放军将领和企业界中有思想的人来参加读书班。XYZ 都想当国师，认为十年内他们的理念将主宰国家的命运。这都很符合我个人的十年规划。

SS 是卡尔·施密特和列奥·施特劳斯，XYZ 是 SS 的中国代理人，具体何许人也，不必点破。SS 读书班成员多半会认为，《盛世》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列奥·施特劳斯有一个叫做“隐微写作”的祖传秘方，来自古希腊哲学家。传说哲人为了免受迫害，秘传真理，套用范伟的台词：“一般人，我不告诉他。”读者一定要在哲人的著述里追寻微言大义，否则就有浅薄之嫌。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 SS 的批评者，都无法幸免“外行”一说。你为什么批评 SS？因为你没有看懂。

《盛世》提出一个问题，谁在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是《盛世》的作者，还是 SS 读书班？加拿大学者德里在《列奥·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张新刚、张源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里指出，施特劳斯肯定“默许”了弟子学派在他身边形成。“默许”一词颇有微言大义。德里同时指出，施特劳斯的声名“更多是由众多忠实狂热的追随者带来的，而不仅仅是因为其优异的著述”。弟子们让 SS 以及 XYZ 这些导师旱涝保收，他们将导师推向教主式的位置，教主也“默许”了这个事实，享受着信众的崇拜，如果教义出现什么问题，是信众误读了教主的微言大义，不是教主的问题。

声称“隐微写作”的学者，成了桃李满天下的学术明星，就像隐士成了君主的宾客，很荒诞、很现实。《盛世》的主攻对象不是 SS，也不是 XYZ，而是以韦国为代表的 SS 读书班成员。韦国，24岁，北京大学法学院学生，大学二年级开始组织同学上网驳斥反动言论，积极检举揭发违反主旋律的教授，并且成为组织的卧底，理想是进入真理部工作。他非常认同 SS 读书班经常贯彻的政治就是区分敌我的理念，主张批判不分敌我的大爱、博爱、爱全人类等所谓普世价值。

即使 SS 具有微言大义，也需要承认，将 SS 简化的可能不是批评者，而是追随者。正如《盛世》所说：“读书班最初是以学习他们的政治神学和哲学开始的，不过后来发展下去他们是谁就不重要了。”在当代中国思想界，不乏学者撰文阐述 XYZ 如何背离 SS，SS 读书班成员又如何背离 XYZ，这固然符合学术探讨的精神，却是鸡同鸭讲。在“隐微写作”和“微言大义”相结合的公羊学那里，背离是创造，所以学者从思想路上的批评，在 SS 读书班看来是隔靴搔痒。



讨论 SS 在中国的影响，需要绕开 SS，直接面对 SS 读书班。否则，就会陷入前面提及的循环论证，批评 SS 会被视为外行，只有认同 SS 才会被视为共同体成员。试图影响中国进程的不是 SS，而是以 SS 为名的 XYZ、以 XYZ 为名的 SS 读书班成员。《盛世》旗帜鲜明地指出，SS 读书班成员是“盛世”的中坚力量，XYZ 和 SS 读书班具有“共谋”关系。韦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人物，也是一个需要认真讨论的问题。《盛世》的这种直指问题核心的讨论，得益于小说体政论的形式。学者们习惯于论资排辈，更愿意讨论 SS 或 XYZ，而非 SS 读书班。他们认为韦国式的年轻一代尚未进入主流，不足为虑，但纳粹、红色高棉、红色旅的历史都已经证明，恰恰是读书班成员直接介入了历史。

遗憾的是，《盛世》过于强调韦国和母亲小希的分歧，有将思想差异简化为代际差异之嫌，小宝先生看完《盛世》，推断“作者相当讨厌当下八五后、九〇后的

得志青年”。对此，《新民周刊》记者特别询问陈冠中，这是否符合他的真实意思，陈冠中回答说：“小宝何等聪明，多刁钻啊，以小喻大，声东击西。不要只看他写什么，要读出他不写什么。”询问作者的真实意思，是一件很没有意思的事情。但是陈冠中的回答，比小宝更加聪明和刁钻，这是一个 SS 式的回答，“不要只看他写什么，要读出他不写什么”，小宝取代 SS 成了“隐微写作”的代表。莫非陈冠中准备让自己叙事的缺陷再次成为“必要之恶”？“必要之恶”的说法，与 SS 读书班是否有暗合之处？两者如何区别？

在年轻一代中，思想差异已经不再是代际差异。代际内部的差异不容忽视，既有韦国那种举报网络不良信息的积极分子，也有牛博、推特、豆瓣的“低俗”网友，两者之间的博弈才是 2013 年最为有趣的故事。即使后者最终全军覆没，覆灭的过程也值得细细道来。作为一本小说体政论，《盛世》完全可以放大韦国的能量，着重描述 SS 读书班可能产生的致命后果。

推背图重在预言未来，如果《盛世》以预言未来的方式使得 2013 年避免“盛世”的命运，那就是它的最大贡献。

图 4 图 5 分别为卡尔·施密特和列奥·斯特劳斯；图 6 为中国古代推背图

FOCUS · SHENGSHI 聚焦 · 盛世

访谈：“盛世”不是预言，我写的是今天

灵子（北京，liufang0815@gmail.com）

坐在三里屯已被旺旺集团收购的星巴克，手捧一杯全球热卖的“桂圆龙井拿铁”，看着眼前络绎不绝的各国游人、消费者，文化人“老陈”眼圈一热，差点因周遭洋溢的幸福感落下泪来：

不要以为我是在盲目吹捧中国，我知道中国问题还很多，但想想，以美国为祸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我摧残……至今未能爬出谷底，唯中国能独善其身，人退我进……预估今年将是连续第三年增长超过百分之十五，不单改写了国际经济的游戏规则，简直是改写了西方经济学，更重要的是社会没有动乱，反而更和谐。真不由你不服气，太了不起了……

这是 2013 年。“老陈”刚刚参加完一本杂志的新春茶叙，这本杂志因在两年前提出十项国策建言而备受高层肯定：一党领导的民主专政；稳定第一的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权威政府；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央企主导的公平竞争；中国特色的科学发展；以我为主的和谐外交；单民族主权的多族群共和；后西方后普世的主体思想；中华文明举世无双的民族复兴。

中国进入“盛世”阶段是在 2011 年。这一年西方国家再度爆发经济危机，全球经济进入“冰火期”，陷入长期滞胀，唯有中国自救成功，经济起飞，社会稳定。到了 2013 年，中共十八大换届翌年，中国比今天更富强、更自信，人人都情不自禁感到 high，每天都幸福得不行。

只有一小撮人忧心忡忡。从海外归国的知识分子、“老陈”的旧友“方草地”发觉人们丢失了一个月的记忆，人们都以为世界经济进入“冰火期”、《人民日报》宣布中国盛世正式开始，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事实上中间间隔一整个月。期间“全国动乱、抢购粮食、军队进城、公安严打、禽流感疫苗注射，都没人记得了”。



“方草地”要找出真相，过程中陆续碰到从农村来的民谣歌手张逗、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化沙龙女主人“小希”，高层官员“何东生”……“中国盛世”出现的原委逐步展开，最后一章更是洋洋洒洒由“何东生”以大篇幅介绍了当今经济、外交、军事大势，并称“今天的中国，已经是现有条件下最好的了。”

小说作者陈冠中，上海出生，香港长大，美国留学，曾在台北居住六年，2000 年开始定居北京。很难用精准的词去描绘这个多文化背景的男人：他写作、做传媒、搞电影、做策划、从事公益项目；他往往在一些关键时期之前一点出现，并做出先人一步的成绩，比如 1992 年南巡之前来大陆做投资，香港电影黄金期前到香港写剧本；他永远一头花白

齐耳中发，说话温文儒雅。

对于这本被媒体频频称呼为“预言小说”或“寓言小说”的新作，陈冠中只是温和恪守自己小说家的本分：“其实我不是预测，我写的是很浅白的现实主义小说。只是为了让情节更夸张一点，我才拉到 2013 年。2013 年是不是这种情况我真的不知道，我想说的是，今天已经是这样子。”

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酝酿这部小说的？

陈：想到大陆来写个小说，是2000年搬到北京的主要原因。我在1998年写了长篇小说《什么都没发生》，是关于香港的，然后就想写一个大陆的题材。但是一直到2009年都没写出什么。

我1992年到1994年来过大陆，然后去了台北，中间有来过大陆，每一次都觉得大陆发展太快了。到2000年再回来，基本已经是两个样子，而且很明显全世界的目光都在大陆，所以我一直想快点回来，写大陆新情况的东西。但是，原来这么难写。表面认知很容易，然后会经过一个阶段对自己非常怀疑，到底自己了不了解大陆，来来回回几次。每次觉得自己差不多知道了，又会有一些现实的事情出来打乱，让我发现自己真的不了解大陆。其实外商很多人都经过这个阶段。比如1992年一进来我要做文化投资，从港人的角度就是市场运作，看杂志能不能赚钱，这是唯一的考虑，到大陆我们需要找合作伙伴，但是选择合作伙伴除了钱之外还有方方面面的考虑，因为当时都是国家的刊物，所以它自己的位置、在单位的前景都是考虑因素；也有谁说了算的问题，一把手说了不算，因为一个副手不同意事情可能也不会成。我觉得每一个外商没有两年的经验都不应该下重大决定。

问：那《盛世》之前有过什么创作尝试吗？

陈：有关大陆的题材第一个我写过上海，因为我自己是上海出生的，后来去了香港，家都是在跟上海有关的社群。所以从来都对上海有很大的想象，觉得很亲切。然后因为香港也很流行张爱玲的小说，我看了她的传记说她在美国的时候想写个英文小说，*Shanghai Loafers*，上海闲人，我想我也应该能写一部，这个圈子我比较熟。但是都写不出来，就算是写上海人，必须要写到他们的过去，为什么现在是这样子，写来写去觉得自己很没有底气。

问：现在的想法什么时候开始成形？

陈：真正成形是2008年。我觉得2008、2009两年是中国一个新的阶段——其实我经过中国好几个阶段：1992年我是在南巡之前进来的，气氛跟南巡后完全不同，后来总是说胆子要大一点，步伐要快一点；1994年我走的时候已经施行宏观调控了，气氛又不同，如果你是从外面进来的，会觉得真的变化很大，一会儿都在谈什么都能做，一会儿什么都不能做；到2000年前后又是一个大变化，申奥、进入WTO，气氛整个乐观起来；更大的变化是2003年SARS之后，SARS期间大家都跟安静，一过后什么都非常快的起来；但是再怎么样，都没有像2008年这样看的这么清楚，除了经济上更富更强，人们的心态尤其是年轻人的心态也看得很清楚。中国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就是我小说里面的“盛世”，可以说从这一年就更成形了。

问：很好奇你怎么定义“盛世”这个词？除了经济发展因素之外，还有哪些特征？

陈：其实这个词不是我创的，越来越多中国人这样看自己，到2009年外国人也这么看中国。这两年真的有很多中外媒体在使用“盛世”这个说法。西方出现金融风暴，中国好像有点危机，但是一下也没事了；再加上奥运，等等。所以到2009年1月，我觉得可以写了，有时候你需要客观形势整个定型了，你才能写一个时代的东西。以前很乱的时候我还很难组织，但是2008年之后，现实帮我组织好之后，我的小说架构就出来了。真正写起来很快，1月开始写，到6月完成，中间还停了幾次。这个才12万字。后面一部分是早就想好了，主要人物也有了，就是想找方法让这么短的小说能多些不同的声音。

盛世的主要表现是自信心、自豪感，有点兴奋过头，对以前的一些想法都有反思——这个反思有时候也会矫枉过正。基本上中国的现实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富，是一个已经崛起的大国、而且是会继续往上走的超级大国的，这是无可否认的。问题是在这个21世纪，这个特别的大国应该是怎么样的大国，这个我们正在看，这部大戏刚刚开场。

问：你认为中国未来会往你描述的“盛世”发展吗？这样一种在政治改革未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场景，是不是一种一厢情愿？包括“何东生”这个角色，平心而论算是个有抱负的官员，与现实相比算是乐观吗？

陈：其实书里我说到的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很可能最后不是这样发生，因为这个可能性建基于外部环境怎么改变，也

建基于我们内部有些什么政策能对应。如果不是完全这样走，就不会有我描述的这样的盛世。但不否认现在可能已经进入一种可以用“盛世”来形容的格局。

我是故意设计一个相当不错的官员来讲这个事，如果找一个贪污腐败的官员来说也没意思。何东生提出的构想真的不是说太差，中国依靠内需拉动经济，不再完全依靠出口，人民币升值，工人工资提升，国家税收增加，可以转移支付搞好医疗、社保，而且继续改革开放，民进国退。另外对外来说也有些动作，表明我们是希望在中国和日本共同带动下，保持东亚区的稳定。其他很多人的论断是很极端的，要么西方打压中国，要么中国打压西方，这其实也是很不稳定的状态。我写的时候，中国与日本联盟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很多人都在谈这个事情，时间很巧。好几个我的朋友，搞经济的，研究外交的，跟我说，说不定这样真的行。

问：可是靠封锁信息、控制言论的威权统治能保持稳定，这样的盛世能长久吗？

陈：何东生提到了三峡溃坝，他自己也是战战兢兢的。我希望我们的领导不要整天想以后洪水滔天都不管他们的事，希望他们真的面对实际现实。

问：这样的盛世图景是你基于这些年来对大陆现实关注的结果？

陈：是，我没有深入研究经济，只是从写小说的角度关注一些皮毛。都是公开的资料，一点特殊的资料都没有。我的渠道是关注大量的媒体，但更重要的是找一些有想法的人聊天，不一定是大知识分子，甚至是普通人，只要是反映他们真实性的东西。有官员、生意人、体制内外的知识分子都有。

我所写的主要也都是知识分子阶层，而且还是偏向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在谈的事情。他们有些是学院的，有些是媒体的，有些是公共知识分子，我 2000 年以来主要是跟他们来往，所以知道他们的话题是什么，他们的性格，过去的经历，然后再创作、虚构。

问：如果中国未来如你所料，那么这种图景的建设都要靠“韦国”这样的年轻人来承担吗？

陈：这个就太不幸了。我认为我的小说里面最可怕的人物就是“韦国”，是我自己边写边觉得害怕。他们可能是内在化的体制里面最不好的一面，我们的教育太失败。有朋友说这个是文学上真正出现的“新人”，以前文学没写过这样的形象。有一个清华的大学生跟我说，他身边有一半以上同学都是“韦国”这样子，所以他看了之后特别震惊，我也很震惊。

问：“小希”这样的沙龙女主人形象想必也是来自你生活中切身体会？

陈：我身边有很多现在状态很像“小希”的人，后来还有朋友不断告诉我还有谁就是“小希”。她们从八十年代文化氛围过来，对现在的情况更有距离，是最失望的一群人。以前这样的人还会更多一点，但是中国在九十年代接受了分化，大家不见得能坐在一起说话了，不知道对方会怎么想东西，这对她们来说是很痛苦的，有孤独的感觉。包括书里提到她身边外国人心态的变化，我也深有体会。有些外国人来中国之前充满偏见，一到之后完全改观，觉得西方媒体在骗我们。其实他们也没好好看西方媒体，才会有这么大的落差。前两年还有一个加拿大的朋友来之前问我，是不是你们现在都穿毛装……都什么年代了。然后来到这里看到 798，觉得中国是最前卫的地方。

问：民谣歌手“张逗”的存在是否寓意着，即便是幸福生活，也难以阻挡人们向往自由这种天性？

陈：很高兴有人关注到“张逗”，没什么人提到他，但是他能不能承载这么多解释我也不知道。“张逗”终于能找到一个机会能走出他的生活圈子，本来在农村不是说很有前途，后来很幸运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这个幸福是非常脆弱的，随时可以被摧毁。他其实没有太大的物质要求，只想要一点小的乐趣，但是如果现实再差一线，比如他原来依靠的“妙妙”不能再支持他，他的生活会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问：为什么要插入家庭教会的一部分？据你了解大陆目前这方面的情况是怎样的？

陈：这部分主要是因为2008年我认识的一些研究宗教的学者给我看了一些资料，我觉得太惊人了。他们的调查显示数字，主要是指基督教新教的人，已经达到了七千万到一亿，我还在书里故意把数字压低了一点。十三个人里面有一个教徒，这是我们在中国没有见过的现象，但是这个已经是中国的现实，我们以后怎么去面对这个事情是要认真考虑的，不可能按照以往的思维去对待。这些有宗教信仰的人能安心做人的机会是大一点的，不会做太违反道德的事情，所以这个族群是很值得去关心的。书里的状况比现实要松一些，最近其实没有这么宽松，尤其是城市，生存条件比较艰难。有学者真的在说要“脱敏化”，这是北京学者现在在用的专用词，如果不是“脱敏化”而是“对立化”就很糟糕了，当然“脱敏化”他们就会发展得更快。我不知道怎么看待这群人将带来的影响，但是这已经是现实。

问：你个人认同“盛世”是“所有可能性里面最好的选择”吗？

陈：起码我小说里面的一个权威人物这样觉得，呵呵。也有读者看了之后觉得，如果2013真的是这个样子，也不算太坏。我的小说的主要目的，是让不同观点的人在一个文本、一个载体里面都发出声音，读者能感受到不同的观点。在我个人来看，这个肯定不是最坏的选项，是不是最好的，我相信一定有更好的余地。不过现在这个情况，好像是在走这条路。其实长线看我是乐观的，但是短期这几年我略带悲观，这几年有几次波动，尤其是经济上，可能会引起社会的动荡，我也希望中国能过这些关。究竟按照怎样发展，也不是个人能把握的，我只能说做好自己的事，努力说点真话吧，知识分子一定要有这个责任感。

问：你以前在接受采访时讲过，这部小说的潜台词是，如果盛世出现，中国尤其是知识分子将如何自处？

陈：对，包括老百姓应该怎么自处，这都是需要有人发问的：到底怎么样才是对的。其实总的问题是，21世纪的大国应该是怎么样的，全世界会怎么样，会不会像以前很多西方论断的认为，会有文明的冲突啊，大国崛起就会打仗啊，西方不会让中国崛起啊……我觉得也许可能有一种新的局面出现，中国提出美国当时的门罗主义，美国在东亚方面退出一点，中国保证它一点能源的进入，能伸出友善之手与日本和好等等。有点一厢情愿，但不是完全没可能。

问：那你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像“老陈”、“小希”一样选择逃避、无可奈何？

陈：这只是我小说人物里的一种处境，也有人在里面如鱼得水，也有人没有这么大的心理折腾，做自己很扎实的研究工作，比如书里社科院的胡燕。我个人的倾向是，如果是知识分子，必须要有自己反省的能力，他不能完全不去做思想的工作，不能每天在星巴克喝咖啡就满足，别人可以，知识分子不能。

现在不是很多官媒在说西媒捧杀中国吗，其实只要我们自己不要捧杀自己，问题都不大的。但问题是往往我们自己也在捧杀自己，每一个大国在发展崛起的过程中都不应该这样子，而是需要一些清醒的讨论。但是现在我观察到一个倾向，现在在政府，或者与官方有关的企业，他们的官话、套话特别厉害，这个比我在1992年到1994年时感受到的更厉害——那个时候很有意思的是，大家反而想躲开这套话语体系。现在各个阶层都恢复了官话套话，压着问题的真实性，导致我们没有真的好好面对现实。其实就是在现有的机制框架里面，我们都可以把这个态度改变。比如说，中央到地方的政协。政协存在的初衷就是让大家都发表意见，做监督、提醒，但是现在政协也都是官话套话，连建国时候的目的都没达到。其实政协应该成为说真话的地方，这个是现有体制内就存在的，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初曾经做到过，现在我觉得是官场风气的问题。

我相信很多在政协里面的朋友都是知识分子，起码他们受过很高的教育。说真话是最基本的，不要说官话套话嘛，这样社会怎么进步呢？现在从大学应试的课题到官场都是这样，越是精英大学，指名道姓的话比如清华，越是这个样子。这是对国家很不利的东西。我们现在需要很清醒：我们是挡不住的大国崛起，但是要怎么走这条路，需要让有知识有见地的人发言，表示不同的意见，然后就能纠错。现在我们很多纠错的代价是非常大的，要真的出了大状况才会纠错，就是因为过程中没有更多的声音，没有必要的负面反馈参与进去。我是很赞成我们要谨慎的，如果要改变这个社会，要非常理智的做，上上下下

大家要有共识，社会必须要稳定。这些价值观我都很赞同，但是必须有人要说点不中听的话，这个窗口要开着。

问：你认为知识分子群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陈：中国的知识分子族群是非常庞大的，中国在知识分子上的投入也很大，这是中国的传统，也是当代的做法。知识分子很多是在体制内做事，中国的崛起对很多知识分子而言也是有利的。比如说对科学家而言，现在有这么科研经费，可以做甚至外国科学家很羡慕的项目。国家富强之后，大家可以背靠大国做事，包括国家崛起，体制就需要吸收更多知识分子。他们在体制内越多，不见得是坏事，甚至是好事，整个的管治水平会提升也说不定。但是我一直在说的前提是，知识分子不能一进入体制就说官话套话，这样进去又有什么用呢？这样下去整个社会很容易走歪。现在只有依靠知识分子在理性和沟通的层面在上层调整过来，不然就需要社会力量来调整，这样说不定代价就很大了，因为只有出现几项大的状况，甚至是失控状况，社会力量才看得到。

现在有点这样的情况，知识分子自己把声音压下来了，压下来之后再听听有什么声音，然后以为这个声音就是民意了。其实这是自己筛选后给自己听的民意，有点在自我麻醉，觉得声音都非常和谐，因为不和谐的都过滤掉了。我整天没事做就是看报纸看杂志，觉得这个变化非常明显，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还能听到不同的声音，现在特别听不到。不过我没有特别的想法提出解决途径，我不是能做这个事情的人，我只是把这些现象写出来，希望能引起大家思考。

问：你以前的文章里提到，早年在香港的时候是比较不屑“知识分子”这个词的。

陈：是，我对知识分子的认知也是有阶段性的变化的。我们这一代在1949年之后出生的所谓婴儿潮一代的香港人，跟我们上一代从大陆移居香港的人不一样。当年大陆移居过来的知识分子非常心怀中国，说什么都是中国，整天讨论中国往何处去，整天问自己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什么，我们就觉得很烦，因为他们完全不知道香港发生什么，他们没兴趣。我们这一代只有香港，不是说我们不想去关心别人，但我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关注。因为中国跟香港的边界封掉了，中国在七十年代又在进行文革，我们只能是看着自己的肚脐眼，梦想着西方，这是客观形势强迫我们的。所以那时候反叛知识分子的说法，不肯这样称呼自己，因为他们用的太多，我们一用就好像跟他们一样了。就像西方六十年代的反叛文化，counter-culture，跟主流文化对抗。但是我们也不是没有知识的一代，也看了很多书，也知道文化的事情，客观上还是逃不掉知识分子这个标签的。

尤其到大陆之后，整天听到公共知识分子的提法。知识分子不光是按照大知识分子小知识分子这样以学历客观来分，还要以企图心来分，就是你的用心是不是想在公共的领域发出声音。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要放弃公共性，不能完全以市场原子化的面目出现，只关注私人的事情。现在很多人都知道有问题存在，但是他们也不是不能接受这种不好的情况，只要你不要冲击到他自己的就好，从小市民到学者都有这种心态。其实如果真的能好好讨论，说不定就算在现在的框架里面，也可以做到更好。当然这边也有一个情况是环境的压抑，他们不方便说。

北京是最多人关注公共性的。在香港这几年好一点，以前大家都只谈自己的事业，认为市场可以调解一切，公共是不重要的，后来也知道不行。但是到了北京呢，所有身边的知识分子都很公共的，所以未来不论出现什么形势，我都要留在北京。

问：有趣的是，读者们会有两种不同截然相反的反应。有些人看了书会觉得如果真的在这种只有“九成自由”的时代生活很恐怖，没有思想言论自由，有些人则觉得中国2013如果真的能这样也不错，起码绝大部分人都很幸福。

陈：是，所谓“好地狱”和“伪天堂”。好地狱是鲁迅一篇比较奇怪的文章，我其实看了好多次也没看懂，到底他觉得怎么样是好地狱，我说不出。它和伪天堂都是很暧昧的概念，我只是觉得挺好玩的。

李欧梵教授的评论里面引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寓言“大审判官”，这个故事是说：在宗教迫害很厉害的年代，耶稣去到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大法官对耶稣说：“你回来干什么？你空手而来，只带给人一点自由的承诺，但一般愚民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因为人类社会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自由，你说人并不只为面包而存活，但我却要告诉你：先把人喂饱了再谈美德。现在他们跪伏在我面前说：宁愿作牛作马，但让我们丰衣足食。”最后大审判官警告耶稣不要再来了！耶稣无声地离去。这个故事在西方一直有讨论，比如有些人如D.H.劳伦斯认为大法官是对的，也有些人认为这是很悲哀的。

这让我觉得我的小说可能也做了一点这样的东西，非常为难的暧昧：幸福与自由，到底能不能兼容？这是一个当代的课题。因为大法官说每个人都有自由意志，这个世界就没办法管了，他还这样讲耶稣。我很感激李欧梵说到这个提醒了我。

问：你个人的倾向是怎样的？

陈：这些都是文学语言，我们都是用这样譬喻似的方法来说事，让你来思考而已，并不是说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简单的两个极端。现在是假设性的，是不是真的幸福，究竟是谁的幸福，是不是非要一党统治，我真的都不知道答案。人有时候会要求自由，有时候会要求幸福，有时候两者能兼容，我相信是有办法保证两者都在的。自由是在幸福里面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不是说会到不自由就马上去死的地步，也不是说幸福只是物质上的累积。

问：你相信民主政治还是精英政治？

陈：很难说相信哪一个，因为民主有很多种……个人来说当然是希望一个官跟民的权利能划分清楚，官民权界能互相制衡，不会走到一个极端的政治。民主也可以导向暴民，官的权力太大也会导向腐败、转制，所以希望有个制衡。但是具体实现的方法我也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有精英在体制里面，参政人水平高是好的，但不是说精英主义，只准某些高层的人参政当然是不好的。现实中的情况很复杂，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是很重要的，但中产阶级、网络、农民工可能也都是改革的动力，各种阶层都有改革的潜力在里面，但是总离不开政府的自我改革，尤其在中国这是很关键的。

问：你希望这样一部小说能引发读者什么样的思考和反馈呢？

陈：其实我自己并不是比其他公共知识分子更知道中国的情况，也不见得比他们更有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但是我是希望能把他们的东西用文字组织起来，让大家能够看到。我相信一个文本里面看到不同声音，跟分散的文本里面看到是不一样的。小说有一个功能是能说一些暧昧跟复杂的现象，让读者寻找一个新的感觉出来，可能现在中国就是需要寻找一种新的词语、想法、感觉，跟以前描述的不一样的，其他的学者可能会把它变成理论的语言。但是如果没感觉到，你只能用以前的理论来认知。所以小说有时候可以贴近现实。比如说现在的农民工、蚁族，真的要有人写出来，你感觉到了，才可能会想应该怎么办，不然你只从社会学阶层的理论去想，根本找不到出路。

问：现在你收到的最多的反馈是怎样的？

陈：海外有一些大的文学批评家，比如王德威、李欧梵、刘绍铭，都马上写了评论，年轻读者看这本书就是增加了对中国的理解。我对海外读者的期待就是这个小说能填补他们认知上的不足，我想他们可能对中国的了解可能与现实有点距离，或者抱有某种成见，看过这本书之后会有点进入中国的状态就好。

大陆的读者呢，因为我这个小说是知识分子小说，读者对象也是知识分子，只要他们看完说“挺靠谱的”，那我就达到目的了。因为虽然挺靠谱，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写出这样一本小说，但是没人写过。做这个事情的回报道太低了，这个书因为各种原因大陆没能出版，我现在只能在香港台湾出，恰恰在香港台湾没有什么人关心这种内容，所以印数是非常低的，香港加印完了大概只有五千册，台湾也只有几千册。现在有人写了，虽然不怎么样，但是起码靠谱，已经做到一个起步点，今天的状况有一个文本了。有些大陆朋友还用比较好的词，说好像搔到痒处，有些就说你把我们终于聚到同一个大门外了，还有人批评我没有把门打开看看里面——我也不知道怎么打开，也有人说你说了一些大家公开的秘密，这对我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因为我到底是一个外地过来的，能写到他们认为里面有相当大的真实性，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恭维。

各种结论也不一样。大部分人一看到这个书，就会他们联想到他们熟悉的小说，比如《一九八四》。这是大陆读者几乎第一个都会联想到的事情，这就多了一种文学上的联想。海外读者不见得，他们就是想看到中国现在的状况。《一九八四》其实跟现在中国的状况不太相近——我说不太具体，因为我是三十多年前看过，现在故意不去重读——那个感觉是很闷很压抑的，现在中国的状况是喜洋洋，这是我书里经常强调的。但是大陆读者都一定会拿这个作对比。让我惊讶的是很多做生意的人，甚至跟官方经常来往的人，他们都觉得有意思，有点想法。所以暂时的反应是相当正面的。文学上的不足、文字上的或者人

物上的不丰富，这类批评都有，但是我希望达到的目的都达到了。

问：这么巧有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出来，媒体经常会放在一起讲，你认同吗？

陈：是，而且也有很多国外的人在写，要么中国统治世界，要么中国威胁世界，但其实我不是预测，我写的是很浅白的现实主义小说。只是为了编故事，我把它放在 2013 年，情节可以更夸张一点。如果真的是写未来小说，不应该放在这么近的年代，应该放在三十年后没人可以印证的时间。现在这种手法我想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2013 年是不是这种情况我真的不知道，而是说今天已经是这样子。但是这样有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就是，一拉到 2013 大家就自然想到《一九八四》、《美丽新世界》，王德威就说想到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预言六十年后的中国……这种未来小说、预言小说的感觉马上连在了一起，这个使我的书的阅读增加了很多乐趣。

问：创作这部小说给你自己带来什么影响？

陈：写这个小说给我带来的满足太大了，因为我需要一个交待，我一来十年，再写不出来，我都要怀疑自己是不是找了个借口来这里住。在 2005 年台湾有一个季刊《思想》，创刊时叫我写一篇梳理对中国想法的文字，我写了一万多字论文还是不满意，觉得中国的情况太复杂写不出来。所有情况都扭在一起，你说它好的能写一万多字，说它坏的部分也能写一万多字，当时我就觉得中国这种状况要用另一种方式去书写。那时我用了一个比喻绛树两歌，唐朝歌女绛树能一张嘴唱两首歌，中国的情况大概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后来我找到小说这种文体，这是其他文体代替不了的，它能同时出现不同的意义和声音在里面。现在我真是长舒一口气。

文中图为陈冠中先生

ESSAY 随笔

年轻人为什么忧伤？

特约撰稿人 夏佑至（上海，xiayouzhi1997@gmail.com）

《网瘾战争》描述的远非一场战争，这部突然走红的视频充其量是一声叹息，连抱怨都谈不上。尽管“看你妹”在结尾部分的演说慷慨激昂，号召魔兽玩家们“请举起你的手”，但现实却远不如视频里想象的结局。没人做出任何姿态响应这段演说。倒是到处都可以听到不是魔兽玩家的人连呼“内牛满面”。

魔兽玩家的数量——据说有 500 万之多——和这个群体的忍耐程度似乎成正比。他们自称对这款游戏极为痴迷，依靠它忘记生活中一切不幸、不平和不堪回首的事情，但是在沦为行政部门之间利益纠纷的牺牲品时，却没有一点像样的抗议。公民抗议并不是多么稀罕的事情。厦门的人口总数不超过 300 万，番禺也差不多，对政府说“不”的人又只是总人口中极小的一部分，但抗议者用鲜明的观点和有力的行动，维护了自己的权益，堪称公民的典范。这说明行动能够改变现状，也只有行动，才能够改变现状。对比一下魔兽玩家的表现，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别。也许魔兽甚至所有的网络游戏对玩家来说并不像他们自己想象的那样重要，“看你妹”滔滔不绝的演说只是夸大其辞；要么就只能说明这个群体的行动力是极其低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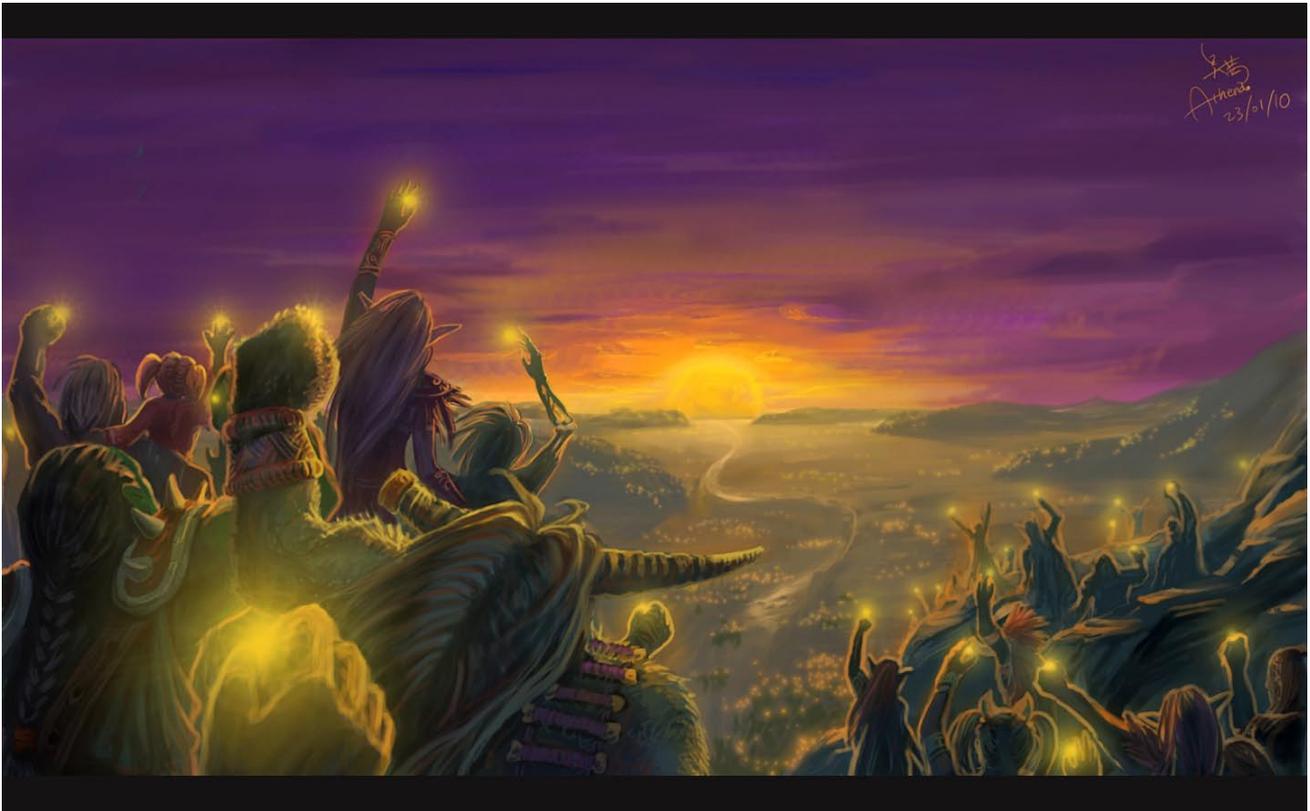
语言能够促成行动，也可以变成一种听上去漂亮、实际很空洞的东西。说到底，这是一种文字游戏。《网瘾战争》和《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没有什么分别，但胡戈是一个人，看他单枪匹马去挑逗陈凯歌，比号召 500 万玩家“举起你的手”的“看你妹”更像是一种安慰。

具备很多热刺激眼球的元素，却满足于带给受众一种廉价的安慰，言胜于行的《网瘾战争》不禁让我产生了一种联想。曾经有一本主题含糊的书，书名叫《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前不久，有一家周刊拿这个书名作了封面标题，报道中说，许许多

多互联网公司因为最近的政策收缩受到重创。这些公司的创始人无不聪明而勤奋，却被突如其来的打击搞得狼狈不堪，第一反应是调整自己的姿态，从斗志昂扬的创业者变成了那些忧伤的年轻人。

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时候：怀着忧伤的情绪，撅着嘴巴，满腹委屈地站在黑板前面，等待下课铃响。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现在就在被罚站。他们并非不了解什么是“政策收缩”，只是选择了忍受。这和聪明的魔兽玩家如出一辙。

所谓的政策收缩，提醒了一个事实：经过 30 年改革开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自由市场的目标还很遥远。但凡互联网经济发达的国家，推动行业发展的最大力量都是有创造力的头脑。政府的责任是为他们提供服务。但在中国，政府忙于决定



那些聪明的头脑的命运——如果忙不过来，就一刀切掉算了。政策收缩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局面已经把中国的互联网业推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这不是选择百度还是谷歌的问题，而是如何对待 21 世纪里最重要的产业，如何面对这个产业的发展规律。如果中国不想一个十年接一个十年地生产衬衫、皮鞋和玩具，如果结构调整、产业升级这些说法不是磨嘴皮子玩，就必须面对这个现实：周期性和不定期的政策收缩扼杀了互联网的生机。这个行业高度依赖创造性思维，依赖网络上的协作，所以信息的自由流通至关重要。将遥远的和陌生的人们联系起来，是互联网经济的基础，是未来服务业的核心。淘宝、QQ、豆瓣，甚至百度吧，都给中国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人们可以根据兴趣和爱好，找到心仪的商品，或者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并因此成就了一批成功的互联网公司。没有信息流通的自由，马云、马化腾、杨勃和李彦宏就不可能获得成功；如果中国不能找到一个稳定而自由的市场规则，他们的成功就不可持续、不可复制。

不幸的是，事情正朝最糟糕的局面发展。中国的互联网越来越成为一个恩赐的市场。我给你的才是你的，我不给你，你不能抢。掌权者把企业家、技术人才和互联网用户当作玩物，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还打着民族复兴的旗号。此情此景，看到那些忧伤的年轻人宅在家里，把才华浪费在《网瘾战争》上，真是一件可叹的事情。

图 1 为 NGA 画师 Ishnuala 为《网瘾战争》最后一幕创作的原画

ESSAY 随笔

为城市及自由正名

张秦峰 (上海, chrin@126.com)

英文 Planning 一词如果和经济搭配就是计划经济 (Planning Economy), 而与城市搭配就成了城市规划 (Urban Planning)。计划和规划这两个外来词汇出于同一词源绝非仅仅是巧合, 而意味着计划经济和城市规划有着内在的相似性。如果用计划经济来指代一整套意识形态的话, 那么它与城市规划之间的相似就更加昭然若揭。如果说米歇尔·福柯是用其“知识考古学”来揭示“知识即权力”的内在逻辑, 那么简·雅各布斯则从其在城市里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城市规划学是如何践行着这套逻辑的。



《哈佛商业评论》对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有这样一句经典评论: “只要一提到彼得·德鲁克的名字, 在企业的丛林中就会有无数双耳朵竖起来听”。在建筑和城市规划界, 提到简·雅各布斯的名字时, 也会得到同样的礼遇。然而, 对于雅各布斯的评价不应仅限于建筑和城市规划界, 其一生可以说都是为“为城市及自由正名”而战斗。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是简·雅各布斯的成名作, 自其 1961 年出版以来, 即成为城市研究和城市规划领域的经典, 同时也是

列为该领域学生的必读书目之一。雅各布斯认为, 传统的城市规划理论的错误最根本的在于仇视城市, 他们似乎忘记了中世纪那条俚语: “城市的空气带来自由的感觉”。他们对于城市里的“混乱和无序”难以容忍, 殊不知换另一种角度看这就是城市多样性的活力。于是带着对乡村和田园生活的怀旧式迷恋, 将城市“规划”的支离破碎。这种对城市的仇视思想来源可以追溯到卢梭、尼采以及浪漫主义对“高尚的野蛮人”的“颂扬”。因此《死与生》最终的目的不仅仅在于颠覆现有的城市规划理论, 更是对这种理论背后的“敌视城市”的观念进行挑战。

《城市经济》颠覆传统史学所认为社会是由游牧走向农业再走向城市的发展模式, 提出了城市文明先于农业文明, 并且城市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乡村 (比如从产业转移的角度看)。这一点后来启发了爱德华·索亚等人的灵感 (见《后大都市: 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 爱德华·索亚著, 李钧译,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年)。城市和农村孰先孰后并非只是“鸡和蛋”的争执, 这牵涉到我们对于城市与农村的关系以及对于城市的基本看法。视农村先于城市, 怀旧病就不知不觉地缠绕住我们, 雅各布斯所批评的城市规划理论就占据了城市建设的主角, 而让我们忽视掉了城市根本不同与乡村和城镇的地方, 继续把城市分割为一块块乡镇。在哲学领域, 康德完成了知识和对象的“哥白尼式革命”, 雅各布斯则对城市和乡村实施了一次“哥白尼倒转”。

《城市与国家财富: 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则向经济学发起挑战。批判了坎梯隆、亚当·斯密以来把国家视为一个经济实体的“愚蠢”观念, 国家在政治和军事上可以是一个实体, 但在经济世界里, 根本没有一个国家这个层面上的实体存在, 它只是其他各种不同经济实体混合而成的虚拟体。把民族国家当作经济实体使用关税和补贴等政策以及民族国家统一的货币使得政治区域内不均衡城市得到不同的后果。这种城市 and 国家的冲突本身可能会使本来发达的城市走向衰落, 整个国家经济也会出现下滑, 以致走不出经济低迷的困境。只有抛弃掉经济学这种教条, 把经济的实体中最重要的也是最独特的“城市”拿出来研究, 才能真正理解和把握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逻辑。“城市是经济发展之母, 不是因为城里人更聪明, 而是因为密集的环境。城里有需求的聚集, 还有更多刺激, 使人们以各种方式提出以前不能提出的问题。这是经济发展的本质, 如没有她, 我们都会贫穷。” (见《洛杉矶时报》在 1997 年多伦多举行的雅各布斯专题讨论会上对她的访谈。转引自爱德华·索亚《后大都市》, 第 19 页)

了解了雅各布斯为“城市正名”所做的努力, 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计划和规划”的相似性, 以及雅各布斯被人所

忽视的“为自由正名”上来。

从城市形态的演变上来看，城市可分为自发性（或有机的）和人造的两种，当然自发性的城市也并非没有经过刻意设计，刻意设计的城市也会变成有机城市（见《城市的形成：历史进程中的城市模式和城市意义》，斯皮罗·科斯托夫著，单皓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如果把这种划分应用到城市衰落与兴盛，即城市的“死与生”上，我们会发现，雅各布斯其实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以及其后的著作里所强调的正是一种自发的、有机生长的城市，而现代城市规划者们则希望将城市人为设计成一种符合某种理想的地方（无论这种理想是花园式的还是辐射式的）。

同样，雅各布斯的城市也需要规划，规划师的城市里也有自发生长。但这样划分的意义绝非是要证实一下“辩证法”的效用，而是要表明不同侧重的强调意味着不同的城市理念。雅各布斯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把城市看作是一个“有序复杂有机体”，（见《城市经济》）因此对待城市决不能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下某一变量和另一变量的函数关系式，或者用概率和统计学分析城市的平均值。而应当向生命科学那样理解城市，重视过程如城市贫民区的非贫民区化过程，由点到面正视当地街区的需求，以及寻找“非平均”的线索等。

自发性城市说到底就是“城市自治权”的问题。《死与生》中对城市居民交互式交往而带来城市活力的欣赏、对贫民区自发改变居住区环境的赞扬、对社区反抗规划“暴政”的着墨强调，都在于把“城市自治”权力从规划者的手中争夺回来。而相反，规划论者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计划主义”，他们认为城市自身无力解决混乱、无序还有拥堵，城市居民成为他们手中的棋子，在其计划（Planning）的平面图（Plan）上任意摆来摆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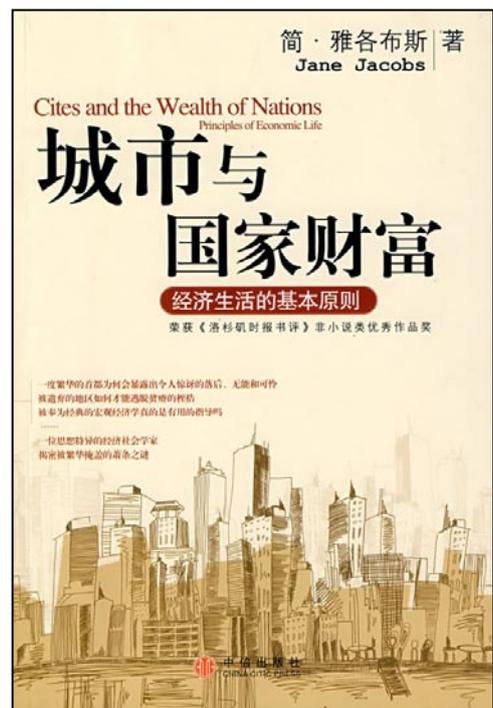
当然并不是说城市完全可以自发成长为一个有序的、良性的环境，正像原教旨的自由市场经济必然会带来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罪恶”一样，城市也需要规划或计划。良好的城市规划者应当注重发现“城市多样化条件”中少了那些：中央商务区缺乏首要用途的混合、某某大道人迹稀少、新建街区推倒了所有老建筑、某地区人口过于分散等等。在多样性缺乏的地方为城市活力注入强心剂。

政府、金融机构的作用不是按照规划家们的思路推倒一个个贫民区把他们赶往另一处，而应当为城市自发性生长提供支持，这种政策和资金支持对于城市尤为关键。任何提升街区价值的努力如果缺乏他们的支持，让原本愿意留下来再造社区的人都会丧失希望的离开。雅各布斯在其生前的最后一本著作《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受到疾病的困扰，雅各布斯她生前决定写作的另外两本书 *A Short Biography of the Human Race* 和 *Uncovering the Economy* 未能完成。见2006年雅各布斯逝世时 Gert-Jan Hospers 所写的讣告 *Jane Jacobs: her life and work*, 载于 *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 Vol. 14, No. 6, July 2006*）里把“家庭与社区价值”作为支撑文化的五个支柱之一（其他四个为：高等教育精神、批判性的科学观、政府效能、自律与自审）。家庭与社区是承载文化的实体，是人之价值的依附。当政府和开发商的推土机铲去了城市的旧街时，也铲去了我们的记忆。文化的衰败就在于集体性失忆，掩埋在建筑废墟里的社区精神不久后也会被我们所遗忘，最终当我们已经忘记了遗失了什么时，下一个“黑暗时代”业已来临。

或许雅各布斯这位坊间主妇的愤怒叫喊与温情絮语，真的只是非常幸运地成为了压倒政府主导大规模规划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许是美国经济在那个年代开始走向萧条，但毋庸置疑的是，“计划主义”这种集权式发展思路与美国自由精神从来都格格不入，正像美国不会产生社会主义一样。

公民自治、城市自治是美国民主与自由的基石，也是美国革命的目的所在。“如果革命的终极目的是自由，是自由可以呈现的一个公共空间的构建，是构建自由，那么，街区的初级共和国，作为人人皆得以自由的唯一实物场所，实际上就是大共和国的目的所在。”（《论革命》，汉娜·阿伦特著，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238页）这段引文是阿伦特对杰弗逊关于街区体系观点的评价，“无论杰弗逊知道与否，街区体系的基本假设就是：不享有公共幸福就不能说是幸福的；不体验公共自由就不能说是自由的；不参与和分享公共权力就不能说是幸福或自由的。”我一直觉得雅各布斯和阿伦特在很多方面有着共性，或许她们并不认识对方，而且专注的领域也差别很大，但至少在公民自治和城市自治的观点上是相通的。

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城市规划系学生们一边继续按雅各布斯所批评的“陈旧”知识规划着城市、一边



却把《死与生》列为必读书单的的奇特景致。在没有公民自治权和城市自治权的支撑下，城市规划只不过是计划（Planning）+平面图（Plan）而已。

图1为简·雅各布斯

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纪念版）》，金衡山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

简·雅各布斯：《城市经济》，项婷婷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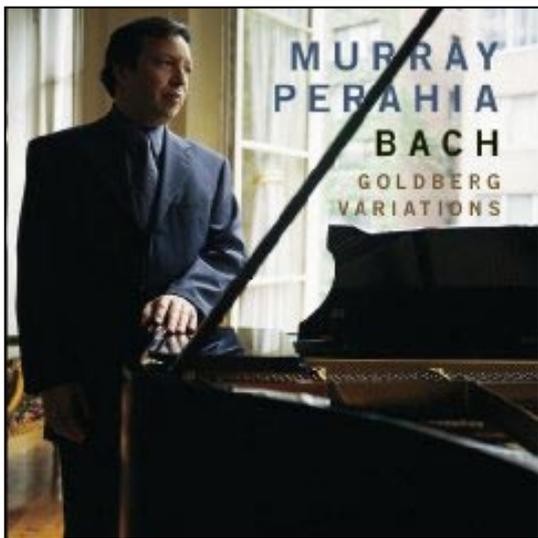
简·雅各布斯：《城市与国家财富：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金洁译，中信出版社，2008年；

简·雅各布斯：《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姚大钧译，中信出版社，2007年。

MUSIC 音乐

朱小玫是谁

特约撰稿人 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huiyuanma@gmail.com）



几年前就知道这位旅法中国钢琴家，因为朋友推荐。我并不太相信她的好，觉得也许是因为录巴赫的中国人太少，才值得我们支持一下，至于录音本身，怎么可能跟普莱亚那样的大师比呢？朋友还说了这样的意思：对比后来中国的年轻一代钢琴家，那些国际比赛的获奖者们，条件比朱小玫好得多，音乐天赋也可能更高，但有多少人肯在无闻的情况下坚持这么多年，直到录出来硬碰硬的巴赫名作？

后来我听说了她的事情：出生在上海的一个艺术家家庭，8岁时就在北京电台中演奏钢琴，后进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1979年，小提琴家斯特恩的访华，那个和著名的《从毛到莫扎特》电影有关的访问，给了她去美国的机会。在波士顿一所音乐学院拿到钢琴演奏硕士后，朱小玫于1985年赴巴黎发展。

这中间据说还有无数传奇——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其实平平淡淡，甚至比较幸运，但对钢琴家来说，是在灾难和毁灭中存活

下来的奇迹。比如文革中期间学习中断，送到内蒙古插队，传奇就从这里开始了。在所有音乐家都不能演奏西洋音乐时，朱小玫竟然弄了架钢琴偷偷藏在农民家里；来美国后生活困窘，住在波士顿交响乐团首席女长笛手的家里，以帮助照顾房子来换取食宿。长笛手对她的规定是可以用她家里的钢琴练琴，但条件是每当听到她的车库门响，练琴则立即停止。差不多快两年后长笛手偶然中看到朱小玫的成绩单，就问朱能不能弹些曲子给她听，于是就弹了，老太太大吃一惊，惊叹家里住着这么一个钢琴家；而除了这些外部生活的艰难之外，朱小玫还有自身的缺陷，就是手小。

我一般不爱对音乐家的人生如此平铺直叙，再说这些老掉牙的话题可能显得煽情而惹人厌烦，但熟悉一般钢琴家生存状态的人都难免有这样的联想：比如，钢琴生涯本身是多么脆弱，练习和演出都经不起中断，即使拥有最好的物质和学习条件，都不敢保证一定会成功，而朱小玫一个经历文革、钢琴学习遭受毁灭性打击的人，怎么进入竞争残酷的西方演奏界的？再比如，说起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多数听众包括我，更熟悉的是古尔德的生活，他躲在“子宫般宁静的录音室”里，把自己关在孤寂之中（其实从来不缺少关注和支持），让我们相信只有那样的环境，才能录出境界超等的巴赫。而生为中国人的朱小玫，哪有如此奢侈的条件？她面对的是长年的忽视和真正的孤独，连机会都没有。

当然，评价录音要从录音本身出发。再动人的人生，其艺术成品还是要面对苛刻的艺术评判。我买了两张她的CD，也在网上看了她现场演奏巴赫哥德堡变奏曲的录像，本来是怀了苛求之念，结果却再次“惊叹”：修炼到如此境界，背后该有多少付出？最初打动我的是这样一个瞬间：咏叹调之后，呼啸着的第一变奏几乎吓人一跳。古尔德也吓人一跳，甚至更彪悍，类似恶作剧；普莱亚更注意小节之间的“搭接”；但朱小玫的处理让我印象最深：从第九小节后的琶音中，她突然把音量压低，“水花”小而柔和，轻盈地飞奔。似乎没有人这样处理。一时好奇，我在钢琴上一试，不由十分赞叹，这样做实在很难，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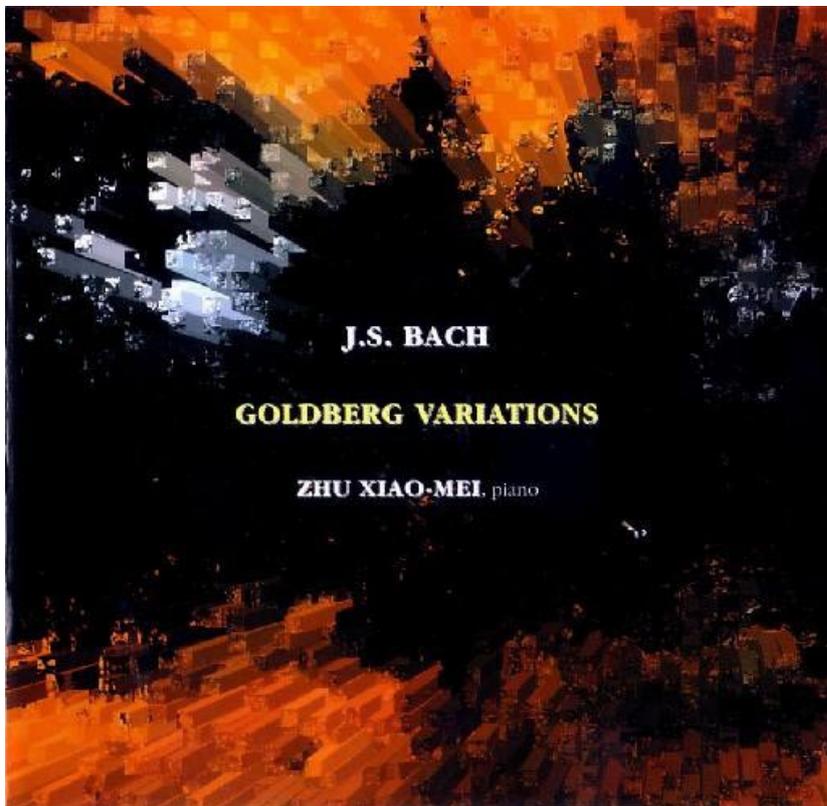
至少在我听来，这种奇异的对比是有效的，因为体现了层次感。我这个初级的听感可能肤浅，也不严密，但促使我认真地看谱，发现她的匠心处处都在，处处迎接技术的高难挑战。在我看来，这种“炫技”是高级实力派做法，期待的正是认真的耳朵。其实，录巴赫本身就是一件成本很高的壮举，因为听众不会太多，你面对的都是专家的苛求。

在网上见过她的现场演出录像片段，原来是个看上去风尘仆仆的中年妇女，既没有外表也没有轶事的优势，她的身上只剩音乐。查查资料，她录了至少两次哥德堡变奏曲（2000/Mandala, 2007/Mirare），都和小公司合作，所以卖得很贵，知道的人也不多。除此之外，还有和法国钢琴家 Alexandre Tharaud（另一个名低于实的高人）合作的舒伯特四手联弹作品集（Divertissement à la Hongroise D818; Variations in A flat major on a original theme, D813; 2003/Harmonia Mundi）我买来听了，觉得是同类作品中我能想象出的最好录音，远胜于皮雷丝和塞梅特录的四手联弹。舒伯特的这些作品，本来是他的钢琴作品中比较逊色的，是朱小玫让我再次找到那个每根纤维都沉浸在幻想中的舒伯特，即便在这样简单的“娱乐性”音乐之中。

其实我在叙述音乐家的人生故事的时候，总有几分警惕。我认为音乐应该以声音打动听众，要让人盖住“朱小玫”这三个字后，也能说服那些只听说过古尔德、希夫和李赫特的人，听出她的好处。我应该把她的故事留给自己励志来用。但我心里纠缠着一个念头，让我还是简单地讲了讲她的故事：我们时代的标签是“商业化”，连古典音乐

的名家也是朗朗那样的。但朱小玫用她的生活告诉我们，不是所有人都是时代的孩子，你永远不知道一个浮华社会里埋藏着多么古典的精神。我要记录和讲述的，就是这一点。

图 1 为普莱亚演绎巴赫，图 2 为朱小玫演绎巴赫



TRANSLATION 译介

科学能否解释宗教？

作者：H·艾伦·奥尔

译者：朱芳艺（美国·孟菲斯，fangyizhu@gmail.com）

（一）

罗伯特·莱特并不惮于去思考一些宏大命题。莱特经常为一些杂志供稿，包括《石板》和《时代周刊》，并主管 bloggingheads.tv 这个网站；他曾写过几本智力上颇具野心的书。比如，在 1997 年的《道德动物》中，他写了进化心理学这门年轻且富有争议的学科。而在 2001 年的《非零》中，他来了个人类历史的匆忙之旅，并宣称数学领域的博弈理论展示了历史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人际合作中产生的共同利益驱动的。在他最新的一本书中，莱特拎起了一个更大的主题：宗教。在《上帝的进化》中，他纵览了宗教史，更重要的是，还给出了一个关于历史为何如此展开的新理论。

根据莱特的理论, 尽管宗教看上去好象超越现实世界——属于一个启示和灵性的世界——但它的历史却像其它很多事物一样, 为平凡的“地上的俗务”所驱使。

也就是说, 宗教随时间的改变主要是由于它对现实世界中环境的变化作出反应: 经济、政治和战争。然后莱特提出并强调了宗教的唯物主义解释。他进一步强调说, 宗教对世界的反应方式是有意义的。就像生物一样, 宗教作出适应世界的反应。

莱特更郑重其事地论证说, 宗教对现实的反应基本可以用博弈理论和进化心理学(他前一本书的主题)来解释。他宣称, 人类思想的细致之处符合达尔文自然选择论, 使我们可以认识和利用某些社会情况。其中最重要的——亦即莱特理论的中心要点——是博弈理论家称为“非零和”的相互作用。不像在“零和”博弈中一个参与者的所得



等于另一参与者的所失, 有些博弈中两个参与者都可获胜, 因此叫做“非零和”。典型例子就是经济贸易。在自由市场中, 当双方都能获利的时候贸易行为才会发生(否则他们就不会参加了)。

在整个历史过程中, 技术在提高, 特别是交通一直在改善, 不同文化发生碰撞, 人类便遇到越来越多的这种非零和的机会。莱特说, 宗教对此作出了理性反应。比如, 当宽容有利于顺畅经济或政治交流并形成潜在双赢局面的时候, 宗教信条就会对其他信仰变得越来越宽容: 当你想跟对方做生意或者结成军事联盟的时候, 尊重对方的神灵便是明智的。(莱特提出, 这些反应往往是无意识中作出的, 不是讽刺的。)非零和交流的数量渐增, 一个结果就是: 随着时间流逝, “道德的范围”也扩大了。原始人倾向于只将他的氏族或部落的人当人类看待, 应该道德地对待, 人们之间通过合作交流所形成的联系促使他们将道德的范围从本部落扩大至种族, 再至国家, 最后到所有人类。

在莱特的宗教分析中, 浮现着一些主题, 令人想起生命进化的特征。莱特说, 首先, 宗教的历史有着一个可以辨认的方向。正如生物在过去 40 亿年中普遍地变得更复杂, 人对于上帝的看法也基本上变得越来越抽象——而且对于莱特来说更重要的是——过去几千年里, 在道德上变得越来越美好。而且, 宗教的进化就像是物种的进化一样, 一般是渐进式的: “你不会看到新宗教从无到有,” 大概因为宗教反映着先前的社会状况。

然而上帝的进化并非只对过去有意义。莱特还强调, 认识“非零和”社会力量的重要性可能会帮助我们缓解一些现代的政治压力, 包括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之间的紧张状态, 它们其实完全可以从对方那里获益。

若是将莱特的宗教史观看作是唯物主义, 似乎应该意味着他对宗教的崇高幻象不会感到太舒服, 比如, 物质宇宙也许实际上是基于一些神圣之物这样的观点。但实际不是这么回事。莱特对宗教、以及它的至少某些重要主张持有同情态度。他的目的确实在于, 不但对人类对上帝的看法作出解释, 至少也可能为上帝本身提供理由。

莱特的书有几个优点。也许最显著的是其文笔。尽管书的篇幅浩大, 但感觉并不明显。莱特是一个技巧丰富的作者, 他知道如何将故事展开。他的讨论也显得令人惊讶的博学。《上帝的进化》到处都是注释, 而其中引用的文献一直令人满意: 大量的学术研究而很少有通俗作品。目前关于宗教的讨论, 特别是宗教与科学交汇的问题上, 有着轻浮和仓促的风气, 而莱特的仔细研究是值得称赞的。他的与众不同的冷静语气也值得赞赏。就这样, 他带我们作了一次非常有趣的(而且不带夸张激情的)西方宗教之旅。

但是, 莱特的这本书不能仅仅以它是否充分展示宗教历史来评价, 这甚至不能作为一项主要考量。它必须以他的新宗教理论是否成功来衡量。而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 《上帝的进化》在这一点上并非如此令人满意。

(二)

莱特的书的很大一部分是在描述亚伯拉罕信仰体系，即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但他的叙述实际上是从史前时代的萨满教开始的。利用当代狩猎-采集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以及米尔西·伊利亚德及同人的原始宗教经典分析，莱特提醒我们，萨满的世界是由诸多神灵驱动的，他们居于自然力中并决定个人与部落命运。宗教与道德原本没多大关系，而是与战争的进行和部落内的政治相关。^[1]然而，随着农业的兴起，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的和睦越来越有价值。莱特说，宗教对这些情况的变化作出了反应从而变得讲道德了：它开始有了管辖群众的职能。

后来，原始国家变得越来越有组织，不同的文化也互相接触。尽管这些接触的哲学上的后果原本可能是灾难性的——各个群体崇拜的神灵之间有潜在的竞争，莱特主张——可是非零和的社会力量占了优势。国家通过贸易和军事联盟，从其他国家那里获益良多。所以，宗教再次作出了明智的反应：一个群体往往将其他群体的神灵一起列入崇拜之列。

然而，对多神教的描述是有限的。莱特对一神教在犹太人中间崛起的描述是他书中最杰出的部分。这一过程非比寻常的复杂。可以想见，莱特强调耶和华的进化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形势作出了反应：这包括犹太人与迦南人（拜偶像者）的关系，无数军事上的冒险与失败，背井离乡，以及大以色列北方和南方的不同政治命运。并且，一神教的进化，“就像历史上很多其它宗教的进化一样”，是渐进式的。这一过程确实如此漫长，以致多神教的蛛丝马迹仍残留在希伯来圣经中，比如《出埃及记》，特别是《诗篇》（“主阿，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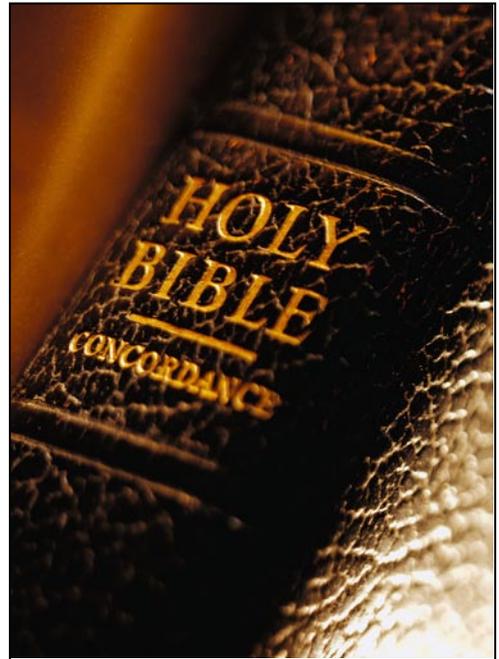
希伯来圣经也展现了后来耶和华中由一位雷霆一般的、几乎是有形的存在变成了更抽象和超验的神灵，变成了“宁静的低语”。莱特还花了两章的篇幅讲述公元一世纪的犹太哲学家亚历山德里亚的斐洛。斐洛建立了一种融合的神学，试图将希伯来传统与希腊哲学，信仰与理性调和在一起。这样的调和需要避开对经文的字面理解而仅仅信奉其中的寓意，斐洛非常愉快地这样做了。在斐洛的神学中，逻格斯——理性、秩序、或者道——在上帝的思想里形成，然后宣于物质世界。逻格斯的展现将方向性赋予历史，在诸多主题中，方向性这一主题在莱特这里尤其明显。

到了基督教这儿，莱特再次强调这一新宗教的达尔文的渐进式进化。福音书中最早的真经，《马可福音》，所描述的耶稣看上去更像是典型启示录式的先知，而非道成肉身：耶稣不怎么宣称他的神圣性，而鼓吹上帝之国即将来临，并经常小心地施行奇迹。莱特也强调，基督教兄弟博爱的教义可能并非出自耶稣，而是后来才产生的，可能是由使徒保罗创造的。可以想见，莱特主张，这一教义的发展正像其它教义一样，可以看作是对日常生活状态的响应。他的确提出，这位坚持不懈到处传道的保罗，倡导了兄弟博爱——“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在他拜访过并匆匆离开许多争吵不休的教堂里，他以此来倡导和睦。换句话说，保罗要传达的消息是一个管理上的策略，经营规划的一部分，使得他能够将基督教输出到大部分罗马帝国。^[2]

最后，莱特简要却巧妙地纵览了伊斯兰教的进化。他主张伊斯兰教对当地环境也呈现了宗教的适应性反应。（伊斯兰教的较晚出现——穆罕默德死于公元632年——使得这一宗教发展的历史框架显示出相当清晰的图景。）当穆罕默德住在麦加时，他像他之前的很多先知一样，缺少政治力量，为富人所憎恨，为群众所嘲笑。莱特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博弈理论能够向这一宗教提供的最佳策略显然是宽容与和解。而莱特又指出，穆罕默德在麦加时的那一部分古兰经往往是调和的。穆罕默德确实主动接触犹太人和基督徒，并向他们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宽容（“你们有你们的宗教，我也有我的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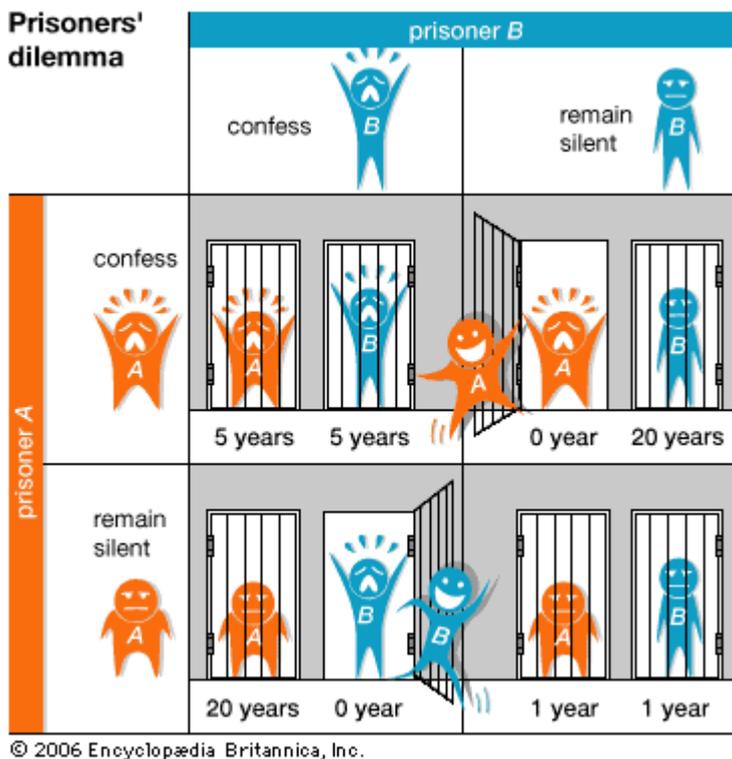
但当穆罕默德移居麦地那，现实环境迅速并且根本地改变了。这时，穆罕默德众多的追随者已经成长为强大得惊人的政治与军事力量。既然环境已经改变，伊斯兰就没那么多宽容的实际理由了，莱特说，古兰经便开始使用一种不那么调和的调子。他坚称，所有这些都不应令我们惊讶。亦非没有先例。在艰难和政治动荡的时代，希伯来圣经中的《第二以赛亚》和《新约》中的《启示录》也对其他信仰不那么宽容。

尽管如此，西方宗教发展的总体趋势特征却已足够清楚：它变得越来越宽容，并鼓励道德范围的扩大。挤在萨满巫师身边的狩猎-采集者可能会怀疑他们本部落之外的人道主义，而在现代，聚集在犹太教会堂、教会、清真寺的朝拜者们则不会感到怀疑。莱特强调说，宗教也许是不完美的，但是它曾带我们在道德之路上走过相当长的路程。



(三)

尽管莱特的亚伯拉罕系列宗教史的描述总是那样迷人，但他在试图使用他的新理论来解释这一历史的时候，很不幸，有时却不那么有说服力。部分问题在于莱特理论显然不完备。要想否认当地环境帮助塑造宗教，包括其道德信条，这是荒谬的。但若想否认还有别的原因，也同样荒谬。想想废奴运动这场伟大的道德事件吧。很难断言这会是由双赢机制所驱动的。将道德范围扩大到黑奴有什么样的物质上的显著好处吗？这一问题警告我们，这其实与双赢毫不相干，因为其真正原因是如此明显。



大部分废奴主义者为扩大道德范围而奋斗，因为他们认为基督教教义驱使他们这样做，无论他们是否能够得到任何好处。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称之为伟大道德行动的，其行动者可能在物质上反有所失。在一个双赢局面中，是否促进仁慈或宽容并不重要。宗教态度的部分特征在于，在一个你可能会物质上有所失的局势里，你仍然这样做，或者至少这样去希望。的确，《上帝的进化》更注重道德信条的改变，而非道德行为本身，但是，莱特逃避了一些重要的方面，他基本忽略了有输有赢的情况中的道德问题。^[3]

考虑到这个，在接近书的末尾时莱特的唯物主义理论举步维艰，也并不令人奇怪了。在谈了四百页关于非零和主义在宗教宽容的进化中起到的关键作用之后，莱特突然宣布，“可惜，仅仅存在非零和是不够的。”这时他告诉我们，还有两个东西是必要的。其一，人们必须看到他们从事的是非零和的事务。单看这一条，有些怪异。对于贸易而言，这显然不真确。正如亚当·斯密的著名论断，

双赢是在每个个体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情况下自然出现的。（没有人会因为要去帮助日本汽车制造商而去买他们的车。）

莱特提出的第二个要求则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

取决于实际情况，对非零和的机会采取明智行动可能要求不仅仅是看到非零和。有时，这也需要某种更深刻的“视点”。也可能不仅仅需要对人际交往的利益方面真实理解，而且需要某种对道德真实的理解。

这可就令人惊异了。先是告诉我们，“对人际交往的实利方面的理解”基本就可以解释宗教观念的盈亏。现在又告诉我们还需要些别的东西，需要比实利要更深层的视点。

当莱特试图解释这个更深的视点时，事情就变得含糊起来了。他说，关键在于一种叫作道德想像的东西，一种将自己置身于他人境况里的心理能力。他向我们担保说，这一能力已由“自然选择‘设计’好，以便帮助我们去利用非零和的机会，还帮助我们在有可能的情况下巩固有益的和平关系。”所以论点就在于，一个进化心理学的概念——道德想像——让我们看到非零和的博弈局面。至于结果，往往是经济或政治的合作以及道德范围的扩展。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莱特揭示道，问题在于道德想像有时会走火，而事实上在麻烦重重的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中正在走火。这次走火的原因，对进化心理学文献稍有涉猎的人就会感到熟悉：“我们用来应付博弈理论格局的心理机制原本是为狩猎-采集社会环境而设计的，而不是为现代社会设计的。”如果这点是正确的话，你可能会感到奇怪，为何经济贸易在现代社会却进行得如此顺利，不过让我们先把这个放到一边。因为，还有个让你更惊讶的事呢。

莱特主张在道德上若需要走得更远——而且特别是在解决伊斯兰与西方紧张状态的问题上——道德想像就需要一些“劝诱”了。事实上，道德想像需要扩展到“一个纯粹教唆的境地”。而幸运的是，有一种势力可以完成这种劝诱——宗教。莱特也确实宣称过，宗教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它时常插手道德想像并扩展之。

这也许是对的——我猜想它应该是的——但是这个跟莱特的文章无关。实际上还与此恰恰相反。莱特的因果关系原本是，道德想像的心理能力（由自然选择形成）让我们认识到双赢的机会（博弈理论），这样，反过来导致道德范围的扩大（通过宗教）。但是现在，这一因果关系倒转了：宗教必须改变道德想像。如果我对莱特的理解正确的话（他倒数第二章实在无比费解），很难看出这一倒转如何部分造成了宗教的唯物方面的理由。这显然是相当唯心主义的理由：如果博弈理论和进化心理学能够造就更宽容的宗教，那当然很不错，不过现在，它们干得并不好，那我们就让宗教来做这一切吧。我并不是在说这削弱了莱特的书，但这是他文章里的一个不小的例外。如果现在我们需要莱特的思想来解决问题——这也是《上帝的进化》的目的之一——可解决方法却与他的理论没太大关系，这无论如何是件很令人窘迫的事。

《上帝的进化》的缺点不止在于其论点，而且在于莱特用来构造其理论的思维方法。尽管他的核心主张——人们更倾向于去做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事——这个相当老套，它却包裹在博弈理论和进化心理学的科学语言的外衣里。但是，这样的语言却大多是很难严肃看待的。比如，人们拥有与道德想像对应的心理能力，这一点的确科学证据在哪里？这一能力是由自然选择形成，或者我们从非洲草原走出来之后就停止进化，这个的证据在哪里？这一心理能力正在走火，证据在哪里？以上所有这些，我们只能说证据不存在或者极度可疑。莱特的关于人类思想进化的主张也许会被证明是对的，或至少部分正确，但这与真正的科学无关。

莱特对博弈理论和进化心理学的依赖之所以令人忧虑，还有另一个原因。这些理论，特别是放在一起的时候，太八面玲珑，什么都可以解释得通。一个后果就是当莱特对希伯来圣经、新约或者古兰经的解读有时堕落到一些小聪明的企图，试图用对当地环境的反应来把每个段落都解释一通。看看他如何解释保罗为何富有伟大的兄弟博爱吧。保罗不在任何特定教堂常驻，他需要在这许多难以管束的教会内部以及互相之间倡导和睦，于是他的传道书就赞美兄弟般的爱（莱特称之为“遥控式”）。但是莱特的假设并不正确。当保罗显然为组织问题头疼的时候，因为他总是在安提阿、哥林多、加拉太、帖撒罗尼迦之类的地方跟异教徒打交道，就认为他鼓吹兄弟博爱的目的在于他总是在奔波，这是在想当然。更有说服力的说法自然是保罗怀有兄弟博爱因此无休止地奔波，而不是因为他无休止奔波所以才鼓吹兄弟博爱。

（四）

最后，莱特看来很自信他的分析也许可以告诉我们关于上帝的信息，或者至少关于“更高目的”在自然界存在的可能性。这里，他似乎是由于所谓“新无神论者”（他提到了丹尼尔·丹奈特、理查德·道金斯和斯蒂芬·魏恩伯格）做过了头而感到忧虑。因为我也有一些这样的忧虑，我原以为自己会同情他的论断的。但我到头来却发现他的论断大多不足信。

莱特所举的案例从他在历史中所了解的道德方向说起。从整体趋势看，我们变得越来越道德；而我们崇拜的神也越来越吸引人。莱特希望从中能够提出一个巨大的寓意来：

如果历史自然而然地将人类意识带入道德启蒙，尽管进行得缓慢而且断断续续，就一定会有证据指向它。至少，应该有更多的证据指向它而非它的反面……就“上帝”成长这个意义上来说，有一些更高目的的证据——也许不是大量证据，但有一些。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上帝”真的成长，而且始终不变地持续成长，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开始考虑将引号去掉了？

以及：

在当今思想的巨大分歧当中——有些人，包括亚伯拉罕信仰体系中的人，他们看到一个更高目的，一个先验的意义之源；和另外一些人，如斯蒂芬·魏恩伯格，他们没有看到——很明显，显明存在的道德秩序无疑让我们选择其中一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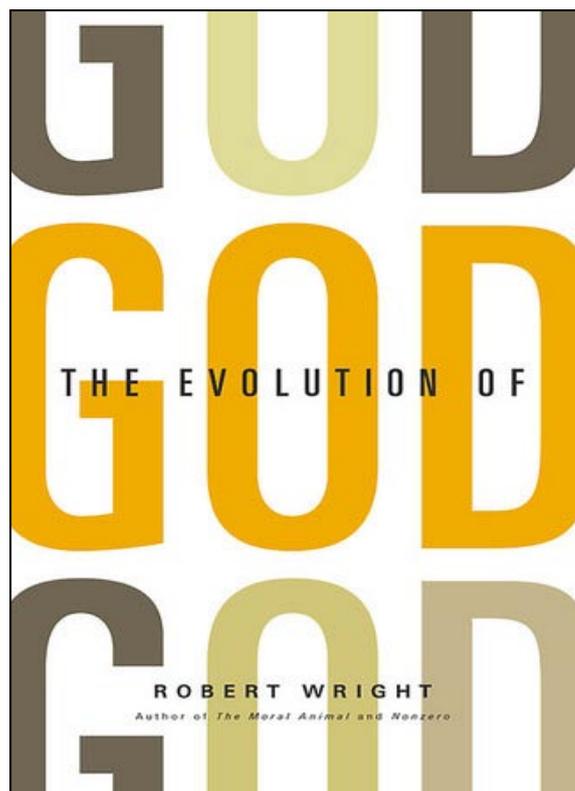
尽管莱特只是尝试性地提出这些观点，却很难看出它们怎么会有效。他提出了道德进步的唯物主义理由。如果这一理由成立（他认为是成立的），它无论对于反对还是支持超验之物都不能提供证据。实际上莱特使用“超验”一词似乎没什么道理。来一个与道德无关或关系不大的类比吧。经济学家主张非零和的贸易博弈——即双方都能从中获利的交换——使得历史出现这样的趋势：贸易的扩大和财富的增长。但是没有人试着去下结论说这个方向揭示了一个更高的意志。不可见的手是一个比喻，并不真是神的手。相反地，如果莱特的道德进步的唯物主义理由失败了，这也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反对任何先验的存在；也可能是上帝驱使了道德的进步，也可能另外一个唯物的原因可以解释这些事实。

同样地，莱特不时提出地球上整个生物和文化的进化史——从单细胞到多细胞菌落，到能够进行道德思考并经营高科技的人类——可能暗示了更高目的的存在。然而，再说一遍，如果唯物主义原因已经足以解释这一历史了——而在生物那一部分，达尔文主义已经做到了——那么这一历史既不能证实也不能反驳先验之物的存在。

奇怪的是，我猜莱特可能会同意以上的一些话。他暗示，他想辨认一个更高目的的努力，更多的是一个直觉或猜想，而非真的论证。如果这样的话，我就没什么特别的意见了。但是，既然在用科学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想法，莱特的冒险之处在于用他的思考来描绘某些不是思考的东西。

尽管有这些保留，我的确同意莱特在这些讨论的过程中所说的另一要点。看上去很清楚，人类对神圣的理解基本随着时间而越来越复杂和抽象。斐洛的逻辑斯与原始人所恐惧的近乎魔鬼的神灵，相差已不可道里计。而正如莱特强调的那样，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一趋势会持续下去。当然，在现在和将来，没几个热爱思考的人会将西方经书中诗化的神圣召唤按字面理解了。

充满于这些诗中的象征符号，也许有，也许没有指向任何现实事物，但是这些它们试图指向的观念肯定要比这些符号本身要意义重大得多。莱特提醒我们这一点，他是对的，只是说得拐弯抹角。他也正确地注意到了文化之间的和平共处，还有，甚至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生存都也许会取决于我们对这一点的接受有多广泛。毕竟，大概没有几个人想去杀人或被杀，仅仅为了符号象征之间的差异，或至少诸如此类的东西。这些很重要，值得一提。但是我却看不到为何要通过博弈理论和进化心理学去达到这一目的。



原注[1]莱特还帮助那些新纪元（New Age）的胡说八道的读者消除对萨满的错误认识。在有组织的宗教出现之前，宗教以一种未腐化的形式存在，这是一个浪漫主义的幻觉。萨满们经常是毫不客气先满足自己的，他们还玩一些明显的政治把戏。详见莱特的“萨满们有更多的性机会吗？”《石板》（Slate），2009年7月29日

原注[2]莱特几乎已经忽视了教会后来的进化了。比如，他基本没有提到教父们，特别是圣奥古斯丁所倡导的基督教希腊化。（柏拉图派和新柏拉图派对于亚伯拉罕信仰系统的影响当然不限于斐洛。）后果之一就是更加神秘主义的基督教传统——比如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基本上被忽视了。例子参见安德鲁·劳斯的《基督教神秘主义传统的起源：从柏拉图到丹尼斯》（牛津大学出版社，1981），也对斐洛进行了灵敏的解读。

原注[3] 在某个时刻，莱特的确同意他的理论不能解释一切宗教历史上的兴衰，但他似乎认为这些例外都是暂时的或者不重要的。很难理解这一判断的基础在哪里。

***The Evolution of God*, by Robert Wright, Little, Brown, 567 pp., \$25.99**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23537>

图1为罗伯特·莱特

TRANSLATION 译介

哲学还能产生公共知识分子吗？

作者：约翰·拉赫兹（John Lachs）

译者：吴万伟（武汉，wuwanweione@yahoo.com.cn）



在公共表演中的重复性使得他很难赢得人们的信赖。

为什么哲学退回到象牙塔，抛弃了作为信念和实践的批评家的传统角色呢？为什么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甚至物理学家都积极在公共生活中发挥更多作用的时候，哲学家却反其道而行之？

怀疑和自我确认

我们可以用当今哲学核心的某种模糊性来解释。该领域受到静悄悄的恐惧的感染，它已经无法为社会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来证明其存在的价值。它那超越逻辑普遍规则的方法不是寻求真理的可靠指南，因此并没有为探索提供确定无疑的结果。尽管哲学家热衷于概念游戏的刺激，但在其心灵深处，他们许多人怀疑自己的所作所为中有一些不严肃的成分。毕竟，在做了和说了一切之后，世界并不会因此受多大影响，或者根本就没有任何影响。

正如常见的情况，不安全感往往产生对出类拔萃的过分追求。我们有些同行挑衅性地宣称哲学是科学之母，心理学家及其他都存在概念混淆问题，而我们的研究领域可以在不用彻底考察其局限性和基础的情况下取得真正的进展。这些思想深刻者的傲慢可以从他们相互交换的理解的眼神中看出来，尤其是在其他学科的同行提出自己理论的时候。这背后隐藏的信息似乎是只有哲学家才明白他们在谈些什么。

在公共事务上发挥作用时，哲学家被这种模糊性拉向两个相反的方向，这两个不可调和的信念产生了同样的后果。不安全感造成了哲学家相信，他们对当今时代的迫切问题无话可说，而对哲学的形而上学美德的承诺则导致他们认为，与无知的大众争论是徒劳无益的。因此，要么哲学家无话可说，要么他们提出的东西晦涩难解，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明白。这两种观念都为我们逃避寻找社会灵魂的斗争，满足于大学里的舒适生活的方便的借口。

在这里，我并不是暗示哲学家逃避他们作为公民的责任。他们照章纳税、投票、尽力遵守法律。有些人参与争取社会正义的行动，有些人选择成为素食主义者。但是，这些都是个人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和明确的哲学推理没有关系。他们甚至悍然违背独到的眼光和敏锐的批评视角，正如在 1960 年代，著名的认识论学者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滔滔不绝地鼓吹盲目的列宁主义。这种个人信仰和哲学批判的明显割裂仍然非常普遍。我们非常忧虑地发现许多哲学家的日常生活与其公开发表的观点存在明显的冲突。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说的，比如对化学家来说，言行不一相对来说是无害的，因为他们的专业观点对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比较小，但是违反法律的律师、不信神的牧师、破产的金融顾问、肥胖的医生、不理性的哲

学家等理所当然地让人产生怀疑。

保持纯洁

专业哲学当今存在的三个特征使得逃避公共事务的欲望进一步加强。除了个别哲学家撰写科学文章外，他们一般都讨厌事实。本专业的年轻人在读研究生时得到的教导是论证为王，对事实的了解可有可无。连那些并不热衷争论的现象学家也认为，对哲学来说，纯粹经验已经足够，根本不需要考虑关键和复杂的社会政治现实。若要参与公共事务，则需要对时事和社会经济过程等非常熟悉，难怪哲学家要感到头大了。许多人为哲学家在这些事上的无知辩护，说他们在追求比稍纵即逝的现实所能提供的东西更辉煌的真理。我年轻时拒绝看报纸，因为我相信它们与我追求的永恒真理没有多大关系。

我们这个专业打击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的第二个特征是其颠倒的激励机制。从进入研究生院第一年起，学生们就被教导要重视用专业语言表达复杂的思想。那些在哲学织物上编织出新褶皱的人，或者用新服饰复活旧观点或者难以置信的立场的人得到赞许和奖励。技术上的出类拔萃者在研究生院找到工作，在那里，他们再去复制曾经使其成功的研究套路。院长或系主任则以本专业的判断为基准，为炮制晦涩理论的人提供因捐赠而新增的教授岗位和令人艳羡的薪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所有那些专业上的创新很快就无人问津，除了引起争议外并没有确立任何有重大意义的哲学命题。相反，教学水平高或者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并不能保证你获得教授岗位，这些人还往往遭到著名思想家的蔑视。

让哲学家呆在大学内的第三个专业特征是对该领域的错误认识。大学的系部结构错误地同等对待哲学、物理学、人类学。科学拥有可靠的方法和一套经过确认的结论等优势；但哲学根本没有这些东西。期待哲学像科学一样为人类知识总量做贡献是错误地理解了哲学的本质和价值。但是，就像研究和发现的理想主宰了微生物学领域一样，它们同样定义了哲学领域。这使得哲学家的精力都集中在阅读、对话、反思、和写作上，所有这些最好在大学的安全领地内进行。

接下来是勇气问题。大学教授们天生胆小怕事，很容易受到系主任和校长的吓唬，很少人愿意把自己置于没有回旋余地的被动地位，而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愿意做出自己的判断，即使在面对抗拒或者嘲笑的时候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当我在征集要求更换无能校长的签名时，许多同事赞同这个人应该滚蛋，但是他们不愿意在请愿书上签名。他们已经获得终身教授资格，也不再需要为余生涨工资了，究竟在怕什么呢？安全的隐身是大学教授最喜欢的生活方式。他们或许在教室里发表大胆的言论，但是若要把抱怨变成行动，他们往往就退缩了。

求职伦理学

到现在为止，我一直在谈论的是可以被称为“主流”的哲学，也就是在大学哲学系研究的东西。但是，如果我漏掉过去30年来一个重要的新发展，那么我的描述就是不完整的。应用伦理学的增长已经让本领域的注意力集中到大学之外的地方，关注让人们感到困惑的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医疗伦理学、商业伦理学、工程伦理学、记者伦理学、甚至会计伦理学等不仅在从业者数量而且在文章质量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进展。

单单这一因素本来就足以让哲学偏离20世纪前70年的路线，转向更多产的方向。它之所以没有实现主要是因为应用伦理学家的不安全感和他们在学院的模糊地位。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认为元伦理学和认识论才是哲学的核心，这里不是他们的家，他们是流浪的难民。他们觉得应用伦理学是冒牌哲学而不是该领域的进一步完善。也就是说，它是在你无法在艰苦的概念推理中有杰出表现时才去做的事。更糟糕的是，他们把自己看作医药或其他专业的闯入者，也就是还没有赢得话语权的人。这种印象被医生和其他行业的专业人士进一步强化，他们把伦理学家看作多余人，拒绝以礼相待。这种状况现在已经开始发生改变，但是进步缓慢，因为它要求哲学家获得在批评这个领域时所必须具备的能力，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公共哲学的需要

美国总统有个经济学顾问委员会，还有一个单独的全国经济委员会，但是他没有用来提供伦理学建议的独立委员会，这难道不奇怪吗？当然，总统的生物伦理学委员会能提供有关健康和生命问题的专门报告，但这些报告往往是严重政治化的，无论眼界还是功效都相当有限。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公平正义和道德准则是商业交往必不可少的条件，就假设经济生活就比那些美德更重要。让人奇怪的是，政客似乎认为道德问题的解决靠良好的成长环境和宗教感受就能对付。如果这些失败了，常

常如此，各领域的领袖自然会求助于律师，而这些人往往很难区分道德义务和法律义务。

最近伊利诺斯州长要出卖参议员席位（奥巴马当选总统后留出来的参议员席位空缺---译注）的企图反映了政府最高层迫切需要伦理学家指导的现实。关塔那摩监狱的监禁，政治竞选中的公然撒谎和不能区分地方利益和国家利益等都应当引起对道德问题敏感的人和接收过推理训练的人的严重关切和评论。我们该如何鼓励哲学家来满足这种需要呢？该如何帮助社会领袖看到个人行为准则和公民美德是美好生活的最基本条件呢？

我们不能指望天生的洞察力或者即刻的行为改变。如果我们试图把一只鸟从笼子里拉出来，它是会抗拒的。相反，如果你打开笼子的门，它就愿意飞出来，尝试自己的翅膀行不行。大学之门需要向社会开放，必须有足够的刺激来鼓励哲学家拥抱实践其艺术的自由。毕竟，他们是天生的批评家。至少，部分人有足够的冒险精神靠敏感性、辩证思维能力和想象力对人生实践进行批评性考察。

但是，从大学笼子里出来的小鸟相对来说非常罕见，甚至亚里士多德都知道一只燕子并不代表春天的到来。为了吸引众多哲学家关心社会生活问题，必须向他们显示参与课堂之外的活动是有价值的，是适当的。这只能由哲学系主任或者大学管理者来做，而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相信哲学的研究/发现范式是判断错误的、无效的。但是谁来采取必要的最初几步来说服他们接受这个事实呢？

系主任认为自己是全系的冠军。他们和大学的其他单位竞相争取学校的支持。如果他们参见院长时说，哲学家们从来不发现新的事实，因为他们擅长批评他人，可这个系需要增添三个岗位，这肯定是非常奇怪的。反过来，院系主任还需与大学内的其他学院或与其他大学进行激烈的竞争。他们对不同院系的科研成果的微妙差别不感兴趣，也不怎么理解。他们渴望新的发现、众多的论文和成果、著名的教授（他们自己也竭力成名）。对他们来说，哲学作为批评代理人听起来具有模糊的腐蚀性，哲学系主任若和院系领导谈话，人家很快就可能问“为什么你们就不能和其他人一样？”

需要做什么？由谁来做？

谁来教育那些教育者呢？我看到只有一种可能性，不过，它不大可能实现。

美国哲学协会是这个国家的哲学界最著名的协会：其工作就是推动该领域在所有零散的多样性情况下的发展。因此，不是在竞选会长的时候炫耀其专业能力和名望，而是需要花费精力研究和拓展应用哲学的领域。到现在为止，它明显是失败的：几十年来，美国哲学协会的东分会的年会根本就没有提到欣欣向荣的医学伦理学的存在。即使现在，康德得到的关注仍然比徒劳的医疗多，虽然千百万人面临生命即将结束时是否继续治疗下去的艰难抉择，虽然只有哲学家才对于形而上学的演绎感到痛苦。

美国哲学协会需要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哲学的总体范围和有效性。这个考察的结果将依靠委员会的成员，所以该委员会应该包括现有领域众多派别的代表，千万不能是保守派占大多数。这个委员会的调查报告有可能引起大众的兴趣，最起码应该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大学校长和院系主任。如果它确认参与公共活动的合法性，这将打开修改哲学奖励和期待的大门。这种改革的目的在于抽掉对传统领域的支持或否认长期以来争论的问题的价值。相反，我们的希望在于哲学界能够朝着曾经自豪地承认的目的和完善的方向扩张。

美国哲学协会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吗？如果从它们过去的表现来看的话，根本不可能。这意味着那些对哲学的公共作用感兴趣的人找不到可以帮助他们的人。我们不得不说服同行，如果需要，一个一个地说服他们研究真问题的重要性。在这种努力中，我们有谨慎乐观的理由。我们面临数不清的道德问题，无论是公共问题还是私人问题。人们在盲目地寻找有意义的生活，很少人看到奉献和自我控制的人生意义。一个本来具有帮助解决这些问题的潜力的领域却畏缩在大学里，对这些问题袖手旁观，这是不能容忍的。

文中图为约翰·拉赫兹教授

作者简介：约翰·拉赫兹（John Lachs）范德堡大学哲学百年庆典教授。2001年负责美国哲学协会的世纪庆典。

译自：“*Can Philosophy Still Produce Public Intellectuals?*” by John Lachs, *Philosophy Now* September/October 2009 pp. 24-27

译注：本文的修改稿曾发表在上海社科院的主办的《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24日总第1195期第7版。译者得到作者约翰·拉赫兹教授和原刊《哲学此刻》（*Philosophy Now*）的授权，特此致谢。

鸣谢：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搜狐新闻
news.sohu.com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网易 博客

blog.163.com
新锐人文生活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欢迎订阅，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shrbooks@gmail.com，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題，敬请来信告知。

独立阅读讨论区：<http://www.douban.com/group/duliyuedu/>